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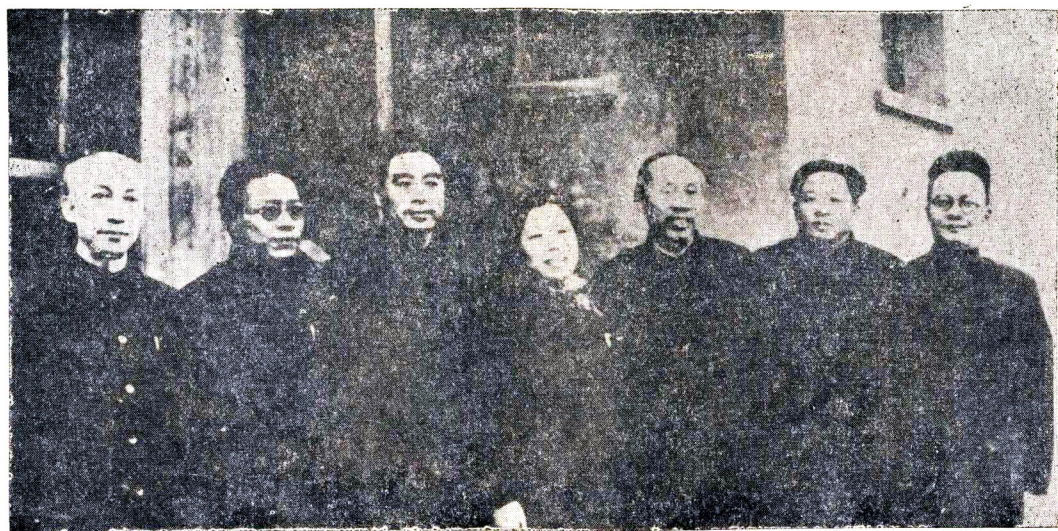
重慶 市中医史志



一九八六



K227.12/57-3



▲一九四六年一月，来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成员左起：
吴玉章 陆定一 周恩来 邓颖超 董必武 王若飞 秦邦宪



◀中共代表团驻地重庆市中区中山三路263号（今151号）

（重庆市博物馆供稿）

K297.9/57-3 D

重庆市中区史志

· 党史资料通讯版 ·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总第五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1986年9月1日出版

· 文件 · 讲话 ·

-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1)
转发《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1)
转发省党史工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1985]40号文件意见》的
通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7)
在重庆市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市委党史工委主任 黄友凡(10)

· 建国后史料 ·

- 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大事记(二)(1950.5—1950.12)……………区委党史办公室(15)
重庆市市中区街道建制沿革(1929—1984)……………市中区档案馆 邹用陆整理(22)

· 建国前史料 ·

- “一二·九”前后的川东师范……………张仲明 胡其谦(33)
在重庆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冯兰瑞(42)
难忘的岁月……………李冠华(46)
重庆地下党几个区委工作的回忆……………王 汶(49)
重庆地下斗争的片断……………温士一(51)
重庆秘密交通站……………艾新全 唐敦敦(53)
重庆的政治中心驻地——上清寺街道史料(二)
……上清寺街道志编纂组 刘亮熙 王耀珉供稿 区委党史办公室 武建政整理(57)
关于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
——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租赁经过纪实……………赵嘉玉(75)

· 党史人物 ·

- 游曦……………曾维钦(61)



yz1205291

重庆市中区图书馆藏

· 文献辑存 ·

- 朝天门，历史的见证.....黄友凡(70)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熊宇忠(72)
读者来信一则.....陈敦川(74)
关于《听月楼诗》本事一说.....宋 芹(71)

· 区委党史工作纪事 ·

- 中共市中区委党史工委、市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委1985年工作总
结和1986年工作意见.....区委党史办公室(77)

· 其 它 ·

- 编后记.....(80)
启事两则.....(9,72)

- 封 二：一九四六年一月来重庆出席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共代表团驻地
封 三：稿约
封 底：游曦烈士遗物笔筒

重庆市中区史志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总第五期)
· 党史资料通讯版 ·

主办：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辑：《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编辑部
印刷：重庆印制第一厂
发行：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地址：重庆市中区和平路 211 号 电话：41365
重庆市报刊登记证渝出内字第 068 号

定价：0.60元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

今年一月十二日，胡耀邦同志对冯文彬同志的一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原载《征集工作简报》1986年第2期）

· 文件 · 讲话 ·

转发《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 整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发办[1985]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政策性、机密性很强，一定要认真做好。对于重要选题的确定、阅读绝密史料的人员、整理立案的史料，一定要经过有关党委和部门领导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工作人员不得扩散、撰写、出版绝密史料的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 整理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一九八四年三月，胡耀邦同志指出：“我们整理各种史料的工作做得太差，这些年有进步，但还不全面和认真，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在整改中，我们认真学习了胡耀邦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重温了陈云、胡乔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

现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报告如下：

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九八〇年，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提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和各地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几年来，在中央和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征集工作网，建立了一支近万人的征集、研究党史资料的队伍，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 征集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文物和其他有关我党的历史资料，充实和丰富了档案资料，并从原藏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如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手稿，就是在收集和 research 遵义会议专题资料的过程中，由中央档案馆发现并送请陈云同志确认的。

(二) 向老同志征集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材料。这类史料，仅全军征委会就收到六千多篇。近两年，中顾委委员撰写的各种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有四百多篇。我委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发表的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为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受到党史界和有关同志的欢迎。

(三) 经过调查研究，搞清了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整理了一批比较系统准确的资料。一些资料为组织部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有关政策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依据。

(四) 为配合党史编写工作和搞清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了专题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向各地和有关单位布置了六百多个专题资料的征集任务，已经完成了一批，预计大部分在明年可以完成。

(五) 初步开展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有些征集机构和档案部门正在编制党史资料目录，已编辑出版了一批党史资料书刊，如《遵义会议文献》等。《南昌起义》、《辽沈决战》等书的编辑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各地征委会也编辑出版了一批党史资料书刊。

(六) 各地利用征集到的党史资料，通过举办陈列展览、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找到了做好这一工作的途径，广大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者、老干部和党史教学研究人员积极性都很高。但是，用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全面、认真”地做好史料整理工作的要求来衡量，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差距。

二、当前面临的任务

（一）收集文献资料的任务仍然很重。

建国以前的党史资料，由于战争环境，散失严重，许多资料不全，甚至是空白，仍需大力收集和整理。建国以后的党史资料，也需要进一步收集。有些党史资料分散在某些部门、地区和个人手中，如果不及时收集起来统一管理或复制分存，既不利于使用，又有散失的危险。

（二）大量宝贵的“活资料”亟待收集、整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同志是革命斗争历史的见证人，向他们收集“活资料”，对于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说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订正史料的误讹，是极为宝贵的。这项工作，亟需采取有效措施抓紧进行，稍有懈怠就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浩繁的党史资料需要加强整理和提供利用。

建国以后，中央宣传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先后汇编了部分中央文件及其他党史资料，但尚有大量的资料和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没有及时整理、鉴别和提供利用。现在，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史工作者，为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进行党史教学，渴望得到更多准确的党史资料。国外也有不少人士在研究我党的历史。因此，按照合理的分工，依靠全党全军各有关机构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抓紧时间，编辑出版完整准确的党史资料是一项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任务。

（四）为解决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安定团结，仍需继续收集有关的史料。

解决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对促进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而且需要有充分准确的史料作依据。这类问题，如果不抓紧时间把史实搞清楚，不仅不利于团结，还会给后人留下麻烦。因此，收集、整理这类问题的历史资料，为中央和各地党委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依据，是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今后的工作意见

为完成上述任务，我们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业务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各有关机构分工合作，全面地、认真地把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好，为研究、编写、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服务，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服务。

根据这个方针，在今后五至十年内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全面征集党史资料，着重收集以下各类资料：

1.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报告、文章、书信、谈

话记录和图片等。

2. 党和党所领导的政权、军队及其他组织的历史文件。
3. 早期的党报、党刊和其他重要出版物。
4. 重要的革命文物和革命遗址的资料。
5. 敌、友方面留存的有关我党活动的重要资料。
6. 老同志反映党的历史活动的日记、书信、文章和有史料价值的回忆资料。

(二) 认真整理党史资料, 积极提供利用。对有关资料拟分三类进行整理:

第一类, 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活动的历史资料。

第二类, 党所领导的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如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的重要历史资料。

第三类, 党在各个地方(包括建国前的各根据地)活动的重要历史资料。

(三) 编辑出版党史资料丛书。

一九八三年四月以来, 根据中央书记处审阅批准的《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精神, 不少地方和一些部门已陆续编辑出版了一批党史资料书刊。为适应党史研究、编写、宣传和教学的需要, 今后各地和有关部门在进一步做好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 可以按照中央、军队、地方的分工, 分头编辑出版各自的党(军)史资料丛书。编辑出版这类丛书是一项严肃重要的工作, 一定要把好政治关, 认真核实史料, 保证质量。公布档案资料, 要根据中央有关规定, 报请有关部门审批。为满足国内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需要, 有些资料书经过批准可以公开发行和向国外发行。

四、主要措施

为保证上述任务的顺利实现, 拟采取三项主要措施:

(一) 制订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利用的全面规划。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制订全国性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 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也要制订各自的党史资料征集规划。按照规划, 更加广泛深入地收集各类党史资料, 并对征集到的资料进行鉴别、核实、考证和整理。

(二) 搞好组织协作。

为便于工作, 拟吸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通过委员会的集体讨论, 统一思想, 协调计划, 分工负责, 加强合作。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也需要加强协作。

(三) 改进领导,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为保证上述任务的顺利完成, 要根据任务的需要, 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 提高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要通过整党, 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提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和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 提高业务工作要服务于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自觉性; 要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学习专业知识, 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和整理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们要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把工作做得更好, 进一步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

附: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 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

根据中央书记处批准的《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胡耀邦同志关于加强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制定本规划。

征集、整理党史资料是一项党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史料进行认真地鉴别、核实、考证和整理,把党史资料收集和整理好。

征集、整理我党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资料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征集机构必须依靠老同志,与党史军史教研单位、地方党史、军史及史志编辑机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有关方面分工协作,努力完成这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任务。

一、继续全面征集党史资料

(一) 同中央档案馆、文献研究室、图书馆、军事科学院、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分工合作,征集文献、文物资料

1.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现任中央常委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报告、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和图片等。
2. 党及党所领导的政权、军队及其他组织所形成的历史文件。
3. 早期的党报、党刊及其他重要出版物。
4. 老同志保存的反映党的历史活动的日记、书信及有关文章。

(二) 组织老同志写回忆资料

要继续采取召开专题座谈会、专访、函访、撰写文章等方式,抓紧向老同志征集回忆资料。

各地区、各部门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应将已经征集和整理的回忆资料统一编目,报中央征集委员会备案汇齐,并制订继续征集回忆资料的规划。

征集回忆资料,要事先确定题目,列出提纲,准备好有关资料。对回忆资料,要注意考核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

(三) 抓紧专题资料的搜集整理

各地区、各部门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应继续抓紧专题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审查工作,尽快完成现有的专题任务。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根据专题资料征集工作的进展情况,商同各地区各部门布置新的专题任务。

(四) 注意搜集敌、友方面留存的有关反映我党活动的重要资料

征集到的以上各类资料都要编目,按季上报。文献、文物资料要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报

送中央档案馆等有关部门。

二、认真整理党史资料

近几年着重整理以下几类资料：

(一) 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档案馆正在整理、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二)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中央编译局和中央档案馆正在编译、整理和汇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全部资料。

(三) 中共党史大事记。编辑单位待定。

(四)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组织部门参加。

(五) 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史资料。除军史、战史已由军事科学院负责外，其他的有关资料由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各地区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征集、整理。

(六) 革命根据地的资料。建议由有关地区、军队的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合作负责征集、整理。

(七) 党史人物资料。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资料，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写出五千至一万字的综合性叙述文字。

整理党史资料应按历史顺序科学地分类汇编，还要有必要的考证和注释。

三、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党的历史资料整理得比较严格和成熟的，可考虑分别由中央和各地方负责编辑出版资料丛书。编辑党史资料丛书的过程也是向老同志征集和核实党史资料的过程，应邀请有关老同志参加丛书的审定工作，请他们在史料方面和政治方面把关。遇有回忆和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属于地方的问题由当地党委负责解决，属于中央的或虽属地方而直接涉及全党历史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有关机构解决。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及时了解各地区各部门拟编丛书的书目和编辑工作中的问题，以便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组织协作，避免重复劳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征委会和党政军有关部门的征集机构，可参照本规划拟定本地区的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规划。

转发省委党史工委《关于贯彻落实 中办发[1985]40号文件意见》的通知

川委办[1985]95号

各市、地、州、县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各部门党组（党委）：

省委党史工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1985]40号文件意见》，已经省委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1985]40号 文件的意见

省委：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家机关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如何落实中办发[1985]40号文件（即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党史工作机构对半年来的工作进行检查，向本地区、本部门党委提出落实40号文件的意见，请党委批准后执行。会后我们进行了讨论，并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现向省委报告如下：

今年初，根据耀邦同志关于加强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和中征委《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规划》（草案），我们制订了本省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规划，并落实到各市、地、州、县及省级各有关部、委、厅、局。经过半年多来共同的努力，又征集到一批珍贵的党史资料及一些建国初期领导同志的回忆资料。计划编纂的五十多辑党史资料丛书，已交出稿件的有四辑，年底或明年初可脱稿的有九辑，今年党史人物传可出一卷，烈士传可出三辑。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党史大事年表已由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建国初期原四个区党委及西康省委、重庆市委的党史资料，已由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地、市完成了大事记初稿，并正在进行专题征集研究，预计明后年可以完成。此外，我们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主持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并承担了《党的组织和

工作》等书的主编。吴玉章传正在撰写中,《怀念吴老》一书已经发排。省委组织部已调配干部编纂组织史资料,省公安厅、省体委等单位负责编纂的有关资料丛书工作,都在积极进行中。总的来说,工作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要把从建党到现在六十多年的历史资料征集、整理好,是较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当前,收集文献资料,抢救“活资料”,整理编纂党史资料丛书以提供使用,以及为解决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安定团结需进行的专题征集研究任务也很重,而当前党史工作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亟待加以解决:

一、领导组织问题

中办40号文件提出:“为便于工作,拟吸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的集体讨论,统一思想,协调计划,分工负责,加强合作。”省委党史工委建立于一九八三年,到现在,有的委员已调动工作,同时,建立党史工委时也没有考虑到要搞建国以来的党史,致使有的单位没有人参加。因此,我们建议调整充实党史工委组成人员,除原参加的单位外,为了进行建国以来党史工作的需要,拟增加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为委员和专职副主任,请省委组织部与有关单位商议后报省委批准。

至于各市、地、州、县委党史工委,也可参照这个精神,请示县委同意后,再进行适当调整。如无专职副主任的,需设专职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并从事党史征集研究工作。

省级有关部门,除已建立党史机构的外,其余的请按聂荣贵同志八月七日在当代中国四川卷编辑会上的意见,由一个班子承担史、志、当代中国的任务。

二、干部队伍问题

我省各级党史工委的编制,一九八三年省编委、省财政厅、省委党史工委已联合发了文件(即川编发[1983]168号、川财政行[1983]55号、川委史发[1983]11号),作了明确规定,请各地、市、州、县照此配备。对于党史干部的培训,我们已办过短期的学习班、讲习班等,今年省委党校又以招考方式培训了几名。今后除我们继续举办短期训练班外,建议党校举办二、三年制的大专班。

中征委正和劳动人事部研究,要在党史系统干部中评定技术职称,这有利于党史系统干部的稳定和提高,待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后,我省再遵照执行。

三、资料和信息问题

中征委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做好党史资料征集系统的信息工作,以避免重复劳动,减少人力、物力浪费,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再次提出党史资料要统一编目,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史机构征集的党史资料要汇总编制分类总目录,分别报送上级党史工委和送同级档案馆。各级档案馆保存的党史资料也要编制分类总目录并送同级党史工委,在使用档案资料上,档案馆要为各级党史工委提供方便。

四、党史人物列传问题

中征委座谈会强调为党史人物列传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已为大革命时期我省有影响的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全国解放,党的省委一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立传,并将逐步出版发行。我们还准备为解放以来,对党的事业有突出贡献的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

四川籍在省外工作的这一级以上的干部立传。如省委同意，我们即着手积累资料，并请有关同志写回忆录。当然，写传并出版，只限于已去世者。

解放后著名的烈士也准备继续列传。

各地、市、州、县党史工委可根据情况，对为本地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的已逝世的党的领导人立传或写传略。

五、当前党史资料积累问题

为了避免老是抢救和征集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已进行有计划地积累党的资料并逐日记录中央的大事。建议省委办公厅也应指定专人逐日记载省委的大事和积累党的重要文献资料，以便积累我省党史资料 and 提供使用。这个问题省委川委办〔1984〕21号文件中已有规定，请参照办理。

六、经费问题

征集党史资料，编纂出版党史资料丛书、党史人物传，都需要很多经费，我委逐年来的经费只能解决工资、房租及会议等费用，关于征集、编纂和研究所需费用，我委已作了预算，请财政厅审核拨给。各地、市、州、县财政局，也应按照各级党史工委这方面的需要，予以解决。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省委批转各地、市、州、县及省级各部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更正启事

本刊一九八五年第二期（总第二期）十二页第三行，将张家璧同志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误写为“现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这是由于我们工作粗枝大叶所造成的。除郑重向张家璧同志表示歉意外，特此更正，并引为今后鉴戒。

《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

在重庆市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上 的 总 结 讲 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市委党史工委主任 黄友凡

同志们：

市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今天就结束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办发[1985]40号文件精神，总结一九八五年的工作，讨论一九八六年工作要点和今后五年的规划。会议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大家一致认为开得好。同志们认真学习了中办发40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听取了先余同志、文澄同志、大明同志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市委党史工委的工作汇报以及沙区区委党史办、荣昌县委党史办、市公安局公安史办公室、江北县委党史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市中区委党史办、江北区委党史办的经验介绍，着重讨论和研究了40号文件的基本精神，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史料质量，充分发挥党史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把全市党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普遍反映，这次会议收获很大，主要是：(1)进一步提高了对党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搞党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2)更加明确了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3)总结了去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年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并指明了今后的奋斗目标；(4)对党史工作在研究方法上、工作路子上如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如何进一步打开新的局面，摸索到了一些新的途径，增强了信心。大家表示回去一定把党史工作做好。

下面就贯彻落实40号文件讲几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领会好40号文件精神

1985年6月2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征委《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1985]40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在1984年12月西安会议上提出来，经过讨论修改后形成的。去年我市第七次党史工作会议上，曾经组织同志们学习过，并作了初步的贯彻落实。现在经过中央正式批发的这个文件，内容更丰富、更完善，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这里强调以下几点：

1. 提高对40号文件重要性的认识。冯文彬同志说，“这个文件反映了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主要经验，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指示精神，更加完整地提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工作任务和今后十年的工作轮廓。这个文件是我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长期的指导方针。”经过前几年党史工作的实践，领会40号文件精神，就觉得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基本任务、工作目标都更明确。而且有个长

选规划，使党史工作更有计划性和主动性，确实是多年来党史征集工作的经验总结，确实体现了小平、陈云、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指示精神。

2. 关于工作方针和业务指导思想，40号文件作了明确的概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各有关机构分工合作，全面地认真地把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好。为研究、编写、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服务，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服务。”

我们是征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认真地搞好六十多年的党史资料，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史工作的落脚点和目标，是“两个服务”。我们地方党史工作也有研究编写的任务，但绝不是为征集而征集，为整理而整理，要学习、宣传党史服务，特别是要为实现总任务总目标服务。

3. 今后五至十年，要把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党史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广泛发动、普遍征集，后来是重点征集、专题研究，西安会议后把征集、整理和编纂结合起来，订出长远规划。这是党史工作一个新的发展。中征委提出的工作规划是三大项十二个字，就是全面征集、认真整理、科学编纂。征集是整理和编纂工作的基础，整理、编纂又推动征集工作的开展，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总之，最后要拿出科研成果来。这里强调了拉通六十年党史，不仅搞民主革命时期的，还要搞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而且规划了出版党史资料丛书，这是需要努力完成的一项系统工程、史料全书。

此外，40号文件还提出加强党史资料征集系统的信息工作，包括工作信息和资料信息，要有资料编目。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

二、党史工作一定要为实现总任务和总目标服务

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经常说的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范围非常广泛，道路非常曲折，经验非常丰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我们党的历史、党的光辉业绩，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无数先烈，是教育子孙后代、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激励人献身四化的最宝贵的材料。一定要发挥党史资料在建设两个文明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绝不能为党史而党史，为征集而征集。或者把党史资料征集起来，束之高阁就算完成任务。

怎样服务？我觉得首先是总结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党史实际相结合，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从政治思想上，总结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一个事件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今天建设“四化”的宝贵财富。另一种服务，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优良作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献身精神。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最近又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而且提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史工作者当前要把注意力放在为端正党风服务上。

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们重庆的优势。我们有两个优势，一是基于它的地理条件，经济基

融，它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因而形成了它的经济优势。二是基于它的历史原因，是历史上的名城，从古至今，它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爱国志士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建党以来，更是一部可歌可泣、雄伟壮丽的史诗。我们有莲花池、有红岩村、有曾家岩、有新华日报、有天官府、有渣滓洞、白公馆，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是得天独厚。今年新春，我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来赞颂山城，名为“山城颂歌”，又叫“英雄重庆人”。（内容略）这些历史也是我们重庆人的光荣。我们要很好地整理这些史料，很好地运用这些史料来教育青年、干部、党员，作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的好教材，把人民培养成“四有”的新人。沙区运用党史结合整党进行教育，江北区、江北县利用烈士墓葬进行教育，市党校地方史的教学，都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作用，也为党史工作增加了活力。这种革命事迹、遗址、人物，各区、县比比皆是。巴县、江津、合川、綦江、潼南、铜梁都不少。不仅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解放后也有不少英雄事迹。临解放时有的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英勇牺牲，有的建立了烈士墓，如南泉等处。在我们写建国后党史时，就要专门写这些烈士的历史，为他们宣传、出书。市中区曾经是四川省委、川东地下党活动的中心，建党初期，一、二战时期有许多革命遗址，应该有计划地立碑树标记。在方式上可以讲党史、办展览、出小册子，甚至拍电视。我建议各地区、各单位在立好立准党史的同时，要广泛开展服务的活动。这些活动最好与组织、宣传部门协同配合，取得他们的支持。

提供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落实地下党同志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安定团结，同时调动一些老同志的积极性，为“四化”献余热。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抓党风，这为我们党史工作部门提出了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主动地配合基层整党和机关端正党风，宣传和发扬革命传统，把党史工作搞活。

三、在全面、认真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史料的质量

中办发40号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耀邦同志关于全面认真地整理史料的指示精神。贯彻落实40号文件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史料的质量，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耀邦同志在对《党史研究》创刊号的批示中强调：“请注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无，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要，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慎重从事”。一九八一年全国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实事求是，忠于事实，慎重从事，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党史征集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几年来，我们遵循这个原则开展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对于我市党史资料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目前，全市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尚未发现什么大的毛病。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整理出的史料确实也有一些质量不够高的东西，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一些难点、重点史料的突破抓得不够，有些问题至今还不能解决。如中共重庆地委建立的时间，争论还很大，最近省里还要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又比如，我们有的史料的史实搞得不准确，论断表述不清楚、不恰当。此外，我们出了许多内部资料，有的内容不精，有的文字粗糙，就是市委党史工委出的书，严格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还有不少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学习40号文件精神，在全面认真上下功夫。“全面”，我理解是不要遗漏，要防止片面性，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党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人物、党的重大斗争等等，都必须搞清楚，都必须征集、整理好，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马虎，不能留下“空白”和“死角”。“认真”，就是要做到一丝不苟，使史料真实可靠。党史工作既是一项学术性强的科研工作，又是一项

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一定要以极其严肃的慎重的态度，积极、认真负责的精神从事这项工作，不论口碑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要经过反复核实，认真鉴别，去伪存真，立准立好。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特别是专题研究工作，使我们的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史料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贯彻全面认真这一指导思想，提高史料质量，各区、县、有关部门要根据中办40号文件精神和省、市委党史工委的规划和要求，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发，作出规划和安排，有计划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一个一个任务地落实完成。切忌不顾本地区情况，照搬照套省、市的规划和安排，搞“一刀切”。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有的区、县如江津、綦江、荣昌、铜梁、潼南、合川、巴县等因为党组织的活动频繁，斗争激烈，征集、整理任务就要重一些，工作量大一些，这是一种类型。还有的区、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活动可能要少一些。因此，在制定规划、安排工作上就不必和任务繁重的区、县完全相同。总之，区、县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安排，一定要从本区、县实际情况出发，不要硬套市里的安排。但和市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一定要完成。

至于建国后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它和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特点，但总的看来，情况要复杂一些，问题更多一些。因此，在工作上更要慎重一些，步子稳一点好。在工作要求上也不完全相同，如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要编“丛书”，建国后的史料征集，因为各种文字资料都比较集中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就不一定都搞“丛书”，也可以采取搞专题和专题汇编的方式来集中史料。各个部门在承担任务上要求也有所不同，党委的办事机构，如办公厅、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任务就更重一些。其它部门也有任务，但比较起来，没有党委这些部门任务重。

征集、整理建国后的党史资料，今年重点仍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要认真组织力量搞好这七年的大事记、组织史料和专题资料，要认真摸索、总结开展这项工作的经验。至今尚未开展建国后史料工作的地区和部门，请一定要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立即将工作开展起来。去年市的第七次党史工作会议上制定了一个党史资料征编计划，其中建国后的专题史料已分别请有关部门承担整理任务，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我们党史工委抓得不紧，所以目前有的部门还没有很好的开展工作，专题史料还未落实。……希望承担任务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尽快落实任务（人员、完成时间都要落实），提供条件、开展工作。今后我们将组织力量逐个部门进行落实。

四、加强队伍建设，振奋精神，开拓前进

党史工作是一项党性、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建立工作班子，加强队伍的建设。因为党史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对我们这支队伍的要求就比较高，搞党史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党性强，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这几个基本条件，还有一条就是热爱党史工作，有事业心。目前，我市党史部门有工作人员近一百人左右，其中专职干部六十余人，聘请、借调老同志四十多人。总的看来，这支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同志们为我市党史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老同志的赞扬。这是基本的方面。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不适应党史工作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需要认真加强建设。

首先，在人员的配备上，按照省、市有关规定，凡是没有配齐专职干部的，请各区、县委尽快按要求配齐专职人员。这个问题只要区、县委下决心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也要向市编委联系，进一步落实这项工作。长寿县委前不久对党史办进行了充实，配备五名干部，增加一间办公室，还配备了两部相机、两部录音机，经费也解决得较好，这次县委邓书记又亲自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长寿县委在工作条件方面解决得很好，现在就看我们县委党史办的工作了。在配备专职干部时要适当注意老、中、青结合，要有接班人。年岁稍大一点的老同志身体能适应的，还应继续搞一段时间，带好接班人，不要急于退下来。要采取措施，把队伍稳定下来，不要轻易调动，对于借调来党史办已经熟悉和适应了工作的同志，要留下来继续搞下去，对被借调人的定职定位、工资改革、福利待遇等问题要与原单位工作人员一视同仁。总之，一定要使我们这支队伍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工作的开展。另外，现在有不少老同志退居二、三线，这是我们党史工作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要继续采取聘请的方式，在他们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请他们参加党史征编工作。

第二，党史工作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习的内容要宽阔一些，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党史、历史方面的知识以及征编业务知识。此外也还要有文字写作方面的素养。

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史工作干部的素质，我们一方面将继续采取办学习班、以会代训和组织专题讨论吸收有关同志参加等办法，进行培训；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实践中边干边学的方法。在工作中逐步提高。

下面，我想谈一谈党史工作干部如何振奋精神，开拓前进的问题。当前，党史工作确实面临一派大好形势，恭逢盛世，难得的盛世。党史工作的形势，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肩负着极为繁重和光荣的任务，现在还处在创业阶段，这就要求我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开拓前进。对我们党史工作干部来讲，也有一个加深对党史工作认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党史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工作的确是十分重要的，是很光荣的岗位，做出成绩的党史工作者是会得到党和人民尊重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他们。目前，党史工作中确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要看到，随着党史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它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被人们、被领导所认识，工作中的困难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要有坚定的事业心，和搞好工作的信心，振作精神，迎着困难上，用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去夺取党史工作的新的胜利。

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大事记(二)

(征求意见稿)

编者按：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大事记第二部份(1950年5月22日区委成立后至1950年12月底)已经整理完成初稿，现特印发征求意见。这一部份大事记主要是根据区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编写的，少数资料来自《重庆政报》。在整理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感写好大事记并非易事。资料必须翔实可靠，实事求是。因此，诸如材料的选择、记述的详略，语言的准确，时间、地点、人名的核实等，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我们限于水平，这个材料还存在不少问题。竭诚希望同志们毫无保留地提出意见，及时告诉我们，以便修改补充，更臻完善，并继续把编写市中区大事记的工作做好。

区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三月卅一日

(二)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区委成立——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底

五月

二十二日，第一区区委（原1—7区合并而成）由市委搬出，在管家巷7号，开始工作。

五月份统计：

我区共170保，3429甲，108416户，440633口（男丁246945口，女丁193688口）。商店1428户，大小型工厂588家。专科以上学校4所，学生767人，教职员115人；中等学校20所，学生4576人，教职员503人；小学校71所，学生26545人，教职员980人；幼稚园托儿所26所，儿童2654人，教职员121人；民教班255班，学生8482人。

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据原四区（小区）了解，即有反动党团区分部（分队）35个，迷信团体15个；会门、袍哥堂口95个；多勾结官府，帮助特工，统治人民。

各行业、各部门群众工作有初步基础：妇女生产（搞缝纫等）组279个，参加妇女有3257人。工人已组有纺织、五金、化学、食品、海员、手工业、店员等五个联合总工会，各厂有工筹会。青委方面，全区有团员920人（学生427人，店员180人，邮工27人，学校教师69人，机关包括公安局、银行在内217人），组成团总支三个，分支三十五个①。

六月

四日，渝港各轮船公司大部份轮船已复航^②。

六日 各校教师代表八百多人，开会庆祝解放后第一个教师节，各校举行尊师爱生活动^③。

九日 公安局破获阴谋叛乱特务组织，主犯刘泽林、文质彬等十九名被捕^②。

十二日 重庆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十三日曹荻秋副市长报告“重庆四个月来的政府工作与今后工作中心任务”。十七日，会议胜利闭幕，提出“团结一致，胜利前进”的号召^②。

十五日 成渝铁路动工兴修，隆重举行开工典礼^②。

我区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小区组成工作组进行宣传及办理婚姻登记工作。通过办理婚姻登记，对群众进行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及废除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制度的教育^①。

二十一日 区委各工作组根据区委指示对辖区内的学校、机关、工厂（分劳资两方）、商店、文艺单位等普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和掌握了这些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人员构成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今后工作创造了条件^①。

二十二日 区委根据市委指示，召开了组宣会议，传达布置区委整风计划，整风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一、结合公开党进行学习；二、根据工作检查，联系思想作风进行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鉴定。在组织领导上，区委成立整风委员会，区以下以支部为核心领导整风^①。

二十六日——八月卅一日 按照市委“关于公开党支部的决定”，区委于六月廿六日召开了全区组宣会议进行传达，并确定公开党的支部计划。廿七日召集党员大会进行动员。七月八日召集非党干部进行教育。各支部结合学习整风文件，作公开党的思想准备。七月十五日—二十日，公开了公安城二分局一支部、川东师范支部、搬运工会支部、工作队支部等四个支部。七月二十二日召开各支部书记会议，至八月三十一日止，除林森路支部、电力公司支部、曾家岩支部、青委支部等四个支部外，已全部公开^①。

二十六日 重庆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人民政府报经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命郭焕中为区长^①。

本月，在市委领导和区委的努力下，顺利完成并区和接整支部任务，开始进入正常工作。并区干部的调配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对区委机关干部以上及政府科长以上）、工委、青委、妇联和区委分别负责。加强并区干部思想教育，解决思想波动和增强团结问题等。

由区委组织物资接收清理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文件档案、财经及房屋家具的分配移交。接整支部工作，从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二十二日止，全区已接上关系的支部9个，连同区委机关支部共10个。计党员236人（正式党员211人，候补党员25人）（注）。其分配如后：

公安一分局支部正式党员44人，候补党员6人	} 六月九日 接上关系
公安二分局支部正式党员34人，候补党员4人	
公安三分局支部正式党员38人，候补党员4人	
公安四分局支部正式党员21人，候补党员1人	

区政府支部 正式党员20人，候补党员4人（六月四日成立支部）
区团委支部 正式党员6人，（六月十四日接上关系）
区工作队支部 正式党员5人，候补党员2人（五月二十七日成立支部）
区委支部 正式党员33人，候补党员4人（五月二十七日成立支部）
电力公司支部 正式党员7人，候补党员2人（六月十九日接上关系）
川东师范支部 正式党员3人（六月九日接上关系）

以上10个支部，正式党员211人，候补党员25人。（注）。

组织建设方面，经过区委研究，建立了区政府党组，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抚保委员会^①。

（编者注：档案原件统计有误，此处应为候补党员27人，党员总数238人）

七月

一日 我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到会党、团员及各界人士共约二万二千人。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均出席讲话。各民主党派、各工厂、各学校分别集会庆祝^②。

七日 各机关、学校分别举行“七七”第十三周年纪念会^②。

十日 根据安乐洞中心校六月廿八日的线索，我区对“反共青年团”组织进行调查，在西来寺中心校抄到二十余人名单，拘捕了五至六人。查该组织成立已久，参加者均属家境清贫、玩皮懒惰、受家长虐待的十三、四岁小学生^①。

二十一日 本市青年暑期学园举行开学典礼，到九月五日举行散学典礼，大会中有973位同学入团^②。

二十五日 区委整风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研究集中整风问题。二十六日，区营级干部31人集中开始整风。二十七日，区委副书记辛易之作整风动员报告^①。

二十六日 中小学教师暑期研究会举行开学典礼，曹荻秋副市长作学习动员报告^②。

本月内，区委秘书处、宣传部分别布置各工作组继续进行本区催缴公债工作、调查原各小区境内工厂劳资关系（仍分劳资两方进行）及学校、机关、商店、文艺场所等情况。干部学习了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关于建立区级党委及区级政权机构的报告和中共市申区委第二书记岳林《并区工作报告》。

区委第六工作组组织军工烈属生产自救座谈会，区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孙毓亭到会讲话，区委第三工作组还调查了本区贫民工作^①。

八月

一日 我市各界举行庆祝大会及二十万人的示威游行，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并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及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②。

五日 本市今日起解除戒严令^②。

十一日 区委整风学习，于今日总结鉴定。这次整风主要收获是对半年来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错误及部分干部的军阀残余、贪污腐化思想，有了认识；分析与检查了政策观念、群众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般的学会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这

次整风，区委进一步了解熟悉了干部，对今后改进领导工作很有帮助^①。

二十二日 区委工作队48人（男34，女14人）参加整风，于今日总结（48人中党员5人，团员31人。文化水平：大学及专科12人，高中18人，初中14人，小学4人。）

这次整风从改进工作出发，检查半年来工作中的优缺点，进一步联系思想，以纪律性、组织性、群众观点和革命人生观为重点。通过整风，一般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找出今后努力方向，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巩固了革命人生观^①。

二十五日 我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陈锡联市长作“1950年重庆下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②。

二十六日 我市第一届工人劳动模范会议开幕^③。

二十七日 市委发出“关于发展党的工作指示”中指出，“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并指示各区委成立组织工作小组，由区委亲自掌握，常委分专人负责指导，协助工厂支部具体进行建党工作。

区委根据市委指示，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检查两个月来的工作。讨论中对于在工人中发展党的意义是明确的。但根据我区状况，工人工作未作好，对群众工作没经验，只能先摸一下工人的情况，才能使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区委副书记辛易之在总结中提出：今后三个月的工作是：1. 工人群众工作由区委、工、青、妇主要来做，政府配合。2. 治安肃特。3. 学习。4. 培养教育干部。5. 纪律检查^①。

九月

五日 区委“七、八两月工作总结”中指出，公开党的工作，除青委支部因暑期学园工作、电力厂支部因石油工人不在家等原因，条件不成熟、暂不公开外，其余支部在八月底已全部公开。^①

七日 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开幕，十一日胜利闭幕（在市中区浮图关下大院）^②。

十二日 全市各界人民欢送英模代表赴京出席全国英雄模范代表会议^③。

同日 一区委“公开党的支部总结报告”指出，通过深入动员、整理支部组织和在党外反复进行公开党的宣传教育、提高认识等工作，帮助党员克服缺点，教育了党员；使党在群众中威信提高了，教育了群众，密切了党群关系。公开党的过程，整顿了党的队伍，增进了团结^①。

十四日 一区委为加强工农干部和勤杂人员的文化教育，根据市委宣传部计划，特成立一所文化学校（包括区委、区政府、妇委、城区公安二分局及其所属派出所等单位），于今日开学。共到学生八十五人，其中干部五十五人，勤杂人员三十人（人数不够准确，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市委宣传部于二十七日转发了文化学校教务工作情况通报^①。

十五日 区委发出“关于建区问题的决定”，指出：（一）关于区政府与税务局、公安、文教、卫生各部门职权，有不明确的地方，再由区政府报请市人民政府指示；（二）区人代会名额问题，按照规定，二十万人以上者选代表二五〇人。我区有四十多万人口，拟请增成三〇〇人；（三）区人代会延期，争取在十月内召开；（四）区人代会筹委会决定至迟本月底成立^①。

十六日 市府举行行政建设会议，研究“重庆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章程”、“重庆市区人民政府试行办事细则”、“重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②。

十八日 全区整风工作由六月廿二日起至本月十二日全部结束。这次整风在步骤上先集中营级及部分连级干部整风，培养骨干到普遍展开‘仍以老干部为主。掌握各种思想情况，采取分别反复不断动员、个别谈话、群众互助与座谈会等方式，又在市委整风中团级干部的实际影响下，排除顾虑，帮助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经过整风揭发批判，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工作作风转变了，贪污腐化杜绝了，团结增强了^①。

二十日 成渝铁路首批机车抵达重庆菜园坝车站^②。

二十五日 一区人民政府组织烈军工属生产^③。

九月内，区委秘书处参加市财政局召开的市会审工作会议，明确了各种费用的报领关系。会后即整顿本机关会计业务，成立区委机关及工青妇附属会计单位经济委员会（三人组成）。为做到机关账目公开及民主管理伙食。听取意见改善生活，成立了生活委员会（五人组成）^①。

十月

一日 首届国庆，万民欢腾，本市举行十五万人的示威游行。刘伯承主席检阅武装部队。邓小平政委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曹荻秋副市长发表“人民的重庆在成长中”的文章^②。

四日 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决定：在中区大田湾修建广场，即日动工^③。

五日 市府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曹荻秋副市长作关于加强区政建设的报告。通过“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区政建设的决定”、“重庆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章程”、“重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重庆市郊区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及“重庆市区人民政府试行办事细则”^④。

七日 重庆市第一区成立皖北苏北河南河北灾民寒衣劝募委员会支会。通过团员进行思想动员，使每个同志从政治上认识这一任务，除配合区劝募支会积极开展工作外，并带头踊跃捐输，光荣的完成了十七亿两千五百万元（旧币）配额^①。

十二日 区委贯彻市委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的指示，决定各支部教育的重点为一般党员，特别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以党章教材为经常系统的基本内容。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上党课，要求每月至少上一次课及讨论一次^②。

十四日 区委为了继续贯彻清匪肃特工作并及时有效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以达到社会秩序进一步安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建警工作和展开禁烟禁毒运动。内容有加强调查以便在统一行动下厉行封闭烟馆、逮捕主犯、禁毁毒品等；于十一月份进行烟民登记，展开规劝运动，推广流动戒烟所等，以求达到逐渐彻底解决。逐步调整派出所，在我区首先以城二分局为重点试办。年内普查户口一次。并在整风基础上掀起群众性的创模运动^③。

十六日 区委作出“四个月来区委工作在领导上的检查”，纵述六、七、八、九月情况；六月份主要是组区任务、了解情况；七、八月是公开党与整风；九月份研究党代会、人代会工作，主要是贯彻市委关于建党建政等指示。

目前正加紧准备召开区党代会，主要在公开党与整风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党的工作，在党员和干部中开展进步运动。区党代会的准备工作，已开过组工会议，统一认识了加强党工作的重要性的，现正研究召开党代会筹委会。区人代会亦积极筹备中^④。

十七日 区第一次党代会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条件、代表产生办法及代表审查批准手续”等，同时发出通知，要求十月廿九日前将名单送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①。

二十三日 我区第一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由十四人组成，主任委员辛易之，副主任委员邱克难，下设四个组：秘书组、总务组、宣传组、组织审查组。委员分工：四个科长在组织组，陈家俊及敖明富在秘书组。参加区党代会议人员，决定每四个党员选一个代表。区营级、工青妇的委员、政府科员以上，各工会及厂内主任及军事代表和组织员为当然代表^①。

同日 区委十月十六日会议决定：十一月二日至四日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主要内容为：（一）发展与巩固党（二）建政（三）学习（四）开展进步运动。

十一月

二日——四日 中共重庆市第一区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举行，历时三天。到工会、工厂、学校等支部及机关代表九十一人。会上区委副书记辛易之代表区委作了“四个月来的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指出：一区组成已四个月，在市委领导下完成了组区、公开党与整风等工作，收到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偏向与缺点：（1）忽视对群众工作的领导（2）党委工作无中心等。今后应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中心任务，重点放在工人工作中，在群众工作上发展党建立党的支部，保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邱克难传达了西南局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巩固与发展问题），讨论了建政工作。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检查批判区委领导上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思想不明确；二、检查区委领导上民主作风不够。到会代表联系各支部实际，认识到党内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上下普遍存在，党的领导松懈，党政不分，党内腐化堕落倾向等。此次检查认真而深刻。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区委的检查与今后工作计划的决议。一般均认为这次大会完成了任务，达到了思想的统一^①。

六日 区委决定成立工作组，组织干部协助工厂工作。电力厂组（包括华福烟厂）由赵广俭负责，码头工会组（包括大汉烟厂）由张志奎负责，其余人员由区委配备，自七日起开始工作。

一区委检查青、妇工作。青委由陈家俊负责、妇委由王奎英负责。

区委决定由宣传部草拟关于党章党纲教育及开办工人训练班计划。加强工人教育^①。

七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一区委定本周为时事宣传周。以张子意对时事传达为主要精神，组织宣传员进行广泛宣传。区委、区府科长、公安分局局长及工青妇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担任宣传员^①。

十一日 根据市委“关于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的指示”，区委召开区委会议，发出了“加强保卫工作”通知。内容有：1. 加强保卫思想教育。2. 工厂成立保卫委员会；机关在支部领导下成立保密委员会；建立严格的人事制度和保密检查制度。3. 对内部进行重点审查。4. 建立防奸保密制度等^①。

十五日 庆祝重庆解放周年纪念会，由郭焕中、张志奎及区政府文教科等负责召集^①。

十六日 一区委在“时事学习周报告”中指出。一周来普遍开展时事学习，取得重大收获。表现在普遍加强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不少同志表示了抗美援朝的决心。但也有几个认识问题：1. 认为“抗美援朝”是非法的。2. 认为“美国并不一定是纸老虎”。3. 漠不关心。经十四日区学委会决定延长一周学习，应有组织地抓住前两种问题教育，展开小组大组讨论最后总结，要求对时事有正确的认识^①。

同日 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各局处、各群众团体等，自今日起组织义务劳动，

在市中区大田湾兴建广场^①。

二十日 根据市委“关于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加强国际主义教育”的指示，第一区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一区支会筹委会，召集人为郭焕中、吴英、杜孝初等。十二月内全区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支分会普遍成立^①。

同日 区委决定建立检查制度，由组织部负责组织检查机构，人员在区委各部处调配。各支部每月进行一次检查，其他部门采取不定期方式检查^①。

二十四日 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正式成立，委员二十一名。筹委会决定大会于十月十八日召开，会期三天^①。

二十七日 区委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到会有：大溪沟电力厂、石油管理局、搬运工会、民权路（包括店员、海员、印刷）等六个支部的支部书记及区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同志。会议主要讨论了发展党的问题。最后，辛易之作了总结，批判了不正确的思想，统一了教育内容与进行方法^①。

同日 区委组织部在“十一月份的工作总结”中向区委报告说，十一月份的工作中心，集中力量在工人中发展党和加强现有支部的领导，进行整理，开展创模运动，及建立各种制度。并在十七日召开了支书联席会，检查了以上工作的执行情况及讨论了发展与巩固组织问题。^①

二十八日 为开好人代会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区委召开党内动员会议。公安派出所所长、工青妇干事、区委干事、区政府科员以上干部参加^①。

十二月

七日 第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支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纪律检查工作，深刻体会到：今后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应该放在支部，维护党的纪律、维持党的政策，要结合中心任务，全党重视，才会作好。要求加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各种建设工作^①。

廿五日 根据邓小平政委的“城市工作”的指示，一区委召开了联席办公会议，检查一次党代会后的工作及今后三个月工作计划，决定于元月四日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会期三天^①。同时决定对五一年元旦节庆祝问题，由各单位各自运用各种形式举行群众联欢会，密切党群关系与党政关系^①。

[注]资料来源：①区委档案局文件，

②《重庆政报》。

区委党史办 武建政 刘灿珣整理

重庆市市中区街道建制沿革

(1929——1984)

市中区档案馆 邹用陆整理

例 言

一、本辑资料、目的在于“存史资治”，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当前街道体制改革服务，特汇编成“重庆市市中区街道办事处建制沿革”资料专辑，以便及时提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参改。

一、本辑资料上限从一九二九年重庆设市起，至一九八四年止。重点记载建国后，市中区街道体制沿革与变化。全区一九五四年初，始筹建街道办事处。一九五五年十月，调整为三十七个，继后又调整为二十八个，继又变为二十六和二十五个，以及十个公社。一九六二年恢复街道建制直到现在，为二十一个街道办事处，同二十一个公安派出所一致起来。从街道体制沿革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市中区的街道体制改革，也是不无参考、借鉴的。

一、本辑资料，统用公元纪年，地名一律采用今名。

一、本辑资料，难免疏漏不全，文字叙述，亦未尽当之处请有关同志及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寄给我们，以便最后定稿为幸！

重庆市市中区街道建制沿革

建国前的市中区

重庆市市中区的由来，始自一九二九年，分巴县城区，置重庆市，定为省辖市。由于重庆工商业不断发展，乡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区，在城郊形成一系列与城区相连的集镇，增辟为新市区：一自临江门，沿嘉陵江，经双溪沟、大溪沟、上清寺、曾家岩达牛角沱；一自南纪门，沿长江，经石板坡、燕喜洞、菜园坝、徐家坡抵兜子背；一自通远门外，经观音岩、上下罗家湾至两路口，这一梯形的大片地地区，通称为新市区。

一九三五年前，城区内仍沿袭明、清的厢坊制，市中区当时则为一至九坊。其中老城区一至七坊，新城区二坊。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川省政府改组，省政府亦由成都迁重庆，分区设置基层。重庆城区划编为五个区，其中市中区为一至三区：第一区署辖原老城区的一坊至四坊；第二区辖城区的五至七坊，第三区即新市区，区署则直辖原新市区的第八、第九坊。这就是当时重庆市市中区的规模。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将重庆市编设为六个区，三十七个联保。其中第一区至第四区则是现在的市中区，有二十五个联保。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后又定为“陪都”。一九三九年五月，重庆升为中央直辖特别市，将巴县、江北县县政府先后迁出市区。进一步拓展市区范围，将全市划为十二个区，改联保为镇，受区领导。其中，第一区至第七区为现今市中区，辖二十六个镇。一九四四年十月，各区区署改组为区公所，各区辖地也有所调整变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重庆市辖十八个区公所，其中一至七区，即今市中区辖境范围。原七个区辖区：

第一区、管辖龙王庙、太华楼、马王庙、镇江寺一带（即现在的朝天门和望龙门、千厮门街办事处的一部）。

第二区、管辖桂花街、大阳沟、蹇家桥、北坛庙一带（即现在的解放碑、大阳沟、民生路和临江门、千厮门街道办事处的一部）

第三区、管辖段牌坊、东华观、东升楼、王爷庙一带（即现在的西三街、储奇门街道办事处）

第四区、管辖观音岩、骡马店、安乐洞一带（即现在的七星岗、捍卫路和较场口街道办事处）

第五区、管辖金马寺、石板坡、菜园坝、宝善寺一带（即现在的南纪门、石板坡、菜园坝街道办事处）

第六区、管辖张家花园、大溪沟、曾家岩一带（即现在的张家花园、大溪沟和上清寺街道办事处）

第七区、管辖上清寺、两路口、中二路一带（即现在的两路口、上清寺和王家坡办事处的部分）

建国后的市中区（即原一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干部接管了原重庆市管辖的十八个区公所。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日，中共重庆市委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条件和方便工作及居民居住等特点，决定将原十八个区公所，重新划定区域。为此，发出《关于建立区级党委组织及政权机关的决定》，将原重庆市一至七区，划为重庆市第一区。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区政权建设的决定，重庆市第一区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在街道办事处设置前，由重庆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派出若干行政、民政干事，驻各公安派出所，承办政府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在调整各区行政区划时，决定将重庆市第四区，亦即原八区（沙坪坝区）所辖的李子坝、黄沙溪、遗爱词三地划入市中区（原一区）范围管理。

一九五四年初，第一区陆续在上清寺、学田湾、张家花园、四德村、中一路、中二路、青年路、民生路、西三街、金汤街、段牌坊、大溪沟、大阳沟、王爷庙、北坛庙、龙王庙、镇江寺、两路口、菜园坝、官井巷、骡马店等街道，筹建街道办事处，作为重庆市第一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办理政府工作。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根据《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国务院《关于市辖区

按地名称呼的规定》，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各区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其称谓按序号，改为按地名相称。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重庆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正式改称为《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同时，相应调整。市中区各街道区域，调整后为三十七个街道办事处：

王爷石堡街道办事处	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	东华观街道办事处
上石板坡街道办事处	下石板坡街道办事处	曾家岩街道办事处
王爷庙街道办事处	马王庙街道办事处	蹇家桥街道办事处
龙王庙街道办事处	王家坡街道办事处	官井巷街道办事处
桂花园街道办事处	黄花园街道办事处	大阳沟街道办事处
桂花街街道办事处	西三街街道办事处	民生路街道办事处
学田湾街道办事处	中一路街道办事处	段牌坊街道办事处
中二路街道办事处	四德村街道办事处	黄沙溪街道办事处
华一村街道办事处	菜园坝街道办事处	骡马店街道办事处
李子坝街道办事处	上清寺街道办事处	太华楼街道办事处
金马寺街道办事处	宝善寺街道办事处	大溪沟街道办事处
镇江寺街道办事处	金汤街街道办事处	
两路口街道办事处	临江门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八年三月，为适应形势需要，便于集中领导，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报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所辖三十七个街道办事处，合并为二十八个街道办事处。其名称是：

曾家岩街道办事处	新民街街道办事处	官井巷街道办事处
镇江寺街道办事处	华一村街道办事处	金马寺街道办事处
桂花街街道办事处	李子坝街道办事处	黄沙溪街道办事处
朝天门街道办事处	桂花园街道办事处	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
临江门街道办事处	两路口街道办事处	中兴路街道办事处
望龙门街道办事处	王家坡街道办事处	小什字街道办事处
南纪门街道办事处	解放碑街道办事处	七星岗街道办事处
储奇门街道办事处	东华观街道办事处	菜园坝街道办事处
大阳沟街道办事处	上清寺街道办事处	
大溪沟街道办事处	中一路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根据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市长办公会议精神，在试点的基础上，报经市人委批准，决定将二十八个街道办事处，合并组建成九个街道人民委员会和一个人民公社。其名称是：

重庆市市中区朝天门街道人民委员会，辖朝天门、镇江寺、小什字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全部和望龙门街道办事处的小部分，人口六万三千零九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储奇门街道人民委员会，辖储奇门、东华观两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和望龙门街道办事处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四万八千七百零六人。

重庆市市中区南纪门街道人民委员会，辖南纪门、金马寺两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和中兴路街道办事处大部地区，人口三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较场口街道人民委员会，辖官井巷、桂花街、新民街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大部、中兴路街道办事处三个段，人口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

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街道人民委员会，辖解放碑、临江门、大阳沟三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地区，桂花街、官井巷街道办事处的一小部分地区，人口四万八千一百八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大溪沟街道人民委员会，辖大溪沟、张家花园两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地区和华一村街道办事处一部分地区，人口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街道人民委员会，辖两路口、菜园坝两个街道办事处的全部，桂花园、中一路街道办事处的一部分地段，人口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王家坡街道人民委员会，辖王家坡、黄沙溪两个街道办事处的全部，桂花园街道办事处部分地段，人口二万零三百二十四人。

重庆市市中区上清寺街道人民委员会，辖上清寺、曾家岩、李子坝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全部和桂花园街道办事处的一部分地段，人口四万二千五百五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七星岗人民公社，辖七星岗街道办事处的全部，中一路、中兴路、华一村街道办事处的大部分地区和新民街街道办事处的两个段，人口七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人。

市中区九个街道人民委员会，设生产组织委员会、生活福利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领导和属下四十个生活服务合作社、二百三十四工厂、一百四十七个托儿所，以及地段的民政、优抚救济、卫生等工作。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市中区九个街道人民委员会在公社化高潮影响下，相继转为城市人民公社，加原七星岗人民公社，市中区有街道城市人民公社十个，同时，保留街道人民委员会牌子。城市人民公社中，设六部一室（生产组织部、生活福利部、文教卫生部、财政计划部、副食品工作部、安全保卫部、公社办公室），生活服务合作社，亦转为公社的下属四十个分社。当时公社所属有十个运输队、十个建筑队、十个医院、十个农场、工厂六百三十六个、托儿所五百二十三个。四十个分社直属有四十个生活服务站（组）、四十个生活运输队。另有三所小学（存心堂小学、中一路小学、神仙洞小学）由七星岗公社直接领导管理。公社和分社名称是：

重庆市市中区七星岗人民公社，辖安乐洞、兴隆街、德兴里、王爷石堡、中一路、华一村等六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上清寺人民公社，辖曾家岩、牛角沱、嘉陵路等三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王家坡人民公社，辖黄沙溪、遗爱祠、王家坡等三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人民公社，辖中二路、中三路、菜园坝等三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较场口人民公社，辖西来寺、和平路、官井巷、中华路、新民街等五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南纪门人民公社，辖金马寺、南区支路、石板坡等三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储奇门人民公社，辖西三街、东华观、解放碑等三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朝天门人民公社，辖小什字、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道门口等五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人民公社，辖民族路、青年路、大阳沟、保安路、临江门等五个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大溪沟人民公社，辖大溪沟、学田湾、张家花园、双溪沟等四个分社。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根据《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规定和市委、市人委指示精神，按照街道办事处与公安派出所设置一致的原则，经重庆市市中区第四届人民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恢复成立二十六个街道办事处。十个城市人民公社相继撤销。所属

企事业分别移交归口管理。恢复成立后的街道办事处名称及管辖范围是：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黄沙溪街道办事处，辖木帮街、竹帮街、交通街、民新街等地区，六个居民段，二千零八十八户，八千零七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王家坡街道办事处，辖上、下徐家坡、遗爱祠、国际村、健康路、王家坡街、王家坡新街、铁路坡、大水井等地区，七个居民段，三千二百六十七户，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曾家岩街道办事处，辖特园路、中四路、上下曾家岩、人民路、人民村、学田湾、春森路等地区，九个居民段，三千三百二十二户，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上清寺街道办事处，辖牛角沱、美专校街、交通巷、新都巷、四维路、市体育场、桂花园等地段，以及嘉陵路、中三路部分地区，十一个居民段，四千一百三十户，一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李子坝街道办事处，辖李子坝河街、李子坝上街、嘉陵新村、建设新村等地区，以及嘉陵路部分地区，六个居民段，一千七百三十二户，八千八百四十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大溪沟街道办事处，辖人民路、马鞍山、下罗家湾、观音梁、建设路、建国村、罗家院、蒲草田、大溪沟等地区，十二个居民段，四千八百四十九户，二万零四百八十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辖人和街、华福巷、猷压巷、菜市巷、枣子岚垭、巴蜀村、张家花园、临华村、黄花园、双溪沟等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零二十二户，一万九千二百三十一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华一村街道办事处，辖富成路、华一村正街、华一支路、华一坡、四德村、一号桥、胜利路、地母亭等地区，八个居民段，三千六百三十六户，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四德村街道办事处，辖观音岩、纯阳洞、黄家垭口、捍卫路、金刚塔地区，以及中一路、兴隆街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五千二百二十户，二万零五百五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七星岗街道办事处，辖归元寺、上下保节院、金汤街、鼓楼街、铜鼓台等地区，以及中一路、和平路部分地区，十四个居民段，五千八百五十一户，二万二千六百零四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石板坡街道办事处，辖上下石板坡、南里、北里、一字街等地区，以及上南区马路部分地区，十个居民段，五千二百三十八户，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南纪门街道办事处，辖南纪门正街、厚慈街、国珍街、猪行街、马蹄街、下回水沟等地区，以及中兴路、上南区马路、解放西路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五千六百二十六户，二万二千二百零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两路口街道办事处，辖两浮支路、中二路、养花溪、文化宫、枇杷山公园、少年宫等地区，以及中三路部分地区，十三个居民段，四千五百七十户，二万零二百五十一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菜园坝街道办事处，辖菜园坝、燕喜洞街、天星桥、太平桥正街、丝厂巷等地区，以及上南区马路部分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一百六十三户，一万七千

三百六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储奇门街道办事处，辖储奇门行街、花街子、凯旋路、月台坝、东华观等地区，以及解放东路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五千七百七十四户，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西三街街道办事处，辖西大街、中街、前街、后街、太平门行街、巴县衙门、四方街、白象街等地区，以及解放东路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五千八百三十七户，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一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小什字街道办事处，辖筷子街、棉花街、九尺坎、药王庙、沧白路、长安寺等地区，以及民族路、新华路、临江支路部分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一百零三户，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朝天门街道办事处，辖信义街、大河顺城街、过街楼、丰碑亭、嘉陵码头、朝天门码头、磨儿石码头等地区，以及新华路、陕西路部分地区，九个居民段，一千七百五十六户，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望龙门街道办事处，辖道门口、太华楼、二府衙、仓坝子、东水门、操场坝等地区，以及陕西路、解放东路的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五千零八十五户，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千厮门街道办事处，辖水巷子、纸盐河街、千厮门正街、小河顺城街、镇江寺街、西水横街、千厮门码头等地区，七个居民段，三千一百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八百一十四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官井巷街道办事处，辖官井巷、中华路、磁器街、木货街、老衣服街、米亭子、况家院等地区，以及民权路、青年路、民生路的部分地区，九个居民段，三千八百四十八户，一万七千九百二十六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较场口街道办事处，辖第三模范市场、新民街、百子巷、月台坝、上回水沟、棉絮街、潘家沟等地区，以及和平路、中兴路的部分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七百七十六户，一万九千零六十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民生路街道办事处，辖大同路、冉家巷、鲁祖庙、川盐三里、临江顺城街、韦家院坝、若瑟堂等地区，以及民生路部分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五百三十九户，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临江门街道办事处，辖临江门正街、北坛庙、象鼻咀、红十字街、大码头等地区，五个居民段，二千六百四十户，九千四百一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大阳沟街道办事处，辖民国路、大阳沟、至诚巷、上下小较场、人民公园等地区，以及保安路、新华路、邹容路的部分地区，十二个居民段，四千零九十二户，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委员会解放碑街道办事处，辖五四路、青年路、临江路等地区，以及民族路、民权路的部分地区，十一个居民段，二千九百七十八户，一万八千零五十二人。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重庆市人民委员会（63）会办字第410号文件批准，同意将市中区二十六个街道办事处调整为二十五个街道办事处，撤销小什字、华一村两个街道办事处，增设和平路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调整后的变化情况是：

解放碑街道办事处，新增划小什字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四个段，和原千厮门街道办事处所辖的新城门街36—43号、六户二十人，共十五个居民段，四千一百八十四户，二万四千四

百七十二人。

大阳沟街道办事处，新增划小什字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一个段，共十三个居民段，三千一百五十六户，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三人。

千厮门街道办事处，将原所辖新城门街36—43号划归解放碑街道办事处管理，新增划小什字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一个段，共六个居民段，三千五百三十九户，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人。

较场口街道办事处，将原所辖三个段的范围，划归七星岗街道办事处管理，居民段减为七个，三千三百九十六户，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三人。

民生路街道办事处，新增划官井巷街道办事处所辖的一个居民段，共十一个居民段，四千八百五十九户，一万九千一百四十二人。

南纪门街道办事处，新增划两个段的管理范围，共十四个居民段，六千五百二十六户，二万五千八百零七人。

四德村街道办事处，新增划华一村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三个段，和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所辖捍卫路五巷1—23号和40号及胜利路189号，二十八户、九十四人，共十五个居民段，六千七百五十一户，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九人。

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将原辖捍卫路五巷1—23号、40号和胜利路189号，划归四德村街道办事处管理，新增划华一村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两个段，共十二个居民段，四千八百一十三户，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五人。

王家坡街道办事处，新增划菜园坝街道办事处所辖兜子背河街35号41号，和养路工区1—18号二十七户、七十二人，共七个段，三千二百九十四户，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五人。

朝天门街道办事处，新增划小什字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四个段，共十三个居民段，三千一百五十六户，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三人。

官井巷街道办事处，将原辖一个段划归民生路街道办事处管理，九个居民段减为八个，三千四百三十八户，一万六千二百二十六人。

菜园坝街道办事处，将原辖一部分，划归王家坡街道办事处管理，居民段仍为十个，户数减为四千一百三十六户，人口减为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七人。

七星岗街道办事处，辖地母亭、中医院，上下安乐洞，上下保节，归元寺前、后、中街，中一路、双龙巷、普灵寺、兴隆街等地区，十个居民段，四千五百三十户，一万六千二百一十一人。

和平路街道办事处(新增设)，辖原七星岗街道办事处所辖新民街、潘家沟、和平路、放牛巷、天官府、金汤街、古楼街、领事巷等地区，有八个居民段，三千零一十九户，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五人。

上述十四个街道办事处中，和平路街道办事处系增设，有十三个街道办事处调整后，管辖地区、居民段、户数和人口均有所增减。

黄沙溪、上清寺、曾家岩、石板坡、大溪沟、李子坝、西三街、临江门、望龙门、储奇门、两路口十一个街道办事处，调整后，管辖地区、地段、户数和人口均无变化。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重庆市人民委员会以(64)渝会秘字第204号文批准，同意市中区人民委员会撤销黄沙溪、曾家岩、官井巷、和平路四个街道办事处，其余街道办事处的设置，与二十一个公安派出所一致起来，便于协作配合搞好街道各项工作。撤销合并后的四个街道办事处是：

王家坡街道办事处(包括黄沙溪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地段、户数和人口),有十三个居民段,五千三百一十二户,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人。

上清寺街道办事处(包括曾家岩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地段、户数和人口),有二十个居民段,七千四百五十二户,三万六千五百零二人。

较场口街道办事处(包括官井巷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地段、户数和人口),有十五个居民段,六千八百三十四户,三万一千四百八十九人。

七星岗街道办事处(包括和平路街道办事处撤销后的地段、户数和人口),有十八个居民段,七千五百四十九户,二万九千零四十六人。

此外,其他十七个街道办事处无变动。但是,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市中区二十一个街道办事处,均受到冲击而被“夺权”,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市中区各街道开始建立街道革命委员会。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重庆部队市中区支左办公室批准,各街道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和名称是:

重庆市市中区前哨街街道革命委员会(原临江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曙光街街道革命委员会(原望龙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东风街街道革命委员会(原西三街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赤卫街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千厮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灯塔街街道革命委员会(原石板坡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红旗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四德村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红卫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朝天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长征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南纪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向阳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上清寺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大寨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七星岗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五一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大阳沟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幸福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民生路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兰考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菜园坝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大庆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储奇门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大溪沟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红星路街道革命委员会(原两路口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街道革命委员会,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红卫广场街道革命委员会(原较场口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工农兵街道革命委员会(原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延安村街道革命委员会(原王家坡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成立。

重庆市市中区红岩新村街道革命委员会(原李子坝街道办事处), 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成立。

根据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全市街道名称进行整顿的指示, 市中区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 开始对全区街道名称进行了调查整顿和审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一日办公会议, 对市中区街道革委会名称作了全面审定, 决定从十二月十五日, 对外工作一律使用统一名称。审定后的街道革委会是:

重庆市市中区朝天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望龙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千厮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临江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储奇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南纪门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较场口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菜园坝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李子坝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捍卫路街道革命委员会

(原为四德村街道办事处因含有封建色彩, 故整顿街道名称时, 改名捍卫路)。

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七星岗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王家坡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石板坡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大阳沟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大溪沟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西三街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上清寺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民生路街道革命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张家花园街道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转发市民政局《关于改变现有街革委体制的具体意见》中指出: “遵照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精神, 城市街道应设立办事处, 作为区革委会的派出机构, 不再设立革命委员会”。“全市现有的街道革命委员会, 一律改为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 仍按原街革委的范围不变”、“全市各街道办事处统一在今年七月改换吊牌、启用新印章”。市中区二十一个街道革命委员会遂恢复街道办事处, 作为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其全称是: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朝天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望龙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千厮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储奇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南纪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两路口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较场口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菜园坝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李子坝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王家坡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石板坡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大溪沟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大阳沟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解放碑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上清寺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西三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临江门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民生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捍卫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七星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按照市委的部署,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至十二日,举行了重庆市市中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正式行文之日起,原重庆市市中区革命委员会宣告结束。作为它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同时改为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直至现在。其名称是: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朝天门街道办事处,有十三个居民段,六十四个居民小组,五千八百四十五户,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储奇门街道办事处,有十二个居民段,一百一十五个居民小组,七千零八十六户,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六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望龙门街道办事处,有十二个居民段,八十五个居民小组,六千三百一十一户,二万零六百九十七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千厮门街道办事处,有八个居民段,四十三个居民小组,三千四百二十九户,一万零六百五十四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临江门街道办事处,有五个居民段,二十九个居民小组,二千二百九十五户,七千零九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南纪门街道办事处,有十三个居民段,一百零一个居民小组,六千八百一十一户,二万二千三百四十五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两路口街道办事处,有十四个居民段,七十五个居民小组,六千七百二十七户,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较场口街道办事处，有十五个居民段，九十二个居民小组，九千一百七十一户，二万九千三百四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菜园坝街道办事处，有十个居民段，五十九个居民小组，四千四百四十三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六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李子坝街道办事处，有六个居民段，五十三个居民小组，二千四百九十二户，八千七百九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王家坡街道办事处，有十三个居民段，九十七个居民小组，六千二百九十一户，二万零九百二十一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石板坡街道办事处，有十个居民段，六十一个居民小组，四千零八十五户，一万三千零一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大溪沟街道办事处，有十三个居民段，一百一十七个居民小组，七千三百零七户，二万五千八百零四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大阳沟街道办事处，有十一个居民段，八十个居民小组，六千三百三十五户，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民生路街道办事处，有十一个居民段，六十二个居民小组，六千五百四十一户，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捍卫路街道办事处，有十五个居民段，一百二十一个居民小组，八千四百户，二万八千四百一十九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有二十二个居民段，一百三十四个居民小组，一万一千九百三十户，四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解放碑街道办事处，有十四个居民段，一百一十六个居民小组，六千五百八十三户，二万三千二百五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西三街街道办事处，有十二个居民段，八十三个居民小组，六千六百五十三人，二万二千五百四十八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七星岗街道办事处，有十七个居民段，一百二十一个居民小组，八千九百三十户，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张家花园街道办事处，有十三个居民段，一百零七个居民小组，七千三百九十八户，二万六千四百九十八人。

资料来源：

- (1) 《重庆简史和沿革》一书；
- (2) 市中区档案馆保存的政府全宗档案材料；
- (3) 1984年市中区《统计年鉴》。

一九八六年五月 初稿

“一二·九”前后的川东师范

张仲明 胡其谦

(一)



重庆川东师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原名“川东师范学堂”。创建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川东道尹张振兹倡议创办。校址设在重庆学政使试士院，后迁到巴县文庙(今市中区解放东路黄学街)，后又迁到上半城学院街(今市中区较场口、石灰市、模范市场一带)。1914年，改名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20年，改名川东公立师范学校。1930年，校址由学院街迁今市中区两路口石马岗

(现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935年，改名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因蒋介石“剿共”，不能用“共立”)。1936年，改名省立川东师范学校。^①1939年，因“五三·五四”日寇飞机两次大轰炸，学校于五月底迁江津县白沙镇。1940年，省教育厅要改名“重庆师范学校”，经全校师生据理力争，仍保留了原校名。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由江津白沙镇迁回重庆原校舍。重庆解放后，1951年迁沙坪坝区歌乐山与市师合并，石马岗校舍改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953年，再与重庆二女师和北碚重师合并，搬到北碚团山堡新建校舍，命名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

川东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川师)，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富有革命传统。自建校后，先后有杨闇公、童庸生、肖楚女、张闻天、漆南熏、杨伯凯等革命前辈在学校执教，播下革命火种，建立党、团组织，领导了青年学生们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革命斗争。如川师第一班学生赖以庄，是老同盟会员，解放后是爱国的老教授；童庸生，川师第二班学生，是四川省早期中共省委成员；张朝宜，川师第十三班学生，1927年曾任武汉三镇工人纠察总队队长；马英，川师第十四班学生，1926年曾任湖南省委成员；张昔畴，川师第十五班学生，大革命时期曾任四川学联主席，川东学联主席；代士桢，川师第十四班学生，大革命时期，曾任共青团地委学委书记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7年“三·三一”大惨案止，川师学生参加党、团的约有七十多人，这既是革命星星之火，又是民主革命的一股激流。从1924年到1927年这一时期中，重庆学生的民主革命、爱国主义的运动，都是川东学联所领导的反帝、反建封、反军阀混战的斗争，同时也有对国民党右派，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这一浪高过

一浪，接踵而来的急风暴雨、惊涛骇浪般的运动中，川东师范的学生都是同中法大学、中山中学、女二师、巴县国民师范等进步学校的学生，一起站在斗争的前列。而川东学生联合总会，重庆学生联合会，又是设在川东师范学校内，所以那时川东师范的学生，总是紧跟时代激流，奋勇向前，面向敌人，短兵相接，去迎接战斗。^②

(二)

“三·三一”惨案后，重庆党、团组织遭破坏，不少党、团员遭屠杀，革命处于低潮。这时川师被勒令停办，刘湘派川东道尹甘绩镛处理善后。甘提出建立校董会，整顿清理内部，保留川师学校。刘湘遂委甘绩镛为校长。甘聘国家主义派张德敷为总务主任，总揽校务，对学生采取怀柔软化政策。因此，学校从1928年到1933年一段时间，除CY在校外参加“飞行集会”，贴标语外，一般说来是较为平静的。但在平静之中，却酝酿着怒涛。

1934年秋，川东师范在石马岗新校舍，招收了后期师范廿一班三个组，初中五班一班，和普通科一个班，共约二百人左右。其中文史组有学生李忠慎(即李新)、张仲明、杨尊贤、刘枝树、王方琴、刁贞琼等。数理组有刘兆丰、蒋兴鼎、邓祖淳、涂家深、熊昌荆、邓天普、廖廷辅等。博物组有李成之(即李直)、胡其谦、周极明、王方名、刘伯平、秦绍述、周景福等。初中五班有余耀泽、欧德级、宋克勤、白诗甫、冯光乾、钱永发(即钱永寿)等。这时川师除了新生外，后期师范还有19班，20班文史、数理各两个组，普通科有19、20、21三个班(19、20班是重庆大学的两个预科班，是在1934年秋，全部师生并入川师的)^③，初中部还有中三、中四两个班，总计这时川东师范在校学生约有七、八百人，另外还有几百人的附属小学。

川师学生，是由川东三十六个县的学生报考，择优录取的，学生完全是公费(包括伙食、制服、书籍等费)。公费名额，大县10—12名，小县5—9名。学生进校后，按成绩依次递补公费。考入川师的学生，大都是家境清贫，家庭地位低下，受着封建地主、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因此，对社会现实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满，都有着一种易于接受改变现实的因素，从而也就具有好胜、上进、敢于反抗黑暗的素质。川师学生都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由私立宏育中学进入川师的19班学生杨鹤鸣，便是全重庆市统一会考的第一名。1935年，全市高中文竞赛，题目是“论鸦片烟之危害”。评卷结果，二女师的万春秀是第一名，川师的张仲明是第二名，联中的成文高是第三名。1935年，重庆市教育局在夫子池举行全市高中军训大检阅，川师学生都身穿黄色德国咔叽制服，头戴圆盘大帽，背着步枪，雄纠纠地进入检阅场，由廿一班值日学生王孝仙发口令，带着学生正步通过检阅台，然后又进行分列式，枪上肩等操练。评比结果，川师军训名列全市第一。

1934年秋，学校聘请夏子明任训育主任。夏以高压手段压服学生有名。一天，19班数理组学生张大宣，在夏子明晚上查寝室点名时不开门，隔着门说在换衣服。夏子明就怒气冲冲回到办公室，要校工严大庆去喊张大宣来个别谈话，张就提着裤子去见夏。夏大怒，认为张有意侮辱师长，便要开除张。第二天，学校就挂出除名牌告来。19班学生徐光华(原来参加CY)、杨鹤鸣、王国华等就联合20班学生罢考(这一天是物理教师侯息蕃考物理)，以示抗议。19班全班同学一起拉出学校，到校外七星岗金山饭店住着不回校，并向学校说：“如果不收回开除张大宣的成命，全班学生便要一直住下去。”同时，徐光华等还利用军事教官卢植仙与夏子明的矛盾，要卢植仙去作刘湘的参谋长徐孝匡的工作(卢系徐孝匡介绍到学校来

的),徐孝匡又去作校长甘绩镛的工作,甘只好命夏子明收回开除成命。

1935年的上半年,一次,省督学到学校视察。夏子明要学生统统穿上黄色德国咔叽制服。21班文史组的李忠慎同学,穿的却是黄色的布制服。夏子明便要李忠慎去换,李忠慎对夏说:“我们是中国人,穿国货不是很好吗!”随后,李忠慎更进而联络19班、20班十几个喜欢穿布衣服的同学,成立了“布衣学会”,以示对抗到底。夏子明对此莫可奈何。从此,学校的高压政策,受到了同学们有力的挑战,训育主任夏子明的威风被大大地削弱了。

初中4班学生秦录廷,石碛县人。他的父亲秦忠夏,被县里的恶霸勾结土匪杀害了。秦录廷告到县里,县长根本不理。秦录廷气愤已极,就亲自持枪把恶霸打死,然后去投案自首坐了牢。消息传到学校,学生们都认为秦录廷为父报仇,打死恶霸的行为是正义的,是敢于反抗黑暗的表现,要求学校营救。校长甘绩镛(四川省政府厅长,20军政务处长)给石碛县长写了信,秦录廷的家属亲友又作了些营救工作,秦就被释放出来,回校继续读书了。从以上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川师学生的好胜、有进取心和敢于反抗黑暗的好素质。

(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围剿”,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这年冬天,红军到达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材的“红边边”军队被红军打得溃退到四川的南川、綦江、巴县一带。同时,川陕鄂边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也向南扩张。宣汉、达县吃紧,蓬溪、营山告急。军阀刘成厚急向杨森、刘湘求救。川东的酉阳、秀山一带,红军贺龙、肖克部也在向西进攻。四川这时,南、北、东三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击。重庆大大震动,军阀、富商、土豪劣绅都惊慌万状。这时,川东师范的学生,有的对时局在观察分析,有的对中国的道路在探索。国民党蒋介石、军阀们在“围剿”,在追堵、在屠杀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怕杀,反而越杀越多?国民党、军阀们大肆宣传共产党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洪水猛兽,为什么穷苦人民都愿意参加共产党?红军的长征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通南巴和在秀山、酉阳的扩展,好象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在川师学生们的心中立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波涛。

1936年春天,21班文史组勤奋好学的李忠慎(李新,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博物组多才多艺、善于交友的李成之(李直,原国家农垦部农机局副局长)(他们入学前就在成都参加了CY),秘密发起组织读书会——众志学会,以敦笃友谊、交流学习心得为宗旨。先后经他们介绍吸收的会员,有博物组的周极明、胡其谦、王方名;文史组的张仲明、杨尊贤以及布衣学会的一些同学。学会会员,除了在图书馆借阅巴金的《春》、《秋》、《家》,巴金译的《光鲁波特金自传》,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彷徨》、《阿Q正传》等书外,李忠慎与书库管理同志相熟,就常到图书馆书库去借出《哲学入门》、《哲学讲话》、《新生》等读物供学会会员阅读。

李忠慎在办起“众志学会”之后,又筹办了《众志壁报》,第一、二期刊登了李忠慎写的《黑格尔哲学之研究》的文章,主要介绍了矛盾的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定律。壁报贴在教学大楼底层过道贴报栏上,学生们一下课,都争着来阅读。壁报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但也引起了训育主任夏子明的注意。当出到第三期时,因为有讽刺学校和当局的文章和漫画,夏子明就赤膊上阵,亲自撕了壁报,并把李忠慎叫去,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勒令壁报停刊。当时川师的大多数学生本来都在埋头读书,并不知道什么是黑

格尔哲学，更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夏子明这一思想镇压，却使一些不满现实，而又在探索人生道路的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开始秘密地买或借《卡尔主义》、《伊里奇主义》等书籍来学习。这就为日后川师学生们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这是反动的思想镇压者之流没有想到的。

21班博物组的李成之(李直)，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同学，曾多次邀约一些爱活动的同学如周极明、刘百平、杜佳庆等去南山、黄山、汪山、老君洞等地游玩，并在学校的大操场骑自行车。记得每天下午课余，李成之便常带着同学们去校外租自行车，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地教。这一活动，深得同学的爱好。因此，每天常有几十、百把人在大操场骑车，如周极明、刘百平、王方名、陈家国、张仲明、周景福等都是骑车的积极分子。这样，李成之周围便团结了大批同学。

1935年5、6月份，蒋介石在四川的反共反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康泽(兰衣社头目)的别动队来了，贺国光为首的蒋介石行营来了，宪兵三团来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先后来了。他们在政治上立即推行“以援剿剿匪各省先例，划该省为18行政督察区，各设行政督察专员，以为完成清剿、改善政治之枢纽”^④的行政制度，编查保甲，组训保安团队，修建碉堡，在社会上推行所谓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并大肆狂吠“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还调训中学校长，强迫加入国民党；在各中学派遣军训教官。川师便派来了任朝绪、贾其康任教官，强化专政谍报系统。暑假，四川成立军训处，康泽任处长，在成都主办学生集训。川师20班学生被调集训。李成之(21班)却自动报名参加。据李回来对胡其谦说：“我去的目的，是了解反动派在学生中的活动。”他说这次集训，主要是灌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政策，诱骗学生参加反动组织。果然，川师20班集训回来后，贾其康、任朝绪便借口军训处命令，要在学生中成立模范队，由教官领导(据川师聂校长材料，说是搞的“忠义救国队”)^⑤。模范队长有李春城、王月生、王守一、张学遂、池兼善、李光辉等。这些人便经常在学生中搞密报，监视“学联”同学的活动。以后又组织学生抗敌后援会，与学生“救国会”对立。

川师学生将来是要当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都是需要口头表达能力的。21班秦绍狄、李成之等，在《众志壁报》停刊后，便发起组织“演讲研究会”。这不但得到广大的同学赞同，积极报名参加，学校当局也表示支持。从1935年秋季起，“演讲研究会”曾在川师大礼堂请了教育界一些名流、专家、教授作演讲，如请重大理学院院长何鲁，物理教授周太玄，英语教师文幼章等。记得蒋介石入川，重庆街上戒严，何鲁坐着轿子回家，不让通过，在街上等了几个小时，何鲁气得不得了。川师演讲会请他演讲时，何鲁就针对蒋介石入川，进行所谓“追剿”共产党；大力推行所谓“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不顾人民死活，大征“安川费”“剿赤费”等祸国殃民的暴行，他大讲了蒋介石不抵抗日寇，丢失国土，不要祖宗，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他蒋介石还配讲什么“忠孝”？枪口不对外，专打中国人，还谈得上什么“仁爱”？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弄得民不聊生，还谈什么“礼义廉耻”？他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骂得淋漓尽致，狗血喷头，揭露了反动派当时的欺骗、愚弄群众的伎俩，深深地打动了全校同学的心，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正因为如此，反动的军事教官任朝绪、贾其康与训育主任夏子明勾结一气，急忙在幕后策划，一面取缔“演讲研究会”，不让再活动；一面指使“忠义救国队”的李春城、王月生、池兼善等出面组织什么“演讲比赛会”。他们先后请了反共专家艾迪博士讲什么“赤匪的赤化不合国情”；别动队头子康泽讲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梁漱溟讲什

么“乡村建设救中国”；叶元龙讲什么“救国必须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等。他们虽然每次都在大礼堂吹得天花乱坠，但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丧权，反动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却是无法掩饰得了的现实生活的丑恶事实。这就更加激起了同学们的不满，更加促使同学们去探索革命的爱国救国的道路。

(四)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侵略东北三省后，1935年，它的铁蹄越过长城，踏进华北。蒋介石政府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华北搞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件。6月，签订“何梅协定”，撤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份主权出卖给日本帝国。10月，又策动殷汝耕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7日，又决定由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组织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北平的大中学生，在中共中央《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下，在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影 响下，在中共党的直接领导下，12月9日，万余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律对外，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北平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用木棒、大刀、水龙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许多同学被打伤，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更大斗争。10日，全市学生罢课。16日，全市学生和广大市民在中共党领导下，再次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袭击，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打破了反动政府和汉奸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迷梦。

当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各界群众闻声立即响应。《新蜀报》《商务日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呼吁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国，共赴国难。

川师学生20班的杨照临，21班的李忠慎、李成之等，首先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酝酿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实际行动。这时，重庆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尚未动起来，李成之、李忠慎、杨照临等同学都非常焦急，便去找《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提出如何发动同学，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问题。当即商定由《新蜀报》发表李忠慎起草的题为《重庆的学生到哪里去了？》的短论。这一短论一发表，重庆各校学生就行动起来了，都纷纷到川师来联系。如重庆大学的聂士骥，二女师的万春秀、饶友瑚，省女职的鲜××等。经各校代表商定：一、各校立即发动同学，在各校附近街道展开抗日救亡宣传；二、以学校为单位，筹备成立“重庆市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并委川师代表起草“学联”章程和请愿书；三、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基础上，定于12月24日在都邮街柴家巷重庆大学办事处召开“学联”成立大会。

之后，川师李成之、李忠慎、杨照临等，又连夜起草通电，于12月22日，以川东师范全体同学的名义，连发三电，分致全国同胞、国府主席及北平同学，呼吁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日本破坏我国领土完整，共赴国难。这三封电文是：

（电一）全国共赴国难。南京中央社转全国同胞公鉴：冀东自治，显系奸人作祟，有目共睹，无庸指辩。近更逞其毒螫，浸及平津，河山呈变色之概，华夏入危亡之境，邦国殒瘁，迫在旦夕。北平各校同学见危授命，奋然蹶起，以罄折衷之析，作救国之呼号，凡属破坏领土与主权，无论巧名如何，一概反对。热血益心，可格鬼神，伸正气于天下，显大义于人间，幸赖心理国防，

强鼓民族意识。我全国同胞，亟应唱于相随，共赴国难，以图相存。除电呈中央，恳即乾断捍卫，又电应北平各同学，誓为后盾外，特此电闻。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叩养。

(电二)保障爱国运动。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勋鉴：国步艰难，至今益急，殷逆背叛冀东，汉奸滋蔓平津。丧心已极，覆载不容，荒谬机构，首足无别。平市学生，懔伊川为戒之慎，尽家庭呼号之能，事属救国，谊亦正大。乃惨被拘捕，何以示后？恳飭平市当局，迅释被捕学生，并明令保障嗣后一切合法爱国运动，以正纲纪，而固国本。谨此电陈，伏乞鉴垂。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叩养。

(电三)应保领土完整。北平清华大学转北平各同学钧鉴：浩气磅礴，慷慨万古，英勇精神，至所钦慕。国家应保其领土之完整，绝不容有类似分裂之组织，以启衅端，而害国本。时危寇深，敬希贯彻初衷，誓为后盾。除通电全国同胞一致声援外，谨此电应，并祝胜利。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叩养。(新蜀报二十二日载)⑥

全市三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响应了川东师范、二女师、省女职、重庆大学等校学生的倡议，于12月24日，以学校为单位，推出代表，在重庆大学驻城办事处成立了“重庆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大会上，除了各校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市政府、市党部的代表参加。在讨论通过“学联”章程时，市党部的代表提出要加上“学联”应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内容。代表们则认为“学联”是学生爱国的自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不用加上“在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字句。双方相持不下。川师李成之建议大会休会，然后请了女二师、省女职、重大代表商量，认为我们的斗争要注意策略，因此不必同市党部的人争论，“学联”只要掌握在我们进步学生手里，加上“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字样也无关系。同时李成之还建议，大会选举学联主席团和各处负责人，都只选单位，不选具体人，以免市政府、市党部今后打麻烦。大家都赞同了他的意见。大会复会后，便很顺利地通过了章程，选举出学联机构。川师负责大会的秘书处，女二师负责组织处，省女职负责宣传处。

大会后，一面派出代表(有重大的聂士魁、×××，川师的杨照临、李忠慎、李春城，女师的万春秀、饶友瑚，省女职的鲜××等)向国民党蒋介石行营请愿，提出请政府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一面各校立即组织学生分三路(七星岗、武库街、都邮街为一路线，大梁子、朝天门为一路线，下半城为一路线)进行宣传，发表抗日救国演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七星岗宣传的宣传队，进行宣传演讲时，有几个日本人来照相，被宣传的同学包围起来责问。在“学联”总部指挥的李成之，赶忙通知李忠慎，要他马上去劝阻同学，不要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这样就避免了国民党乘机捕人的事件。

自此以后，市内及近郊学生们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全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发表了《告全市学生书》，积极支持和赞扬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码头工人也拒绝起卸日货、英货，声援学生抗日斗争。重庆市的爱国抗日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国民党当局对此惊恐不安，遂暗中通知重庆市各学校提前一周放寒假，以分散学生的抗日爱国力量。寒假中，川师的李成之约了周极明、胡其谦、刘兆丰、王方名等办起重庆市民众补习学校，地点在凯旋路附近下半城的东华观小学校内，课程是补习国文、数学，同时大讲时事，宣传抗日救国。学生人数较多，每个教室都有二、三十人。

1936年3月，开学不久，重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被国民党当局强迫勒令解散。挂在重庆大学驻城办事处的“学联”的牌子也摘掉了。重庆“学联”当时仿效北平学生的作法，秘密发出通知，号召全市爱国学生，要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及各界人士，共同奋起，抗日图存。因此，“学联”虽被解散了，但各学校中“学联”的骨干分子，

仍然继续相互联系，坚持分散的宣传活动。川师的李成之、李忠慎还暗中派了王方名去成都，同成都学校的学生挂钩，互通情报。

就在重庆“学联”被解散的同时，“学联”骨干、川师的李成之被蒋介石行营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川师学校当局也挂牌除名。约一月后，因为找不到什么“罪证”，同时李成之的亲友又积极营救，李成之被释放了。但他仍住在市内，还经常与李忠慎、胡其谦等联系。1936年夏天，20班的杨照临毕业离校，21班的李忠慎被学校勒令转学万师（实际是强迫退学），川东师范的“学联”主要骨干都不在了。但抗日救亡秘密“学联”的活动并未停止，只是隐蔽一些分散一些罢了。

（五）

1936年暑假中，江北县教育科科长蒋为堃（川师、女师的教育学科教师）要办三所民众学校。在川师找了胡其谦去江北县洛碛镇办民校。该校教员，由胡其谦、李成之商量后，请了川师的周极明、杜佳庆、阎修文、廖寿生等，由李成之包了一只小船一道去洛碛。民校教材，是由李成之根据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所用教材和北新书局、开明书局出版的民校教材编辑而成的，一面编，一面由杜佳庆刻印。油印机是重庆“学联”秘书处存在川师的，以后就交给胡其谦保存。1937年秋，胡其谦曾带去万县高峰场小学。学校经费，除江北县教育科拨的一百元外，教员的伙食都是自己出的。

也是在1936年暑假，川师“学联”的张仲明、周景福等，约同四川省教育学院的周景原、周方伯，省女职校的雷良明、胡朝菊，省高商的冷远猷等廿多人，以铜梁旅渝同学会名义，与铜梁县教育科、民众教育馆联合办起了铜梁民众识字学校。经费由县教育科出，教材由民众教育馆供给，教员由旅渝同学会返铜同学担任。学校校长由县教育科长王定一担任，副校长由周景原担任，教务主任由张仲明担任。学校每晚除上国文、珠算外，还大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也教唱《渔光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歌曲。时间约一个月左右，在县城影响很大。

1936年8月，日寇梦想把魔掌伸到既无日侨、又不是通商口岸的成都，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日本人井岩也到了重庆。消息传来，成都、重庆立即掀起反对日本在蓉设立领事馆的斗争。川师“学联”的同学，暑假留校的如熊运巨、周鹰培、欧德级等都积极响应“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立领事馆大会”的号召，参加了宣传和请愿活动。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的噩耗传来，重庆市救国会决定，在市商会礼堂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川师的“学联”同学王方名、周极明、胡其谦、张仲明、杨尊贤、王子云等都去参加了追悼会。会上，《新蜀报》主笔漆鲁鱼号召大家要以鲁迅为榜样，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抗日救亡、为民族生存战斗到底。会后不久，在原“学联”基础上，仿照上海“救国会”，成立“重庆市学生界救国会”（简称“学救”）。川师原参加“学联”的同学都参加了“救国会”。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张北地区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重庆“救国会”发动“学救”、“职救”、“妇救”统一行动绥援募捐。川师“学救”会胡其谦、张仲明、周极明、王方名等也成立了劝募组到街头去劝募，所募得的捐款，最后都统交“蒋介石行营”汇给抗日军队。

1936年12月12日，突然传来在西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说是张、杨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但真象是不清楚的。这时，川师的英语教师周远鹤（周钦岳的弟弟，中央大学毕业生）、李绍华就常选教一点上海《字林西报》（英文）、《弥勒氏评论报》（英文）、《中国呼声》（英文）中所载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报道，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大家更是争着上街买报看，想尽早知道“事变”同抗日救国的关系。后来得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力主在抗日救国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最后接受了中共、张、杨所提条件，并在张学良、端纳、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飞回南京。全国长期黑暗的统治，不打侵略者而专打自己人的局面可望结束，中华民族的复兴有望了，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六）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刘湘都为了削弱对方，强化自己，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尖锐。在军事上，蒋把刘的得力师长王方舟、范绍增、唐式遵等收买，升为军长，架空刘湘；在经济上，中央银行入川，不准刘湘的地方银行发钞票，而且还压低地方券与中央券的兑换比值，使刘湘在经济上动弹不得；在行政上，更进一步强化专员制度，如第三区的沈鹏在他的专署内不用四川人，所用亲信又多与复兴社有关。又如第十四区的田湘藩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心目中只有“行营”，没有刘湘。^①对此，刘湘大为恼火，也采取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措施。如拉拢一些四川军阀，允许他们在驻地有特权；如省民政厅（甘绩镛任厅长）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充实各县县长，以掌握基层实权；又如举办税收人员训练班，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等等。这时，我党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来川，作了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这一情况下，重庆的反共气氛开始稀薄。再兼以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推动下，局势逐渐向团结抗日的方向好转。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西安事变”时，党中央当机立断，促成和平解决，形成团结抗日的格局，这就更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时，川东师范的一些“救国会”的同学们，好象都开始看清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金光大道。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因此都如饥似渴地争相购买、阅读新的书籍。这些书籍是：邹韬奋的《永生》、《萍踪寄语》，金仲华的《世界知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讲话》，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母亲》，以及鲁迅、矛盾、巴金等的小说。都想抓紧学习，走上这条金光大道。

在这同时，川师同学中21班的杨尊贤、张仲明、刁贞琼、涂家琛、廖廷辅，23班的王子云，川师附小的颜碧野等，不断地在《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一些抗日救国的文章。如张仲明就在《新蜀报》“教育与青年”副刊（蒋成堃主编）上发表了“警告某些学校当局”（因一些学校在1936年不断默退进步学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铜梁县巡礼》，揭露地方团总的压迫剥削；在成都《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怒吼吧！重庆》，大声疾呼青年们起来抗日救国。

李成之1936年虽被川师除了名，但仍在涪陵、大足等地教书，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秋，李成之在涪陵女中教书，校长皮定钧。李成之在涪陵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皮校长调任大足县城厢小学校长，李成之也去大足城厢小学任教。李忠慎在1936年秋

去万县，转学不成，就去《万州日报》当校对，以后由欧阳光明介绍去万县高峰场小学教书。1937年暑天，李成之、李忠慎都来重庆。李成之住保安路一个旅馆内，约李忠慎、胡其谦、周极明去看他，并给他们每个人照了单身像，也照了集体相。在7月7日前的一个下午，他约定他们在川东师范等他。他到后，他们一起去两路口枇杷山的一条小道上（即现在第三人民医院前面）。他告诉他们，党组织已批准他们入党了。然后由他宣读誓词，他们举左手跟着念。他告诉他们，他是大足县城厢党支部的，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要保守秘密，以后由李忠慎个别与大家联系。暑假后，李忠慎、胡其谦去万县，胡到高峰场小学教书，李到万县三正埠民教馆工作；周极明去长寿教书；李成之则去成都（后来才知道他去川康特委组织部工作）。

1937年双十节前夕，李忠慎、王方名同到高峰场小学演《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用李忠慎改编的四季调，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还一起研究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问题。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并通知了周极明、李成之。李成之则要我们取道成都（实际上是要我们去接组织关系）。我们只考虑路费不够，没有去成都。我们搞了“重庆大学公路考查队”、“万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万县文化界救国会宣传队”的介绍信，取道川北，经阆中、广元去西安，沿途又是宣传又是演出。在阆中，有两个青年要同我们一块去延安，我们谢绝了。1938年3月初到了西安，周极明在街上遇见李成之，约我们去西安北大街他住的旅馆见了面，他给了我们一份油印小册子，是洛甫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文章。他说他在三原青干校毕业了，明天去延安。关于我们去延安的办法，一是找“民先”，由“民先”介绍去延安；若找不到“民先”，便先去三原青干校学习，再转延安。这时，李忠慎找到他的同学严利民（在西北联大学习），通过严找到了“民先”。我们同行的七人，“民先”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同意了李忠慎、胡其谦、周极明、王方名、罗义怀等五人去延安，并介绍我们参加“民先队”。我们去陕北公学后，便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去延安没有转党的关系。李成之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就走了，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去延安又重新入党。）

1937年上半年，在川师校内的“学联”积极分子杨尊贤、张仲明就参加了《新蜀报》金满城为首的“人力周刊社”，王子云参加了李华飞主持的“春云社”。同年5月，他们都参加了公开成立的“重庆市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方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杨尊贤、张仲明认识了原川师中二班的刘志刚。刘系由南京安徽中学回重庆的地下学联骨干，与漆鲁鱼接上头后，就成了重庆救国会“学教会”的骨干。1938年春，由刘志刚介绍，杨尊贤、张仲明参加中国共产党。杨尊贤又介绍刘兆丰、王子云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初期，川东师范学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接受教育锻炼后，又参加“学联”、参加“学教会”的同学，如20班的杨照临（原二野战军的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熊运巨（即熊扬，原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21班的李成之（原中央农垦部农机局副局长，即李直）、李忠慎（即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胡其谦（原重庆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周极明（原鲁艺太行分院音乐系主任）、王方名（人民大学哲学教授，逻辑学研究所所长）、张仲明（原渝州大学校长，中共重庆市顾委委员）、杨尊贤（原上海蓬莱区税务局局长）、刘枝树（已逝世）、蒋兴鼎（西南农业大学农化系主任）、刘兆丰（省人大经委副主任）、邓祖淳（已逝世）、熊昌荆，22班的姜宣（省农工处长）、范荣茂（即范硕默、彬彬森，原省机械厅科长），23班的周鹰培（贵阳师院副院长）、王子云，中五班的余耀泽（原重庆市副市长）、宋克勤（原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欧德级（原西藏工

在重庆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冯 兰 瑞

编者按：冯兰瑞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兼《经济学周报》社社长。1985年，市中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部份老同志座谈会时，因公未能来重庆。后来，区委党史办同志去北京拜访了她。承冯兰瑞同志十分热情接待，畅谈了三小时，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她家住城区，在川东特委青委和在育才学校工作，直到撤回延安的一些情况。现将访问时她口述的情况整理于后，以存史料，仅供参考。题目是编者所加的。

从1937年到1940年，我先在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后在育才学校工作。大致情况是这样：

一、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党团的组织情况

自强读书会设立在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里（现在市中区新华路），实际上是川东特委的青委领导下的一个引导青年读进步书籍的群众性组织。1936年暑期我从贵阳到重庆，1937年1月份参加自强会，同时加入救国会。1938年入党后，我继续在自强读书会活动。党内职务是重庆市青委、川东特委青委委员，自强读书会党团（即现在的党组）书记。公开身份是自强读书会总干事（或别的什么名称，已经记不清楚了）。党团成员有李德椿（莫止，解放后因公牺牲）和周健（今年去世）。青委书记杨述（陈光）。1938年6月，李德椿调任别的工作，组织上介绍王士槐（罗明，现河北省顾问委员会顾问）到自强党团。不久，周健因职业关系去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离开自强。组织决定吸收另一个党员杨昌全参加党团。后来王士槐调走，党团成员由缪无逸（缪朗）补充。这个期间，党团还是三个人，有我（书记）、杨昌全、缪无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大轰炸，我都在那里；1939年9月，我离开自强读书会去育才学校工作。我走后，党团书记由杨昌全担任，成员有缪无逸，另外还有谁，我记不清楚。……

委的部长）、钱永发（即钱永寿，原省监委负责人）、白诗甫等，都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注】①巴县赖肃著《川东师范学校记》碑文

②雷成龙著《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前身——川东师范在大革命前后》

③聂荣藻《记川东师范学校》（四川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④陈雁翬《记四川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四川文史资料第廿七辑）

⑤聂荣藻《记川东师范学校》

⑥重庆新蜀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⑦陈雁翬《记四川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

了。党团在自强读书会内部发展了不少党员。一些同志在自强读书会入党以后，分别编入街道支部、学校支部，不在自强读书会党团里。也有一些自强的会员是在街道或学校的支部入党的。当时秘密工作的纪律十分严格，党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

二、川东特委青委机关和地下印刷室

川东特委青委机关一直设在我家里，市中区劝工局街离生活书店和国民公报社不远的地方。我记得从马路边下几步台阶，穿过小巷，再上三十几步台阶，进大门就到我家了。这里共有三家，右面是向家，左边是魏家和我家。这条小巷叫兴隆里，因为巷子的顶头处有个尼姑庵——兴隆庵而得名。

重庆市委青委，后来是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组织委员是许立群，宣传委员是许晓轩。青委当时领导重庆的青年团体。青委出版机关刊物《青年生活》。这个刊物是1938年5月份创刊。第一期刊载有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章，因而我记得比较清楚。《青年生活》由杨述主编，许晓轩任发行人。

我除在青委和自强读书会党团工作外，还担任川东特委的秘密印刷工作。杨述与我单线联系。他对我说：“你的条件比较好，可利用家庭掩护，组织上决定你搞油印，印党的文件。这个工作很重要，要绝对保守秘密。到外面活动时，身上手上要洗干净，不要露出痕迹。”杨述让张国钧（地下党员，青委委员，社会职业是生活书店店员）给我送来钢板、铁笔和油印机。我拿自己的零用钱买了油墨和纸张，就边学边干起来。白天出外活动，晚上才悄悄地刻写和油印。开始，我刻的不行，印不现。弄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刻印出来了。我时常搞到深夜。一次，我父亲在楼下大声问：“还不睡觉哇？”我赶紧把灯关掉，躺下装睡觉，等父母亲都睡熟了，我又起来继续工作。

这个地下印刷室刻印得最多的是入党志愿表、党员登记表、干部登记表和党内训练班的教材，如“党的建设”之类。我还刻印过党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和一些传单。以上每种印数是五、六十份。要刻印的材料都是杨述拿来，我刻印好后，他又来取去。我偶而也给他送去。在我担任油印工作过程中，有时因工作过多，也曾经有人帮助印过。大约是1939年，杨述介绍吴永英来帮助我搞油印工作。吴的真名是何实嗣。“文化大革命”后，张西洛（现在全国政协）来信告诉我，吴是何叔衡的女儿，现住北京西郊。

我入党后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参加过三次党的训练班。地点有一次是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次是在青年工作训练班。训练班里所用的“党的建设”、“党员基本知识”等教材都是我刻印的。在青年训练班时，杨述是班主任，蒋南翔讲课，内容有青年工作的特点，“一二·九”运动等。我还记得蒋南翔在讲秘密工作条例和注意事项时说：“老杨这个样子，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杨述衣着随便，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每看什么都要注意盯着看）。蒋告诉我们：地下工作特别要注意隐蔽，衣着要整洁，注意仪表；女同志要打扮得漂亮点。

我入党后，杨述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做一面党旗。当时我很兴奋，感到组织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买了两尺布来做成一面小小的党旗。以后入党的同志有的在我的房间里举行宣誓仪式，由我监督，还用过这面党旗。

三、川东特委青委开会和杨述被捕前后

地下工作，开会向来不得迟到。如果有人过了十分钟还不来，就可能是出问题了。记得

1939年“五一”节，全市青年团体在夫子池参加纪念大会。青委预定5月2日下午两点在我家开会，汇报大会情况。这天，许立群、许晓轩、张国钧等几位委员都按时来了，可是过了十分钟杨述还没有来。许立群很不安，他说：“杨述出问题了，我得赶快去办事处汇报”。临走约定第二天下午两点再来开会。5月3号大家又按时到来，许立群向我们讲了杨述在“五一”被捕的情况。

“五一”纪念大会是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开的，青委决定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都参加，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和杨昌全等带着自强读书会的队伍进入会场，对会场外的情况不知道。据许立群讲，杨述和他那天从沙坪坝回到城里，那时怒吼剧社的队伍正在入场，杨眼在队伍后面，想进去看一看开会情况。但他是高度近视，衣着不整齐，肋下又夹着一个纸包（里面有材料和一张名单），本易被人怀疑。也不知是有人故意或无心挤他，突然把他夹着的纸包挤掉在地上。杨述毫不迟疑，很快把名单拾起来放进嘴里吃掉了。特务们把他打了一顿后抓走。他被押着走过“全国学联”所在地——“五月书店”门前时，有意地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抗战胜利万岁”！让组织和同志们知道他已被捕，好去营救他。学联的同志马上去办事处汇报了，许立群也去汇报了他当时所见的杨述形捕的情况。不久，董必武同志写信给国民党方面，将杨述要了回来。

杨述经常来我家，除了参加青委会议外，还布置工作，有时是送刻印材料来。我对家里人说，他是青年会的。我家的老人们比较开明，加上青年会是基督教办的，所以还没有引起什么怀疑。杨述当时是川东特委组织委员兼青委书记，工作很忙，常常顾不上吃饭。有几次他傍晚时到我家来，我也不敢招待他在家中吃饭，怕太显眼了。我说：“你还没吃饭，怎么办？”他说：“你叫你弟弟去买一毛钱的花生米，就当一顿饭了。”

杨述工作担子很重，生活十分简朴。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比他年轻的同志耐心帮助教育，手把手地教。他和我谈工作，也谈思想，这些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入党后，在党的领导下，具体的就是在杨述指导下，进步比较快。我能够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秘密印刷工作没出什么毛病。杨述有一次对我说，按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不能由一人同时兼任。当时我既搞群众工作又搞秘密印刷是不合适的。所以，他曾打算要我不再搞自强读书会这种群众工作，让周健和杨昌全多搞点，把我转入地下专搞秘密工作。后来因为他被捕，不久我也转移了，没有实现。

他出狱后不久，一天我去枣子岚垭办事处的院子里遇到他。他的眼镜在被捕后被特务打掉了，这时还没有眼镜戴。他告诉我说，他要到延安去了。这以后我在重庆就再没有见到他，直到我去延安才见着。

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青委机关疏散了，改在南岸找地方开会。我家虽然没有被炸，但是家里人都搬到南岸去了。地下印刷室工作也就此结束，工具交还给张国钧。青年自强读书会还在活动。但是，因为敌机每天不断轰炸，群众工作很难开展。1939年8月，杨昌全从青年会少年部主任牟布希（基督教徒，开明人士）处得到消息说，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上有我。我就写信给川东特委请求批准转移去北碚育才学校。后来，许立群转达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于是转移到北碚暂避。

四、在育才学校和撤回延安

1939年9月初，我到育才学校时，已经开学。在这里，我参加南方局文委领导下的党支部。我来这个学校是避难性质，党的工作作得很少。我当教员，在文学组教两门专业课：写

作练习和名著选读，同时教全校的时事课和六年级的课文。陶行知校长听过我讲时事课，对我讲课表示满意。这个期间，我仍然坚持学习，读马列著作，并且开始“啃”马克思的《资本论》。

育才是一个进步学校，是白色恐怖下的孤岛。这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对这个学校很敌视，在它周围布满特务机关。1940年3月底或4月初，国民党特务又追到北碚来抓我，我不得不又一次转移。一天下午，一位同事正在我屋里聊天，忽然，王士槐走来。自从他离开自强读书会，一年多了，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见他来，有点奇怪，问道：“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他故意吊儿郎当、随随便便地说：“你最近怎么样啊？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啊？”别人听他是来借钱的，就走开了。这时，他才严肃地通知我：“组织上得到消息，国民党要抓你，你今天晚上必须离开。”又说：“现在是反共高潮，如果被抓去，就不可能要回来了。”本来按照组织原则，应该由南方局文委来通知我，但是来通知我转移的却是北碚中心县委书记王士槐，可见当时形势很紧张，已不可能按组织系统而只能直接由当地组织来通知了。

时间紧迫，我立即收拾一只小箱子，偷偷地离开育才。为了不引起特务注意，我没有坐汽车和乘轮船，而是搭一条运活猪的木船到了重庆。我坐在船板上，下面载满了猪。我的眼镜掉在猪堆里了，没有响声，我也没有办法找到。从这时起到1949年进北京前，我就没有眼镜了。这十年间，我的眼睛近视程度由200度上升到500度。

这时我家已迁回重庆小龙坎，我到家只住一个晚上，不敢多呆。对家里说是回育才学校去，其实我是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同志接待了我，安排我住进对面山坡上的招待所。这几间小破房子，当时却比回到家里还舒服，又安全又温暖。在那里住了几天，蒋南翔打着伞来找我：“组织上决定送你回延安，你的意见怎么样？”本来1937年冬，我就要去延安的，后来因为脚被烫伤了，才没有去成，一直感到非常遗憾！这时听说要我回延安，真是喜出望外！蒋和我约定时间，要我到办事处去谈话。那又是个下雨天，我拖泥带水地来到办事处。和我谈话的是廖似光。她介绍我和尹锡康认识。尹是南渝中学学生，党员，当时只有19岁，比我小一岁。廖大姐叫我带她到延安去。廖大姐对我们讲了路上应该注意的事情，教我们一套“口供”，以对付国民党关卡的盘查，并给我们发了去延安的路费。

办事处通过统战关系，为我们安排了直达宝鸡的汽车，这是宝鸡一个酒精厂老板的车。这位老板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德国留学回来的。他对我们很客气。廖大姐叫我们改名换姓，我改姓李，尹改姓赵。我们都扮成中国银行的行员，说是从重庆调到西安去工作的。动身那天，我们两人真象高级职员一样打扮起来。办事处派一位小八路开了一辆小轿车来（后来才知道这辆车是周总理的车），送我们两位“小姐”到七星岗长途汽车站。

我们坐上一辆大敞车从成都出发，那位研究员坐司机台，我们搭车的人坐在车厢里的行李堆上。沿途灰尘飞扬，颠簸得厉害。我和尹一见如故。车上还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肖军、王德芬、舒群和陈元（后来与舒群结婚）等。我们结伴走了个把月，沿途歇店，汽车又老是抛锚。好不容易到了陕西褒城酒精厂。在这里住了一晚，主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西餐。第二天从褒城到宝鸡，然后才改坐火车到西安。

我们在西安下火车后，按照廖大姐的嘱咐，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安排我们住进招待所。我们把“小姐”装脱下来，换成八路军军装。这时，同车到西安的那些人也都陆续来到七贤庄，才知道大家都是要去延安的，都是同志，非常高兴！由于重庆遭敌机轰炸，影响了办事处向西安发电报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左

难忘的岁月

李冠华

编者按：李冠华同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某部局级离休干部，抗战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她是当时曾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莫止（李德椿）同志的战友和伴侣。最近，我们特地在北京访问了她。冠华同志为我们回忆提供了莫止同志和她当年在国统区工作和斗争情况。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发表，以供参考。

莫止同志过去的革命活动和所任职务，有些涉及保密的事，很少对我谈，所以我知道不多。一直到1956年他因公殉职后才略知一二。

莫止原名李德椿，又名江涛，江苏吴江人，1922年1月生。家庭是丝绸商。他十岁丧父，原随母亲住盛泽镇，靠叔父接济，勉强度日。他仅上过浙江嘉兴初中，就由叔父叫到上海绸庄当学徒。

他不甘心辍学，经常挤出时间自修古文、历史，并阅读不少进步小说。日寇占领上海、江南前夕，他不愿当亡国奴，便和母亲、弟弟一起逃难，经武汉辗转转到重庆。1938年，莫止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秘密党员。他母亲石恬如，江苏淞江人，是个有爱国意识的妇女。淞沪抗战时在家乡，她曾为前方将士缝制寒衣。后来，在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影响下，她同情革命，掩护同志。儿子教她识字，到能看懂报纸，她就传递情报，编“口供”，应付周围邻里亲友，直到解放。

1940年左右，莫止家住在重庆南岸莲花山，由南方局地下党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出面和他母亲合资盖了三间小茅屋。一间是他母子住，一间是廖志高夫妇住，中间一间是四川人所说的“堂屋”。南方局孔原、林蒙、胡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里住过。这地方就成了他母亲掩护地下党同志的“家”。这时他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微薄积蓄。1943年到1944年，他在牛奶公司、税务局等单位任小职员作掩护，并挣点薪水补贴家用。莫止生活很艰苦。听说成都地下党遭到破坏后，钱瑛同志回到南方局，派他去成都参加整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那时，

右，一直等到重庆来了电报，接上组织关系，才动身去延安。

这次出发，大家都穿八路军军装，乘坐八路军军车，不用化装，也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国民党设有关卡。记得是在（陕西）三原，国民党要拦截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车辆。我们的领队同志非常精明，他前一天就对大家说，天不亮就出发。趁那些“把关”的国民党兵还在睡觉时，我们的卡车已风驰电掣般地过关而去。过了“关”，又走了一段路，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这时大家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情不自禁地在车上唱起了革命歌、救亡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到延安，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区委党史办刘灿琦武建政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一月

他常常用酱油拌平价米饭吃。

我是山西人。1937年家乡沦陷。第二年我14岁就跟随母亲参加“牺盟会”。不久，由山西河津“牺盟会”和八路军120师某支队介绍，步行到延安。先进抗大四期五大队（在柳树店）。后来女生集中组成女生大队，大队长是张琴秋，小队长是丁雪松。1938年底在抗大毕业，又分配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机务一年，到1940年初毕业。这时，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要一批报务员和机要员到重庆、桂林、海南岛等地工作。我们六个女同学（年龄从15岁到20岁各一个）被选调跟随周副主席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这时，莫止常到办事处来汇报工作。我常见到他，但是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工作情况。1942年，组织决定派我筹设办事处备用电台。记得是孔原同志和我谈话，说：“派你到莫止同志家隐蔽和工作。他是个能力很强、思想敏锐的好同志，善于总结经验，汇报工作十分有条理，工作总结报告写得很出色。莫止的记忆力很强，他‘上山’（指当时去办事处）听了周副主席或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或指示，全靠脑子记住，回去能向同志们作比较完整的口头传达。”

这时正处于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蒋管区形势恶化，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和日伪秘密媾和，到处和八路军、新四军闹磨擦。为了加强办事处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应变准备，周副主席、董老和钱瑛大姐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不定期地向我们进行形势、气节等教育。孔原同志给我们上课时，教给我们在万一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办法：要坚定不移，绝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屈，不惜牺牲生命。他强调保守秘密，严守纪律，做一个无名英雄。他以四川某些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事实为例，说明我们要接受教训，当组织遭到破坏，应立即转移，不可稍存侥幸心理，以免引起更大的牵连和不幸。当时，国民党特务搞“自首”运动，甚至搞“突击自首”，即抓到我们的同志一两小时后就释放出来认人抓人，或放长线，跟踪盯梢，寻找我地下党的组织和人员，企图大规模逮捕。重庆等地确实曾经发生过这种事，也有个别人被捕后动摇了，自首叛变。还有的在“突击自首”后放出，设法摆脱敌人，由后山跑进八路军办事处来，坦白汇报被捕自首的经过。南方局领导同志指出，自首不对，但是能够返回组织报告，不破坏组织，总是好的。记得有人这样做了，后来被送回延安去。周副主席特别细心，他给我们讲课时，曾关心地告诫说：“万一你们被捕受刑时，不要过分压抑自己，要叫出声来，那就比较容易熬过去点儿了。”

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我们在白区，不叫“运动”，叫“整风学习”。学习还没结束，我就到莲花山。行前周副主席对我说：必须继续学习。带书多了不好藏，藏一本是可以的，所以要带一本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书下去。

同年，组织把莫止抽调出来设立电台，先由廖志高、后由荣高棠领导。我们先在南岸住了一个来月，后来为了找个有电源的地方设电台就决定搬家。但是当时找房子很困难，只得先在头塘张家湾租了一个富农的几间房，在这里住了一年。这时我才知道他非常勤奋好学。我们遵照周副主席“认真学习”的嘱咐，学完了《整风文献》，记了心得体会，然后烧毁。此外，我们还读了不少苏联名著和革命战争年代的小说，如：《铁流》、《母亲》、《丹娘》、《虹》、以及俄国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等的作品，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巴金、肖军的著作。后来又读《评〈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他逐句逐段学习，并写心得体会。他还学习《资本论》、《联共党史》等。

1943年下半年，我们仍想找个有电源的地方，就搬到黄沙溪，租了两间仍然没有电灯的房子住。这时在办事处内已经直接建立秘电台，我们这个备用电台没有用，我就抄新闻。1944年黄沙溪一带，流行霍乱症，特别是长江沿岸的船工，每天死尸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

进不起医院，只好眼睁睁让瘟疫夺去生命。那年还闹水灾，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抗战胜利后，组织要我们继续搞原来的工作，不忙公开。我们回到办事处去学习。他母亲因为我们没和她联系，着急了，托人写信到八路军办事处找我们，信封上用的是莫止在住地所报姓名（李家康）和地址黄沙溪。这件事让周副主席知道了。周副主席说：重庆特务多，来信用过黄沙溪地址，就可能被特务查获，所以不仅不能再用这个地址写信，还要保护老母亲不致受害。他立即派人去把母亲接上山来。那个“家”和全部东西只能丢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爱护我们和家属，而且又是这样细致周到。

1945年1月，我在中共代表团工作，莫止在南方局当秘书，整理地下党的材料。1946年5月初，我们先后乘美军飞机去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这时，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利用“谈判”作幌子，布置对解放区围攻。“谈判”破裂，形势恶化。周副主席和我谈话，说：“你们到上海去，你再住机关内设立电台。”莫止有亲戚在上海开绸庄可以掩护。我们于十六日乘火车到上海工作，在中央社会部吴克坚系统（吴克坚同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解放后任华东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兼联络局局长，也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现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莫止担任吴克坚的助手，负责领导机要电台，联系情工交通，集中和整理军政情报，电报中央和华东。他每天早出晚归，又是深度近视，白天奔波街头，晚上又伏案工作，往往到深夜一、两点才能休息。当时形势紧迫，胜利在望。而白色恐怖也更加厉害，反动派搞保甲制、连环保那一套。可是，莫止满腔热情扑在革命事业上，他已经忘记了自己，顾不得什么特务的跟踪、盯梢和追捕了。他母亲继续作吴克坚和莫心的联络人，担任收转资料等工作。他弟弟李德宏，利用在银行工作的方便，为吴克坚同志提供大量活动经费。莫止上街工作，有时暗中购买《时代》杂志，从中了解我解放战场形势，直到《时代》被迫停刊。*

1949年4月，中华电告我们：“我军将于4月20日零点渡江南下，敌人已溃不成军。”我们喜出望外，真想大声欢呼！1949年5月，上海中山公园附近终于打响了胜利的枪声，全上海人民得以重见天日。

解放后，莫止在华东行政委员会联络局（即军委联络部上海市联络局）任处长，党内职务是总支书记，也是上海市情委委员）。1955年调北京工作。1956年因公牺牲。

莫止同志遵守纪律，坚持原则，从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在地下时期担任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工作，极少（几乎没有）和我谈及，所以，他曾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我还是近来读党史资料才知道的。前面提到的他弟弟李德宏，十四岁入党和他在一起，十六岁高中毕业时，因重庆白色恐怖，组织成员调动而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以后仍为党作过一些工作，直到解放。本来他可以证明他弟弟的党籍，可是他却认为既是他的兄弟，应该由组织或别的同志来证明才好，一直没有为此写过证明材料。这仅是两个例子。（本文题目系编者所加）

* 《时代》杂志，苏联驻华大使馆编辑出版。戈宝权等常撰写军事评论等。

区委党史办 刘灿珣 武建政 整理

1985, 10, 25

重庆地下党几个区委工作的回忆

王 汶

编者按：王汶同志在重庆地下党时化名肖蔚，于1939年9月初至1940年9月初，先后在新市区、下城区和城区区委工作。现住北京。离休前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某研究室局级干部。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1939年8月底，我由延安分配到重庆。先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即中共中央南方局）。9月初，廖似光分配我到重庆地下党工作。与汪敏接头后，她带我到莫仙慧（后来是樊恒才的爱人）家，曹家巷53号。我是江苏人，在重庆没有熟人；莫的父母常常不在城里，组织上要我住在她家，借以掩护。

一、在新市区区委

我在新市区工作的时间是1939年9月初至1940年2、3月间。领导人汪敏（当时化名凌云）。她分配给我的工作有：

1. 担任一个支部的书记。支部共三人，全是女同志。其中一个柳湜的爱人。她俩都在“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该会设在求精中学（现为市六中）内。我们三人过组织生活或开会的地点，在枣子岚垭柳家。有时我也到“妇指会”和她们作一般“朋友”的联系。开会主要是谈情况、讨论布置一些工作；另外也学习上面传达的一些文件、指示等。我记得清楚的是汪敏传达过中央文件，好像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面的有关文件。

在“妇指会”中，还有别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领导如邓颖超、张晓梅等，也常以“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名义参加“妇指会”的一些活动，如纪念“三八”妇女节等等。

2. 联系在三联书店工作的丁洁如。现在她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她也去过延安，是在重庆入党。我在新市区工作时，主持过她入党的宣誓仪式。

3. 我和张瑞芳的姐姐（名字已忘）联系过，但是时间不长。我去联系张的姐姐时也见过张瑞芳。

4. 汪敏还叫我联系过两、三个女工同志，并叫我对她们讲“剩余价值”、“剥削”等道理，如“什么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等等。使她们搞清楚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因为当时有些工人错误地认为是“老板养活自己”。

二、在下城区区委

我在下城区区委工作的时间是1940年2、3月间至同年夏天。那时下城区区委书记是甘丹，组织委员是黄晓行（现名黄正岩），我是宣传委员。黄现在在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最近去

上海了。我原想约他来一块儿谈谈，这次就不行了。

这段期间，我联系的同志，据记忆有：

1. 徐正福，他原在上海耀华玻璃厂工作，现已退休在上海家中。当时他在章乃器办的“上川实业公司”工作。据他1984年9月26日来信说，1940年他到上川实业公司工作时，党组织领导是黄晓行。在春夏之间，老黄被捕，是由我到“上川”去对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已记不很清楚。我记忆中是这样情况：某天（具体日期已忘），领导上（可能是甘丹）告诉我，黄晓行被捕已放出，现在“上川”徐正福处。他要我去看看黄的情况。我去看了黄。我现在记得的是，黄说他在敌人处受审时，被打了三下手心。

徐正福同志1984年2月21日、9月26日给我的信中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黄晓行走后，一直是我和他联系到1942年上半年。后来一个姓马的同志（四川人）和他接上关系。1943年他与马失去联系。此后他先后在中国航空公司印度加尔各答机场、上海龙华机场、广州白云机场、香港机场等处工作，直到1949年11月9日参加“两航”起义回到上海。来信希望我能给他指出方向，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对他进行一次审查，如能符合党的标准要求，恢复他的政治生命。我也先后复了两信给他，说明我从黄晓行同志被捕后不太久，被调到城区区委、江北县委、沙磁区等地下党工作。1941年7月下旬，又被调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直到1946年5月随办事处同志们到南京、上海。这些情况说明，在我工作地区数度变化的两年时间内，我和他完全不在一个地区工作。根据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组织原则，领导上怎么会这样交叉地要我和他一直联系呢？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我请他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来，他没有来信了。

2. 在下城区区委时，我联系的还有个女学生，是学音乐的（拉小提琴）。名字已忘。另外还有个姓陈女职员，那时年纪约二十多岁。她的具体工作已记不起。她曾对我讲，在此之前她曾被捕过，被敌人整得很厉害。我和她联系的时间也不长。

三、在城区区委

我在城区区委工作的时间是1940年5、6月间到9月初。区委书记樊恒才，组织委员程恩树，当时叫他“小王”。（前几年樊恒才告诉我，程原在商业部工作，已去世。）我是宣传委员。一、二年前，樊曾说那时我任组织委员。但据我自己的印象，我任的是宣传委员。

在城区区委，我联系的是大约三几个银行女职员。我记得那时的银行有：美丰、实业、川盐等等。但她们各自在哪个银行，我已记不清了。有个银行是一个党员，我去那里住过，有个银行是两（？）个党员。我与她们联系时，是了解情况、进行教育，要她们秘密阅读《新华日报》。当时女职员问题比较重要的是男女不平等：女职员受歧视、被减薪、被限制使用，甚至被裁汰，或结婚就被辞退。夫妻二人都是公务人员的，女方却领不到“平价米”等等。《新华日报》经常揭露这些情况。邓大姐、张晓梅等因为这些都是女职员的切身利益问题，曾经亲自写文章呼吁。

在城区区委这段期间内，我们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樊恒才、程恩树和我在莫家开会，突然进来一个警察盘问。幸好事前我们作过准备，编造一些内容。我说我是家庭教师，生病了；程是我表哥（因他是上海人，口音和我的相似）；樊是程的朋友，他们一道来看我，如是云云。我们态度比较冷静、沉着，就对付过去了。

当时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情况下，领导上给我们进行过保密、气节、纪律、提高警惕性等教育。我记忆中，汪敏讲过一些，其他同志也讲过一些。如不该问的不要问，别

我在重庆地下斗争的片断

温 士 一

编者按：温士一同志于1939年在重庆上城区区委工作。离休前是北京宣武区文教局副局长。这里发表的是1985年10月区委党史办同志在北京拜访她后，她寄来的回忆材料。题目是编者加的。

延安归来

我于1938年底，在抗大毕业后，组织认为我在去延安前，是“重庆救国会”领导下的“学救”成员之一，与重庆学生界有广泛的联系，决定分配我回重庆继续在学生界开展工作。1939年初，我回到重庆，和廖似光接上了组织关系。

在上城区委

杨述（陈光）很快到家里来找我，告诉我重庆于1937年底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重庆市委。南方局也由武汉迁到了重庆。还有川东特委。市内还分区建立了区委。同时，统一战线的局面刚刚打开，正是发展党组织、开辟党的工作的好时机。杨述还说，“重庆救国会”已停止活动；原“救国会”的领导同志，都分别在以上各组织中担任了职务。“救国会”领导的“学救”也相应解散了。“中国学联”虽已迁重庆，但它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里面有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也有三青团员。我刚从延安回到后方，身份是明显的，不宜到“中国学联”搞学生工作。我当时不大懂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范围和内容，表示组织分配我做什么，就我做什么。于是，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城区区委。

我记得当时城区分上城区（通远门、七星岗一带）和下城区（临江门一带）；还有两路口一带叫新市区。各区都设有区委。我被分配在上城区区委作妇女委员。当时在上城区委的还

人不该知道的不要乱讲，在街上遇到同志，不该打招呼的不要打招呼。又如走路不要太快，好像有什么任务似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如果发现后面有跟踪的“尾巴”时，要提高警惕，可以假装看街边橱窗陈设，或停下脚步看看后面，或蹲下系鞋带向后面看，或进饮食店甩掉“尾巴”。记得有一次我和莫仙慧等几人，傍晚在街上走，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我们就走进一家饮食店去甩掉了“尾巴”。

领导上给我讲过的一些内容，我也对我所联系的同志讲过一些。领导上传达的有关形势方面的内容，我也传达过。

区委党史办 刘灿珣 武建政 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282171

• 51 •

重庆上城区区委党史办

有银行职员张家璧、生活书店店员华峰夏以及李根源。华峰夏比我先离开上城区委，据说后来在新四军光荣牺牲了。其他同志也有变更的，姓名记不清了。最先领导我们的是杨述，他在五一节去参加夫子池的大会时暴露了身份，以后就再没来领导我们了。接着来领导的是廖志高，第三个是宋林。上城区委设在七星岗临街一栋房子的二楼。楼下的铺面是个算八字先生，这个人可能是放哨的。这栋房子的旁边是个二、三十步的石阶，从石阶上去才能进到二楼。房子背后有个小门，二楼的窗户临街。

我们定期在这里开会。会议内容是每个委员汇报各自领导的几个支部（实际相当于现在的小组）和单线联系的个人的情况（我单线联系过的有吴权衡、季洪等人），以及群众动向、发展对象等。每次开会，领导同志都给我们分析形势，传达上级指示，并根据汇报情况作出具体指示，教育我们下去要求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策略地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传，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到1939年下半年，还着重对党员进行纪律和气节教育，教给党员躲开特务跟踪的方法等。不论是区委委员会议，还是支部会议，多数是在晚上召开。

记得组织上告诉我们，特务一般都穿得比较好，常戴顶宽边的呢帽，把帽沿拉得很低，就象现在电影里的特务的样子。所以被跟上也容易发觉。我那时常被特务跟踪，一经发现，我往往在街上转游很久，直到把跟踪的特务甩掉后，很晚才回家。我家住南纪门内柑子坝，地点比较背静。母亲那时虽也知道我是在干什么，仍然为我耽了不少心。我甩掉特务的办法，有的还是在“救国会”时向漆鲁鱼学的。那时，他常给我们讲自己的战斗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还参加过几次集中训练。受训的同志较多，有的是在“救国会”一起战斗过的熟人，如刘隆华、徐邦贤、陈奇雪、汪敏等。参加受训的其他同志可能是区委委员。学习的内容多是党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重要指示。

在这期间，领导还分配我担任过沙磁区的联络，负责联系重大、省教育学院、药专和几个工厂。从我家到沙磁区要经过上清寺、李子坝、化龙桥、红岩村、小龙坎，大约十来里路程。我多是夜间步行去执行任务，一路上天冷路黑，真叫人提心吊胆，既怕碰上流氓，又耽心特务跟踪。有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就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把后面的人让到前面，心里才稍踏实一点。我记得那时和我联系的，重大是梁华昌，省教育学院是李梦萍，药专是王维章；还有几个工厂的同志。他（她）们都是在前一次约定的地方等我，见面后迅速交换情况就离去。据说这是川东特委布置的任务。

去回民救国协会

1940年夏，全国性的“回民救国协会”成立。这是白崇禧领导的一个团体，里面没有共产党员。我是回民。党组织决定利用我堂兄、重庆总商会会长温少鹤这个上层关系，让我打进去做回民妇女工作，以代表回民妇女，在“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主持的妇女联络会议中占一席代表位置，并利用“回民救国协会”这个全国性回民机构的名义，发动各省市回民妇女参加救亡工作。于是，我就离开上城区区委到“回民救国协会”工作去了。

区委党史办 刘灿珣 武建政 整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重 庆 秘 密 交 通 站

艾新全 唐敦教

重庆秘密交通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重庆城区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年代，交通站工作人员机智勇敢，完成了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交通联络任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交通站的建立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进，途经陕南，年底入川北，迅速解放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西进途中，由于电台损坏，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失去联系。红四方面军与四川省委取得联系后，四川省委即将陈昌浩给省委的信转给了中央。中央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了《致红四方面军的信》。这样，中央与红四方面军断绝近一年的关系，又联系上了。

为了加强联系，掌握川陕苏区情况，中央派中央交通局主任王天洪与红四方面军接洽，组建重庆秘密交通站。

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王天洪通过四川地方党的关系，先在阆中与马希孔接上关系，不久到川陕苏区首府——通江。经过磋商，川陕省委决定，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姚明善到重庆，做秘密交通站的机关工作。

同年冬，王天洪、姚明善、马希孔一行三人，从川陕省委驻地通江出发，次日到保宁东河二龙场，宿地下党员杨联书、戚映桢家。当时红九军军部驻此，军部财务委员会为他们缝制衣物，准备用品，发给银元，由姚明善保管。他们沿途避开敌人盘查，到达重庆。先住巴江旅馆，后在十八梯清真寺十四号租赁一间非常僻静的房子，作为重庆秘密交通站的机关。为了工作方便，姚明善更名为马淑珍，与马希孔姐弟相称，开始了交通站的工作。交通站建立后不久，王天洪即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二、交通站的工作人员

当时，在重庆秘密交通站工作的先后计有五人：

王天洪：湖北宜昌人，又名杨明善、杨杰山、杨广明，中央交通局主任。他经常来往重庆、上海之间，主要任务是及时将川陕苏区情况，向中央汇报；将中央的指示，向川陕苏区传送。交通站与重庆地方党组织不发生直接关系。当时他的爱人和儿女也住在重庆。后来，爱人患肺结核病死了，葬南岸弹子石，将女儿送回老家抚育。其妻弟在民生公司轮船上做大副，也作了不少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

姚明善：四川省南江县人，又名马淑珍、吴淑珍，在延安后改名刘毅，曾任川陕省委

第二届妇女部长。现住达县红星村(红军院)。

马希孔：阆中人，回族，又名马家林、马文裕、周志平。一九二九年入党，一九三四年二月离开交通站，后到苏联学习，一九三七年回国，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陕北公学工作过。四十年代，在冀中抗日战争前线牺牲。

马季占：阆中人，回族，马希孔之弟，又名马文远、马家骥、张治安。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三年底，由党组织派往重庆交通站工作。后到延安更名周志坚，现住辽宁省大连市解放路结好巷23号。

吴世敏：湖南岳阳人，又名李茂春、刘鳌。曾在江陵县教书，参加红二方面军。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交通工作。一九三四年初，领导重庆秘密交通站工作。在白色恐怖严重的特殊环境里，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经党组织同意，与姚明善结为夫妻。一九三五年正月十一日生一女孩，取名爱莲，又名刘继容。

三、交通站的工作情况

交通站建立后，积极搜集四川地区各种情报，传递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相互间的信息。交通站经常收到各方面来信，收信人全用“杨明善”的名字。信件全由马希孔拆阅和回复。每封信看起来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实际内容是用米汤写的，只要用碘酒一擦，就能看出信的真实内容。马希孔每次拆信和复信时，马淑珍就在门外放哨，发现情况，及时处理。需要保存的信件，交由马淑珍，藏在瓦沟里，或煤炭堆里，从未出过事故。

一九三四年二月，吴世敏接替马希孔的工作，当时马季占住百子巷，只与吴世敏单独联系。交通站机关也从十八梯清真寺，搬到较场口附近老瓷器街。由于交通站来往的信件、人员较多，容易引人怀疑，又经费不足，工作困难，于是王天洪与吴世敏研究决定，由吴世敏当老板，马淑珍当老板娘，筹建“天吉商店”。开张那天，前往祝贺的人很多。万县姓雷的（王天洪亲戚）送来一幅对联；在警备司令部工作的一个同志也前来祝贺；街道居民和许多小商店，或送对联，或送礼品，十分热闹。吴世敏、马淑珍备办了几桌酒席，招待客人。不久，他们筹办的旅馆，也开张营业了。旅馆所用的被单布，全由王天洪从上海寄来。旅馆常住客人有张国清、何三姐、王么妹、李青华、“万县妹”等，都是我党的同志。旅馆既为党组织筹集经费，也为革命同志提供食宿方便，是秘密交通站一个重要工作阵地。

一九三四年秋，吴世敏得到情报，红一方面军可能要在四川永川一带，渡长江北上。吴世敏即派马淑珍到永川，以催收旅馆住宿费为名，秘密进行迎接中央红军入川的准备工作。结果中央红军未到永川，途经贵州，往云南去了。

四、交通站与川东党的关系

一九三四年四月，有人用川陕苏区的地址，给王天洪寄了一封“呈局自取”的信。当时，重庆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王天洪不敢亲身去取。过了一段时间，才喊一个小孩去代取，被敌人跟踪，王天洪因此被捕。一九三四年×月×日《商务日报》登载“抓到共产党重要分子杨明善”的消息。王天洪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一九三四年五月，被杀害于两路口。当时，刘湘二十一军特委会并没有搞清楚王天洪的真实身份，他们公布王天洪是“四川省军委书记”。

吴世敏、马淑珍从报上得知王天洪牺牲的消息后，为了党组织不遭受更大破坏，便立即停止交通站的工作。吴世敏转移到旅馆去住。马淑珍仍留机关，观察敌人动静。吴世敏每次回家，先看暗号，半开窗门，即没事；窗上吊一块布片，即有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交通站没有出事。为了交通站的安全，他们将旅馆顶给了万县人唐万超（可能也是地下党同志）。

王天洪牺牲后，交通站与中央交通局失去联系，吴世敏便派马季占去上海，与中央交通局接关系。马季占到上海后，住三马路孟渊旅馆，即在登记黑板上写出：“张治安，住××号”的接头暗号。但住了十来天，一直没有人来接头（当时，他不知道，中央交通局已经被破坏了），只好返回重庆。吴世敏即派马季占与一个姓李的接头，马季占与姓李的舅侄相称，同住朱家巷。

在马季占去上海接洽关系的同时，吴世敏与川东特委（按：根据当年的老同志回忆，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川东工作委员会、川东工作组两种说法）王××取得联系。吴世敏、马季占经常在茶铺与川东特委的王××约会。交通站机关由老瓷器街迁往何家大院。马季占也因经济困难，离开朱家巷，搬进何家大院。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家庭”，马淑珍是马季占的姐姐，吴世敏是马季占的姐夫。

一九三四年底的一天，马季占在都邮街碰到一个族亲马淑芳（又名马中健），马淑芳把中央特派员刘大元叛变、川北党组织受破坏的情况，告诉马季占，并说她来重庆就是来找马季占兄弟的。马季占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吴世敏汇报，吴世敏即叫马季占单独与她联系。

交通站的任务是直接与中央联系。尽管吴世敏与川东特委取得联系，但交通站的工作，仍然无法进行。川东特委与中央没有直接关系，于是，川东特委李××介绍吴世敏到成都找四川省委。

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中旬，吴世敏、马季占以赶花会和做生意为名到了成都。在成都东门里一个小旅馆里刚安下身，吴世敏即叫马季占寻找××茶铺（这个茶铺可能是省委一个联络点）。马季占在东门里不远处，找到这个茶铺。第二天傍晚，吴世敏、马季占到茶铺，前来与他们接头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近三十岁的人。暗号一对，他们立刻被捕了（当时四川省委已经破坏，戴眼镜的是个叛徒）。

吴世敏、马季占被关押在成都附近华阳县看守所。吴世敏被关在属政治犯一类的东仓，杨继平（现重庆市机械工业局）也在东仓。马季占被关在属杂犯一类的西仓，王叙五（解放后在南充师范学校，现已病故），也在西仓。西仓的杂案犯监狱里，还关着一个因嫌疑被捕“蓉城车行”的黄包车夫董相明（可能是地下党员），他与吴世敏、马季占吃饭、放风时在一起，彼此逐渐熟悉起来，不久，他就出狱了。出狱后，常来探望马季占。马季占通过他给马淑芳写过两封信。一封是说他们到成都后患了拉肚子，病得很厉害，不能走；一封（川东特委王××告诉吴世敏，姓李的人叛变了，吴世敏叫马季占通知马淑芳）说，原来给你介绍的那个朋友（指姓李的人，马季占到成都前，介绍马淑芳与姓李的人联系）在别动队做了大官。马淑芳接信后，离开牙就科医院，去中国工业合作社了。

吴世敏在狱中经常写东西，这引起了与他同狱的杨继平的兴趣。因吴世敏写一手好的仿宋字，放风时，杨继平、王叙五借欣赏仿宋字为名，看到一些实际内容。吴世敏写的尽是上海、北平一些组织人员名单。

“西安事变”前夕，川东特委王××来探监，他叫吴世敏办个简单出狱手续，就可取保释放。何谓取保释放呢？就是狱中的人由自己的亲戚朋友用钱保释出来。吴世敏很快办理了自己和马季占的出狱手续。当时，马季占根本不知道吴世敏写的是反共启事，出狱后才知已

刊载于《华西日报》上。为他们担保的是董相明的“蓉城东行”和一个修鞋铺老板。出狱那天，川东特委王××站在狱门外十来米远处，手拿叶子烟杆，向他们点头示意。出狱后，他们住在董相明家。

五、交通站的结束

吴世敏、马季占去成都前，吴世敏把川东特委的关系交给马淑珍（联络暗号是，对方手里拿叶子烟杆；马淑珍抱着小女孩和背上一个衣服包），并叫马淑珍离开何家大院，另找别的房子住；还说他们过两、三个星期就回来。第二天，马淑珍就搬到打铜街巷子一个老头空房里居住。

马淑珍在重庆等吴世敏、马季占回来，一晃就是三个月。后来，马淑珍收到吴世敏从狱中寄来的信（信被人拆开过）。信中说，他们一到成都就病了，希望马淑珍办两件事；一是把他们的内衣、衬衣、棉衣寄去；二是要马淑珍到湖北江陵县懒子桥去找他的朋友崔典才和他的哥哥李克俊。李克俊有两个孩子，大的叫精忠，小的叫在职。他是过房给二妈的，二妈能养活马淑珍母女。马淑珍看信后，知道吴世敏、马季占被捕了。由于邮寄衣服不方便，便把衣物当了，给他们寄去十元钱。她按照信中介绍的地址，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搭王天洪妻弟的船，到了湖北江陵县懒子桥，找到了崔典才、李克俊。

马淑珍住在李克俊家里，不久，发觉与李克俊来往的尽是“斋公”，还有一个女斋公。她很看不顺眼。有一天，她洗枕头，发现是用反共旗帜缝的，她更怀疑起来。又一次，她洗到吴世敏一件带血衬衣，她认定是他们把吴世敏杀了。于是，产生了逃跑念头。跑了两次，终于逃出了李克俊家。

她回到重庆，便大着胆子到十八梯清真寺原来的住处去了解情况。刚一到，房东老太婆便问她，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并说先生（指吴世敏）来信了。信中说，他们已经出狱，住在成都柳阳街十四号董相明家。马淑珍带着小孩到了成都。马季占见到马淑珍大吃一惊，把她带到一家饭馆后，便问道：“姐姐，这是啥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马淑珍讲了吴世敏给她写信的情况，马季占才明白了。

他们三人在董相明家住了几天，吴世敏说：“交通站已不存在，现在情况这么严重，党组织一时又难以找到，彼此留下地址，回老家去吧”。马季占便离开董家，回老家阆中去了，以后到延安，他参加了回民支队。紧接着吴世敏化了装，穿着国民党的灰军装，坐汽车走了。吴世敏仍叫马淑珍回湖北，说那边安全。他给马淑珍解释说：“我的信写得那么清楚，二妈是指红二方面军，大的叫精忠，就是精忠报国的意思；小的叫在职，就是在职工作的意思”。吴世敏走后，马淑珍带着孩子，背个玻璃匣子，装成卖针线的样子，取道重庆，也到湖北去了。

至此，重庆秘密交通站的全部活动，遂告结束。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原载《重庆市党史资料研究》

重庆的政治中心驻地

——上清寺街道史料（二）

上清寺街道志编纂组 刘亮熙 王耀珉供稿

市中区委党史办公室 武建政整理

三、国共和谈时期的上清寺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党将其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迁来上清寺地区，定重庆为“陪都”之后，上清寺地区遂由一般的居民区，一变而成为行政机关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司令部的集中驻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美军驻华总司令部也在这里的国府路大溪别墅（今人民路市科学技术协会内）成立办公，上清寺地区更成了同盟军亚洲太平洋战场的指挥中心所在。

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来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为期四十三天国共谈判的时候，上清寺地区，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瞩目，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神经，成为了现代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下榻虽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但办公和会客却在上清寺地区的“桂园”（今中山四路65号。原系张治中公馆，特为谈判让出的）。至于谈判活动，绝大部份也是在“桂园”和蒋介石在市区内的官邸——曾家岩 德安里一〇一号“尧庐”（今市体改委）进行的。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广泛接触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人士，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并签署了著名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赢得了这场谈判斗争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胜利。上清寺地区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上清寺地区与“重庆谈判”的密切关系，现将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的活动日程略记于后：

八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时三刻，中共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在九龙坡机场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的欢迎。毛主席发表书面谈话，随即驱车前往中山四路张治中官邸“桂园”休息，并会见了郭沫若、于立群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接着，毛主席偕周恩来、王若飞去化龙桥红岩嘴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同志的热烈欢迎。

晚上，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去山洞“林园”会晤蒋介石。蒋在“林园”寓所举行欢

迎宴会，赫尔利大使、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和国民党人士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陈诚、吴国桢、蒋经国、周至柔等应邀作陪。当晚，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留宿“林园”。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在林园会谈。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会谈，主要商讨两党此次谈判的必要性和原则、方针及程序等问题。

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由林园进城，先后拜访了宋庆龄、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美国大使赫尔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

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付斯年、王云五、张澜、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王若飞、徐冰、张晓梅、王炳南在座。

周恩来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就军事、政治问题进行会谈。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渝，于右任、孙科、邹鲁、吴铁城、叶楚傖等应邀作陪。

是晚，毛泽东、周恩来回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从这时起至十月九日，毛泽东除白天到桂园会见各方人士，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或外出访问外，晚间都回红岩村办公和休息。

八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在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柳亚子赋诗一首，题为《赠毛润之老友》。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在参政会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王云五等应邀出席作陪。

晚上，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长时间商谈。

九月一日 上午，周恩来与王世杰会谈。下午，周恩来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继续讨论军事问题。

晚上，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举行鸡尾酒会。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及外宾三百多人应邀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酒会，受到与会人士和等候在街头的几千名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九月二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在“特园”举行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渝，张澜、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冷遹、张申府等出席作陪。双方就时局问题进行亲切交谈。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来访的邹鲁及其他友好。

晚，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寓所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晚八时，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孙科、冯玉祥、吴铁城、左舜生、黄炎培、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白崇禧、吴鼎昌、张伯苓等数十人出席作陪。席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共祝抗战胜利。宴会后，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单独会谈，双方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原则意见。

九月三日 上午，毛泽东在桂园约见王世杰，提出了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各项要点。

中午，陈诚宴请周恩来。

下午三至四时，毛泽东先后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等；五时，在桂园会晤韩国临时政府人士；六时，接见文化界郭沫若等；七时半，应苏联大使彼德罗夫之请赴

宴。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会谈。中共代表将拟定的谈判方案十一项提交国民党代表。至此，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结束。

九月四日 上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白崇禧。周恩来在桂园与张治中会谈。

中午，赫尔利在美国驻华使馆宴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奈特，国民党张群、张治中、吴国祯、邵力子等出席作陪。

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视察《新华日报》营业部。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茶会，招待中外各方人士，庆祝抗战胜利。到会的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各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各国驻华使节及友好百余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会间，毛泽东接见重庆《新蜀报》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晚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晚九至十二时，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九月五日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及其他友好人士。

九月六日 毛泽东去山洞林园与蒋介石会谈

中午，于右任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丁维汾、叶楚傖、陈立夫、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宴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访晤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和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故旧；继至南开中学拜访柳亚子、张伯苓。毛泽东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赠柳亚子。

晚上，宋庆龄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九月七日 覃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

冯玉祥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一〇一号继续商谈军队缩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

九月八日 毛泽东、周恩来，下午四时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到会的有中国保卫同盟孙夫人、英国援华会薛穆大使及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先生、公谊救护队、英红十字会、美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代表及锐朴先生等。

九月九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参加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举办的文娱晚会，观看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九月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设晚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等，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

九月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及叶楚傖、张厉生在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国民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会谈。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林园官邸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餐后进行商谈。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德安里一〇一号继续就国民大会和解放区等问题进行会谈。

九月十三日 赫尔利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首次招待外国记者，向合众社、路透社的记者们阐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平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原则，希望两党会谈成功。

晚上，戴季陶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九月十四日 民主同盟张澜、张申府、左舜生、章伯钧等在特园举行宴会，招待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及张群、邵力子应邀出席。宴后，三方面进行了商谈。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及各方来访的友好人士。

晚上，白崇禧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九月十五日 下午三至六时，周恩来、王若飞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与张群、邵力子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的推定、军队缩编及驻地等问题举行谈判。

晚上，毛泽东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委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出席作陪。

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岩村住地接见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三个美国士兵，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设宴招待他们。

九月十七日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张群、吴国桢出席作陪。宴后，三人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九月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行在渝参政员第二次茶会，并纪念“九·一八”。到有参政员七十四人。毛泽东、周恩来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致词，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经过。

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岩村住地研究关于军队和解放区等问题的谈判。

九月十九日 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研究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

午后，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军队缩编、军队驻地和解放区问题举行谈判。

九月二十日 《大公报》社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往访叶楚傖、程潜、陈立夫、贺耀祖等。

九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继续就军事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九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接见在渝剧作家、导演及戏剧界人士。

九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分访各方友好。

九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宋美龄住宅。今市顾问委员会所在地）就解放区政权问题举行了谈判。

九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就政治会议的代表名额分配及协商方式等进行商谈。

九月二十九日 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在参政会举行聚餐会，应邀参加的有民盟的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王云五、曾琦等。会上，商讨召开政治会议问题。

游 曦

曾 维 钦

游曦烈士(1908—1927)，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忠诚女儿，第一次大革命战争和广州起义的巾帼英雄。曾任重庆中法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重庆各届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重庆第一届各界妇女联合会宣传部主任、广州起义女兵班班长。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中，她率领女兵班与十余倍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于在血刃拼杀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岁。

进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

游曦烈士，原名游传玉，1908年3月26日，生于重庆市中区大阳沟吕祖庙街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游正华，是土布作坊织布工人，终日辛苦，不能维持一家温饱。苦难的环境，形成性格暴躁。他一方面对自己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喘不过气来，忿懑不平，另一方面又深受封建意识毒害，在家里却是一个大要夫权和父权的专制家长，经常打骂妻子和女儿。母亲

十月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就政治会议、解放区政权和避免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

十月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继续就政治会议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举行会谈。

十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于上午十时继续会谈。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到会。

十月九日 毛泽东去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十月十日 午后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中国青年党曾琦，就民主同盟和青年党问题进行商谈。四时半，毛泽东同往访的蒋介石在桂园会晤，旋即相偕至国民政府礼堂庆祝国庆招待会。会后，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继续商讨历次谈判的记录要点，并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会见出席签字仪式的国共两党代表，并展阅《纪要》文本。

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在王若飞、张治中陪同下飞回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未完待续）

吴氏是个勤劳妇女，慈祥贤惠，对丈夫体贴忍让，对女儿爱护同情，日夜操劳，帮人洗衣、做针线，协助丈夫维持全家生计。她生了六个孩子，因饥寒交迫，无钱治病，夭折了四个，只养活了游曦和她哥哥游传禄。游传禄幼年进重庆缫丝厂当童工，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里的艰难生活。他有见识，明大义，孝顺父母，爱护妹妹。游曦自幼懂得世事艰难，跟随母亲帮人洗衣缝补和做家务事。她性格倔强，有志气，善于思索，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妇女的痛苦和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充满对黑暗的旧社会的强烈憎恨，对劳苦大众、妇女同胞的深切同情，希望能上学读书，自立于社会。

游曦的父亲不许女儿上学读书，认为女娃儿长大嫁个男人，跟着过一辈子就行了。经过游曦力争和母亲、哥哥全力支持，游曦终于在1921年进入收费低廉的“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读书愿望。

“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十岁以上，大体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女孩子。进校后，既要学习相当于高小程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裁剪和缝纫衣服的技术。校长吴蕴朴对学生要求极严，课业、劳作十分繁重。十三岁才发蒙读书的游曦，对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万分珍惜。她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废寝忘食地学习文化知识和缝纫技术。晚上还要熬夜给别人缝衣、织毛衣，赚钱补贴学费和生活。游曦日夜夜的刻苦学习，终于成了班上名列前茅的优秀生。她性格爽朗，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深受同学敬佩，尊称为大姐。

游曦的同班同学童毓英，是读过私塾的富裕家庭出身的姑娘，文化课成绩好，但对职业技术课中的粗活儿，干起来比较吃力。游曦总是帮助她做。游曦在文化课学习上碰到困难，求教于童毓英，童也是热情地予以帮助。两人学习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相互帮助，结下深厚的友情。

一天，毓英对游曦说：“你发疯似地学习，这股劲儿真难得啊！”游曦回答：“我争得读书的机会太不容易了，我要发奋图强啊！”游曦也称赞毓英：“你学习不也很使劲吗？”毓英沉郁地回答：“我比你家庭富裕，但读书机会也来之不易啊！”说着，毓英的声音哽咽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向游曦悲愤地倾诉了她姐姐的不幸。

童毓英出身在一个崇尚封建礼教的大家庭，伯父、父亲、叔父三兄弟未分家。在她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妇女受尽虐待，丈夫打骂妻子，司空见惯，姑娘们要遵守“三从四德”，从小缠脚，不让读书。幸而毓英的父亲思想比较开通，不主张女孩子缠脚。几个姐姐幼时，才都幸免缠脚的苦难。小毓英还被送去读了三、四年私塾。毓英的大姐出嫁到婆家，婆婆见她是一双大脚，盛怒地拿出一双裹脚布，凶狠地掷给她：“回娘家去把脚裹细了再来，否则不许进大门。”大姐被退回娘家，又气又羞，感到无脸见人。成年被迫缠脚，痛如刀绞，这样苦苦折磨不到一年，大姐就含恨而亡，成了封建礼教可悲的牺牲品。可是，顽固的伯父，没有吸取这血的教训，反而认为毓英的大姐被退回家，是丢了童家的“面子”，败坏了童家的“声誉”，便不容分说地强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统统缠脚。在这厄运来临的时刻，毓英的五哥童庸生（伯父之子）在成都高师读书，具有激进革命思想，回家度假。他看到众姊妹缠脚疼痛难当，顿时火冒三丈，亲手把众姊妹的裹脚布解开。伯父责问庸生：“姑娘不缠脚，以后嫁不出去，你担当得起吗？”庸生斩钉截铁地回答：“姑娘要出去读书、工作，自食其力”。庸生不仅把众姊妹从缠脚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大力反对男尊女卑的夫权统治思想和套在女性头上的“三从四德”的封建精神枷锁。这样，毓英在五哥庸生的支持下，才从重庆南岸宜家桥乡下的老家，进到重庆城内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读书。不久，毓英的家也从乡下搬进重庆城。

游曦听了毓英一席话，了解到不仅穷人家的妇女受压迫，有钱人家的妇女同样受摧残，不仅穷人家的女孩子死于黑暗社会的穷困之中，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也死于黑暗社会的封建礼教之下。她恨透这吃人的旧社会和旧礼教，她十分崇敬毓英的五哥童庸生敢于向旧社会和旧礼教宣战的胆识。从此，游曦成了毓英家的常客。

肖楚女和童庸生的教诲

1923年初，童庸生成都高师毕业，回重庆工作。他在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游曦去毓英家，经常看到童庸生与青年学生一起，慷慨激昂地揭露社会的黑暗与弊端，讨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童庸生向游曦和毓英讲解，广大人民之所以穷困，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不好，妇女的经济不独立。介绍“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道德，鼓励她们造就自立于社会的知识与能力。宣传穷人要翻身，妇女要解放，只有像俄国人那样，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经过童庸生的教育，年轻的游曦对社会的认识提高了，由自发的不满进入自觉的反抗。她的思想开始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由于视野日益开阔，游曦不再满足于太阳山女职校的学习。她渴望到更高的学府去学习深造，去追求救国救民和妇女解放的真理，做一个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新女性。此时，游传玉改名游曦，表示自己要像早晨初升的太阳，走向灿烂光明的前程。童庸生很赏识富于反抗精神的游曦，为了支持游曦和妹妹毓英深造，他于1923年夏天，介绍她们到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二十年代初，四川地区连年军阀混战，弄得民穷财困，生灵涂炭，巴山蜀水，哀鸿遍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革命运动亦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宣传鼓动家、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者肖楚女三次来重庆，两次担任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兼《新蜀报》主笔，促进了重庆革命运动的发展。《新蜀报》成为当时重庆最具有影响的革命舆论阵地，二女师成为当时重庆学生运动的火车头，最为社会注目。

游曦1923年夏进入二女师学习，至1925年底被迫离开二女师，有幸能较长时间接受肖楚女的直接教诲。游曦这个才满十五周岁的年轻姑娘，一来到二女师，立即为新环境的进步空气和肖楚女老师的教学、演讲、文章所吸引。她废寝忘食地勤奋攻读各门功课，如饥如渴地学习当时涌入重庆的各种进步书刊，尤其潜心阅读肖楚女老师写的《革命的信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青年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等著作，以及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她把肖楚女看作自己的良师和学习的楷模，把他的著作和演讲，看作自己的指路明灯。在肖楚女的新学问、新思想、新道德的熏陶滋润下，游曦的思想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她十分信服肖楚女老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蜡烛人生观——即为革命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极力做一个“学、识、胆”兼备的革命家。

1924年秋，游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平民学社”，很快成为该社的中坚分子。她和二女师“平民学社”负责人郎明钦一道，积极地组织青年同学学习肖楚女的著作和《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语丝》等进步刊物，积极地推动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游曦善于团结同学，共同进步。在二女师平静的校园里，每当清晨薄暮和课余，经常可以看到衣着朴素，体魄健美，容貌端庄，圆圆的脸带着和霭的微笑，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豪情的游曦，总是和同学们一起，聚精会神地阅读进步书刊，或热烈辩论学习中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二十年代初,“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重庆,各种社会思潮也随之涌入重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各种思潮都在影响青年。一直与共产党为敌的国家主义派(青年党),更是猖狂地与我党争夺青年。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李璜都系四川人,他们以四川为其活动和发展组织的基地,尤其重视重庆的地位。当时重庆二女师是学生人数最多,最为社会瞩目的学校。国家主义派妄想占领这块阵地。曾琦将上海出版的宣扬国家主义派观点的《醒狮》周刊,每期邮寄十份给二女师的国家主义派分子彭举,令其在师生中散发。当时,二女师有志青年都在寻求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出路、妇女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都在考虑什么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她们对国家主义既厌恶,又不甚了解。一天,肖楚女在二女师刚上完课,正要离开校门时,游曦赶上去将国家主义派的刊物《醒狮》交给肖楚女,请求他帮助分析。肖楚女多次约游曦谈话,用种种事实深刻分析了国家主义派是由一伙为军阀豢养的无耻政客所组成,他们提出所谓“外抗强权”,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俄国,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所谓“内除国贼”,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肖楚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向游曦科学地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游曦从肖楚女老师处获得解剖国家主义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思想上、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

学生运动的勇敢战士

游曦在反帝运动中,是一名勇敢战士,始终站在斗争前列。1924年10月,重庆发生“德阳丸”事件,游曦毅然丢下书本,走出校门,团结同学们一道四处宣传。她以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去唤起同胞们的救国热情。她的声音嘶哑了,仍不下战场。经过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重庆各界群众的数月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慑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撤换了驻重庆领事,不敢再言赔偿,“德阳丸”事件遂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1925年“五卅”惨案后,重庆掀起了空前的反帝政治运动。游曦和二女师的同学,组成宣传队,沿街搜缴日货,付之一炬。在闹市区和群众聚集处,游曦登台发表演讲,愤怒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血腥事实,声讨反动军阀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使可爱的祖国,国势积弱,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种种罪行。她呼吁市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她讲得悲愤慷慨,声泪俱下,听者为之感动泣下。游曦在反帝斗争中,勇敢顽强,干练坚决,很快赢得群众信赖,被选为重庆市“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审判奸商的评议委员。在一次群众请愿中,游曦面对刘湘,痛斥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痛斥军阀破坏革命的可耻行径,面无惧色,在场的人莫不为之震惊和信服。

1925年秋,四川省教育厅撤换二女师进步校长蒙才成,另派抽大烟的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黄尚毅作校长。黄一上任,就排挤进步教员,开除进步学生,严格限制学生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一切活动。二女师学生对此极为不满,她们在重庆党团组织领导下,发动了一场为时半年的“驱黄运动”(即“打狗运动”)。黄尚毅对学生施行报复,将运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分子游曦等25名学生开除。游曦蔑视黄尚毅的“校长”权威,把学校开除她们的布告牌扯下来,用脚踩得稀烂;把黄尚毅的铺盖甩在校门外;游曦还日日夜夜在校门站岗,不让黄进来。二女师学生紧密团结,不畏权势,坚持斗争,取得了重庆各校同学、川东学联以及上海等地学联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同情,终于迫使黄尚毅于是年11月辞职。重庆二女师这次“驱黄运动”的胜利,影响深远,它不仅教育了二女师的广大师生,而且鼓舞了

重庆各校师生的斗志，掀起了重庆学生运动的高潮。游曦在这次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5年冬，游曦被二女师反动当局开除后，党团组织安排她到中法大学学习。中法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杨伯凯任训育主任，聘请杨闇公、冉钧、杨洵、周贡植、李嘉仲、肖华清、漆南薰等作教师，招来了从二女师、联中、江北中学……等学校闹学潮中，被开除的优秀青年学生。

这时游曦年满十八，高高的身材，肤色黑黄，短发不及耳，目光坚毅，步伐稳健。同学和她接触，无不感到她有着火一般炽烈的革命热情，和办事干练利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这时，她为了表示献身革命的坚定决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游牺”。游曦进中法大学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任中法大学党支部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还担负中法大学学生会和重庆市学联的工作，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各项任务。中法大学的同学，无论男女大小，都亲昵地称呼她为游大姐。

1926年初，党派游曦为筹建重庆市妇联的筹备主任，以开展重庆地区妇运工作。游曦大胆泼辣，很有组织才干，她四处奔走联络，深入细致地做各方面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就筹备就绪。是年4月1日，游曦在巴县图书馆主持召开有各界妇女代表300余人参加的“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选举领导机构。游曦被选为市妇联的宣传部主任。新成立的市妇联，4月26日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出师北伐；5月2日，发起举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死难女烈士的隆重悼念活动，出版追悼大会特刊，对全市妇女进行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教育；暑假中，又集中地开展了一次女工的教育发动工作，动员大批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两处丝厂女工集中的地方去做女工工作。游曦本人亲自率领中法大学部分女团员到磁器口丝厂，白天同女工们一起做工，下班后走访女工家庭，帮助她们做家务事，和女工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过深入发动，游曦在磁器口丝厂办起女工夜校，培养一批积极分子，组织起磁器口四个丝厂的女工工会，为党在丝厂女工中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游曦发动各界妇女参加重庆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在关岳庙举行的庆祝“国民革命军光复武汉大会”。会后，游曦率领一些女同学组织宣传队上街头写标语、演讲和演话剧，并在话剧《母亲的心》中扮演母亲，演得真切感人。观众看到剧中的母亲，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迫害下觉醒起来，勉励自己的儿女参加革命的情景时，不少人感动得流下热泪。游曦在宣传活动中，过度劳累，眼睛布满血丝，母亲心疼地问她为何这样不顾身体的干，她自豪地回答母亲：“这是革命啊？”

游曦疾恶如仇，不畏强暴，个性刚强，具有男子汉性格；但她又是一个刚中有柔，富于感情，关心人，体贴人，温柔细心的女性。她任中法大学团支部书记时，与重庆团地委学委书记韦风嗜相识。韦风嗜是一个身材结实，有胆有识的热血青年。由于他们工作上的经常接触，共同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以及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倾慕，萌发了爱情。虽然他们相爱挚着，却没有沉溺于情网之中。他们相互勉励，要把整个身心献给革命。游曦不缠脚，头剪短发，早已被亲属和世俗非议为“伤风败俗”，现在又十分坦然地在同学中间公开她与韦风嗜的恋爱关系，毫无顾忌地向封建礼教挑战，这在当时的进

步女同学中，亦算勇敢举动。

1926年夏，韦风喈奉命调去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虽然他们两情依依，但革命需要，就应勇往直前。他俩抑制离情，互相鼓励全力为革命做出贡献。谁知，这次分离竟成了他俩在人生征途上的永别。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韦风喈被敌人杀害，沉于广州白鹅潭。一代英豪，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 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926年10月，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为主力，经过艰苦奋战，攻克武汉，取得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了适应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6年12月，陈维中受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的派遣，来重庆招生。我党为了掌握好革命武装，指示各地党团组织选送党团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青年报考。任煜（即任白戈）负责考生的政审和转党团关系的工作。

经过严格审查和考试，共录取300多名学生，其中有游曦、李淑宁（即赵一曼）等30名女生。当《新蜀报》公布录取名单后，游曦激动不已。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象古代女英雄花木兰、梁红玉那样，也能从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而驰骋疆场，马革裹尸啊！但游曦的亲属听说她要参军，纷纷赶来劝阻，说什么“吃粮当兵不是姑娘们的事”。她的母亲也噙着泪花劝她不要参军，找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成家。游曦对母亲说：“妈妈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啦？让我参军吧。男女要平等，妇女也要起来革命，不能再当家庭奴隶，依靠男人过生活，受人欺凌。革命成功，社会就要改变，妇女就能得到解放，穷苦人的生活才能好起来，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啊！”游曦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她参军。临别时，游曦将亲手为母亲做的四双布鞋，奉献给老人。母亲流着惜别的热泪，把积攒的两元大洋，给了即将远离身边的最心爱的女儿。这幅母女深情的画面，深深地铭刻在出征战士游曦的心里。

1926年12月底，游曦满怀革命豪情，和其他被录取的罗瑞卿、李淑宁、陈德芸等男女学生一道，登上“其春”号客轮，迎着朝霞，乘风破浪，告别了哺育她19年的故乡——雄伟壮丽的山城重庆，航往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在船上，女生坐三等舱，男生坐四等舱，从各地聚拢来的男女青年，都为一个共同目标——革命而融洽无间。船过万县，在云阳靠岸，男女同学相约登岸游览著名的张飞庙。在庙中，博学多才的罗瑞卿向大家介绍了相传为岳飞手笔的石刻《出师表》。他们认为，此时此刻读《出师表》，对于他们来讲，富有特殊的意义。因而，人人心情激动，游曦更是壮怀激越。她向同游的同学表示：为了北伐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复兴，她要发扬诸葛武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驰骋疆场，壮烈牺牲

游曦被编入中央军校女生大队第一区队学习。训练要求十分严格。游曦自觉地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军事、政治训练，纪律常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她都是模范。游曦进军校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面目日趋公开化，她始终站在反击反革命逆流的最前列。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出师北伐后，他凭借窃据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将党、政、军权集于一身，走向反共、独裁。因而，反蒋斗争以武汉和中央军校为中心，日益高涨激烈起来。游曦在“雪花世界”事件中，在军校清理右派学生的激烈斗争中，在阅马场万人讨蒋大会及批斗处决蒋介石密派到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的右派骨干分子杨引之等反蒋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坚决勇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1927年3月以来，蒋介石先后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策划“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又于5月中旬，趁北伐军主力开赴河南前线，武汉仅留下少数警卫部队，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之际，唆使驻长沙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窜到宜昌的四川军阀杨森（辖八个师）叛变。夏斗寅的部队偷袭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杨部窜到沔阳新堤，妄图对武汉采取钳形攻势，一举夺取武汉。在此危急存亡关头，武汉政府将武汉军校学生、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部分学生，编成一个中央独立师，反击叛军。游曦编入第一团宣传队，随军出征，开赴咸宁、蒲圻、嘉鱼、沔阳一带迎敌。当接近纸坊时，即与偷袭武昌之敌遭遇。号兵吹起了响亮的冲锋号，军校男女学生向着敌人占据的山头，冲了上去。冲锋号响个不停，学生军攻下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翻山越岭，冲个不停，敌人终于全线崩溃。学生军乘胜追击，叛军惶惶逃命，一气跑到江西。纸坊前面一带地区，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晚上，大家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天亮后，大家发现衣服都被撕破，脸上、手上和脚上，尽是血迹。但是，游曦和同学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南线无战事，军校学生又奉命北渡长江，配合李富春、林伯渠任党代表的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击杨森。仙桃镇一仗，把杨森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回四川。在讨平杨、夏叛乱中，女生队经受了严峻考验，而且是有功劳的。她们沐雨栉风，地为床，天作被，蚊子咬，毒虫叮，饥不得食，渴不得水，白天在炽烈的阳光下行军，晚上在漆黑的夜里放哨，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只要部队停止前进，就要迅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次，游曦等女生奉命到距咸宁十多里的一个乡下逮捕一个土豪。当她们进入土豪的大院搜索，只见住房陈设豪华，楼上摆着许多盛满香肠、腊肉的缸子，不见土豪踪影。游曦把这些食品分给围观的贫苦群众。不久，又机智勇敢地把这个土豪逮住了——妇女协会的童妹上街挑水发现这个土豪，立即跑去报告在妇女协会值班的游曦。游曦跟随童妹跑步到城关厢，冲着逃跑的土豪大喝一声“站住！”狡猾的土豪见是一个女兵，不予理睬。游曦立即朝天打了一枪，那土豪吓得两腿直打哆嗦，扑通一声，趴在地上不动了。附近农民闻讯赶来，协助游曦用绳子把土豪捆绑起来。游曦逮捕土豪一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学们称赞她，组织上表扬她，她却一再谦逊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

游曦等军校男女学生凯旋武汉的时候，兴奋之情无以言状。但船抵武昌江边，汉阳门码头竟是一片沉寂，看不到一个欢迎的人影。整队走向两湖书院军校校本部，一路上也是冷冷清清，一点也不像出征前拥满热烈沸腾的欢送人群的景象。回到军校，两个噩耗像晴天霹雳一齐向游曦袭来。一是武汉风云突变，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蒋汪合作反共，武汉妖风四起，人心惶惶，大革命濒于流产；二是游曦最敬爱的启蒙老师肖楚女和最亲密的战友韦风喈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不幸殉难。革命的天折，亲人的牺牲，两个沉重的打击，使她整时感到天旋地转，悲痛欲绝。但是，坚强的游曦，在紧张的形势，艰危的大局面前，擦干眼泪，挺身站立起来，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和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决心，又勇敢地投入到新的战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7月20日，唐生智召开会议，解散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他还与何键一起，企图武装消灭军校的“赤子赤孙”。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第四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他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同乡之谊，利用军阀争夺兵权的矛盾，制止了唐生智、何键对军校学生的屠杀，将军校学生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开赴南昌参加起义部队。当时军校根据险恶的形势，决定不愿随军者，可资送回家，动员女生暂时回家隐蔽。游曦经过恳切的请求，被批准留军官教导团随军东征。整个军校女生队近200名女生，随军东征的仅30名；而30名川籍女兵中，随军东征者，仅游曦一人。游曦、曾宪植等30随军东征女战士，缩编为教导团的一个连。教导团在团长叶剑英率领下，于1927年8月4日到达九江。此时，周恩来等领导的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已经爆发，张发奎为了防备教导团响应南昌起义，下令收缴了教导团同学的枪。两天后，军官教导团乘南浔路火车到南昌，叶（挺）、贺（龙）南昌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经抚州，向广东进军。教导团于是年8月中旬从南昌出发，向广东作长途行军。开始，每天约走四、五十里，过大庾岭时，一天竟走一百三、四十里。走过黄宜县，就进入大山区，山上没有树木，也没有人家。八月的太阳火辣辣的，身上发痛，脚下滚烫，口渴极了，但领导不让喝凉水，说喝了会生病，生了病掉队会被敌人抓去。两省的边界上，高山峻岭连绵不断，翻越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大家走得精疲力竭，往往在停下来吃饭时，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就靠在大树上睡着了。但大家的情绪却十分高昂，队伍里不时唱起《先锋队之歌》和《打倒列强》歌，歌声在山谷中回响，鼓舞着队伍前进。

教导团约于9月初到达广州。游曦随教导团抵达广州的第二天，即向连长请假，来到珠江两个支流交汇处的白鹅潭边，凝望肖楚女被杀害的地方南石头监狱和韦风喈就义葬身的珠江波涛，一幅幅过去肖楚女老师对自己亲切教诲的情景和与韦风喈并肩战斗的往事，又历历在目。她对他们的深深怀念之情，像瀑布一样倾泻出来，泪如泉涌，不可自抑。她捏紧拳头，仰望苍天，用微微颤抖的坚定的声音，轻轻地呼唤着：敬爱的老师，亲爱的战友啊！我一定要割下刽子手的头来祭奠你们的英灵，为你们报仇！

10月的一天傍晚，游曦和钱瑛到东较场的陆军医院，找女生队的战友张益智、熊天春谈心。当她们谈到国民党大屠杀事件时，游曦情不自禁地又怀念起肖楚女和韦风喈，泣不成声，悲恸欲绝。钱瑛安慰她说：“我们不要难过，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天亮的时候快到了，广州会是我们的。看吧，工人们又在集合了，我们要时刻准备着，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战友们的鼓励，誓与烈士报仇的决心，激发起游曦投入新的战斗的无穷力量。

11月26日，广东省委作出了广州起义的决定。教导团的党组织遵照省委指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进行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游曦任第一营女兵班班长，这是教导团唯一的女兵班。游曦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临战的姿态，率领女兵班进行勇猛顽强的训练，每天清晨跑步到黄花岗演习。这时，游曦还担任了教导团共青团团委委员，协助团委书记唐维工作。她派出女兵中的共青团员，深入工厂和女工家里，发动妇女投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起义前一个星期，游曦参加了广东省委在黄花岗召开的有两百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省委书记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剑英、叶挺、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

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给教导团下达了艰巨的任务——攻拔广州市内几个最重要的敌人阵地。一是张发奎主力部队（一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驻在沙河镇和燕塘一带的阵地。这个地方形势险要，是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的咽喉，易守难攻；二是地处广州城北制高点，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广州全市的观音山（今越秀山）；三是雄踞广州市中心，构筑最坚实，防守最严密的顽固堡垒——广州市公安局；另外，还有教导团附近的一个步兵团及广州长堤一带敌军。教导团在工人赤卫队和市郊农军的配合下，勇猛进攻，迅速打垮了各个据点的敌人，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黎明前，市区范围内的敌人被基本消灭，大部份地区已经解放，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宣布成立了。

广州公社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极大惊慌。从第二天（12日）起，张发奎、李福林等部，以及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海军、保安队、武装警察、地方民团，都为了他们各自的切身利益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并把主要的攻击目标对着教导团守卫的长堤、观音山及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起义军与敌人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展开激战，市内进行着激烈的街垒争夺战。敌人不断增援，形势越来越危急。游曦的女兵班接到命令，立即赶到长堤，执行阻击敌人的任务。

12日午后，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赴前线视察战况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光荣牺牲。当天黄昏后，叶挺和聂荣臻在广州财政厅房顶视察战斗情况，看到敌军已多处突破起义军的防线，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形势对我十分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组织撤退。

13日，在南线，国民党的军队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配合下，爬上了珠江北岸。在北线，敌人已占领观音山，广州市区已失去屏障。这时，起义军主力部队已撤离市区，来不及撤退的教导团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坚守街垒与敌人浴血奋战。游曦率领的女兵班，此时与起义指挥部失去联系，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顽强地坚守在长堤的一个街垒上，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在粮水断绝，弹药将尽的危急情况下，游曦决定派一名战士突围出去和指挥部取得联系。那个战士说：“班长，你亲自去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游曦明白战士的意思，亲切而又严厉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她停顿了一下，以严峻的命令口气说：“快去吧！告诉指挥部的领导，为了保卫新诞生的广州公社，我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战士走后，疯狂的敌人又反扑过来。游曦和战友们威严的目光紧盯着冲上来的敌人，当敌人到了阵地前沿，女兵班战士们，在威风凛凛的游曦班长的率领下，高喊着“杀！杀！杀！”甩出了最后几枚手榴弹，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威武地从街垒中冲了出来，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她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使敌人心惊胆寒，不敢接近。这时，游曦和同志们的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仍巍然屹立在阵地上，一双双喷着怒火的眼睛聚集着对敌人的仇恨和蔑视。游曦望了望剩下的几个负了伤的同志，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红旗，以殊死战斗的决心，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这面革命的大旗！就要为保卫新诞生的广州公社决死战斗！”话音刚落，数倍增援的敌人再次疯狂的扑了上来。英雄的游曦，怒目圆瞪，胸中燃烧着的万丈仇恨烈火，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宏钟般的怒吼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勇敢向前呀！杀敌报国雪恨呀！”游曦奋勇当先，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与重重包围她们的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凶残的敌人把游曦等女英雄的遗体，剥开衣服，割掉乳房，刺破下身，截成数块，放在天字码头上“示众”，其状惨绝人寰。

观音山松涛悲啸，珠江的血浪呜咽，在为壮烈牺牲的巾帼英雄致哀！

游曦杀敌殉国，悲壮伟烈，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巾帼英雄。她没有死。她那富于革命

朝天门,历史的见证

黄友凡

巍巍朝天门, 耸立大江滨。

望嘉陵怒涛, 扬子洪浪, 日夜滚滚奔腾!

您是巴渝的前卫, 您是历史的碑铭;

您经受了千年的苦难,

您是人民胜利的象征。

激动的热泪, 欢乐的人群,

红旗飘飘纵歌舞, 火树银花庆翻身。

南霸天鞭子下的奴隶, 成了红色码头的主人。

这儿是, 新生活的起点, 幸福的大门。

三十三个秋去春来,

三十三度水涨河清,

结束了, 文化革命十年动乱,

开始了, 三中全会紫微光临。

朝天门, 格外雄伟壮丽, 面貌全新。

虹桥双架贯南北, 索道凌空飞彩霞,

大楼层高天无际, 沧波浩淼日千轮。

当夜幕升起,

天上, 悬挂着万颗金星,

水上, 闪烁着万盏华灯。

愉快的川江号子, 伴奏着汽笛长鸣。

震荡在, 彻夜不眠的重庆。

人民的港口,

联结着,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工农百业发春华, 改革风雨满山城。

这儿, 涌流着五光十色的财货,

迎送着五洲四海的嘉宾。

看, 千帆竞驶, 群雄奋发,

满江的希望与歌声。

问巨龙, 今日向何处?

穿三峡, 渡瀛海, 破万里浪, 乘风赴远征。

在那黑暗岁月, 是您亲眼见证:

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

封建军阀的杀人屠刀,

日本飞机的血火轰炸,

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

望不断, 水上漂流的无名浮尸,

听不尽, 船夫苦力的饥饿呻吟。

灯红酒绿笙歌路, 血泪涌嘉陵。

这儿是, 罪恶的渊薮, 地狱的大门。

在那战斗岁月, 是您亲眼见证:

红色风暴连天起, 打枪坝上血流横,

“新华”号角, 吹遍了烽火巴山,

“红岩”火炬, 照亮了黑夜山城。

多少年轻的同志呵!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前仆后继,

拚将头颅作牺牲。

这儿是, 红色的灯塔, 革命的大门。

在那解放岁月, 是您亲眼见证:

渣滓洞的冲天烈火, 迎来了东方黎明。

理想, 坚持革命真理, 勇于革命实践, 善于团结群众, 用青春和生命捍卫人民事业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质, 她的英雄业绩, 将与世长存, 永远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建设和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

把朝天门的古老传说，变成现实，
在巴山蜀水，建造起千万座金竹寺、金竹
林，（注）
永远地造福子孙。
立下金光闪闪的“四化”丰碑；
让朝天门，成为新代时的伟大历史见证。

(原载《海棠》1983年第四期)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

熊 宇 忠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熊宇忠同志写于1939年的一篇文章的一部份，刊载在钱俊瑞同志主编的《战地知识》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熊宇忠同志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市上、下城区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战时书报供应所总干事和阅读与写作函授班主任。在完成党的区委领导任务的同时，熊宇忠同志还在函授班担任教学工作。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一文，当时曾作为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给写作班讲课的教材。现在作为文献史料发表出来，供研究党史的同志们参考。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讲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

一、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

我们究竟为什么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到底怎样？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讲：

启 事

本刊系地方史志资料通讯(季刊)，供内部使用。上报主管机关，下发区属党、政各单位，以及与全国党史、地方志工作部门交换资料，一般不公开出售。1986年预计编辑出版四期，印数有限。如各地有关单位或爱好同志需要本刊者，可适当供应一部分，每册酌收成本费人民币0.60元(邮费在内)，预订全年四期共人民币2.40元。请来函、来人直接与重庆市市中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联系。

地址：重庆市市中区和平路211号 电话41365

(一) 认识社会：不认识社会的人，自然也能够糊涂地过日子，他把命运交给了神，事实上，是交给了社会。这就是说，人不能离开社会孤独的生活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许多问题在我们面前旋转着，发展着，逼迫着我们非回答不可。

社会科学正是要替我们或者帮助我们解答这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街头上有许多铺子，“生意兴隆”是每个穷人的愿望，可是偏偏会有倒霉亏本的。农人在田里辛苦的耕种，满想粮食多卖几个钱，哪知粮食价钱忽高忽低，自己做不了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穷人没有饭吃，富人家的狗却养得肥肥的，做庄稼的没有白的面饭吃，织布的工人没有衣服穿；富人却做了大老板一点力气也不花，尽量享福，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现在日本强盗疯狂地向中国侵略，无论什么人，都受了灾难，许多人已经知道叹气没有用处，只有和鬼子拼命，但鬼子为什么要疯狂地侵略呢？汪精卫这一伙为什么终究当汉奸呢？

这些问题都是社会问题，而社会是如何的复杂呵！姓王的和姓张的彼此毫无关系，但各人之间都互相关联着，那怕远隔重洋的美国，纽约倒了一家大银行，就会影响到全世界。英法对德宣战立即影响我们的抗战。

社会科学正是研究这些社会问题的。关于这个社会的历史，社会各种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加以研究，加以说明，发现社会的运动规律，知道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是什么社会，以及未来是什么社会。所以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是为了认识这个社会。

(二) 改革社会：为什么要认识这个社会呢？认识这个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改革社会。但首先我们就要明瞭这个社会是一个奇怪的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因为不平等，所以有的人没有日子过，没有日子过的只有起来改革这社会，把不平等的变成平等。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不平等的社会呢？有什么法子把不平的社会变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这就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科学不仅要我们认识这社会，还要我们研究改革这社会的方法，指出改革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科学，是为了改革社会的事业的完成。

总括起来讲，为了认识社会，改革社会，以及研究改革社会的方法和各种力量，必须要研究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正是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它指示着我们如何去进行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

二、为什么在抗战中要加紧对社会科学研究？

当前的中国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我们做亡国奴，要抢夺我们的土地，要烧杀奸淫；我们只有抗战，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只有消灭敌伪政权，才能重保我们的乡土！但是怎样抗战，怎样消灭敌伪政权呢？用什么力量什么方法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呢？

中国和日寇打仗，是跟整个世界有关系的。在这世界中，有哪几个国家会帮助我们，在国际上我们联合那些力量反抗那些力量呢？强盗也是有伙伴的，那么，这世界究竟有那些强盗需要我们反抗呢？

这正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东西。还有别人的解放战斗的经验，可以供给我们参考的，使我们在进行民族解放的事业中，能够胜利前进，不致遭受失败。

比如阿比西尼亚被意大利暂时灭亡了，西班牙人民被不干涉主义者出卖给德意法西斯了，德国不费气力的拿去奥地利与捷克，现又以飞机大炮的方法夺去半个波兰，这些事实不是可以给我们许多经验与教训吗？如果中国不抵抗，如果中国统一破坏团结分裂，老早变成奥地利，捷克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所以为了研究过去解放战斗的经验与教训，为了明瞭过去的亡国惨史，为了使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一定得到胜利，我们一定要加紧对社会科学研究呵！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不仅能使我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而且它更是我们抗战建国的行动的理论基础。它指示着我们如何坚持抗战到底，巩固统一团结，打到最后胜利，及怎样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所以为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必须加紧对社会科学研究！

三、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

由于社会科学本身所负的任务的重大，和社会上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差别，因此，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是不得不很严肃，分清和坚定。

正因为社会上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差别，便有代表被压迫者的革命理论，也有代表压迫者的投降说

教：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代表日本军阀的有一套侵略者的鬼话，不说建立东亚和平，便说防止中国赤化。从此可以看出，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立场、政治的作用，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反革命。

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有许多表面上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反革命。比如中国的托派说：“中国资产阶级不会抗日的，无产阶级应当乘中国抗战当中，进行革命，打倒资本家。”这话说来倒很漂亮，但是要中国内战，要中国内部分裂，不是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吗？这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放的烟幕吗？还有一些表面上“很公正”的“没有偏见的理论家”，实际上还是侵略者的帮凶，如英法的不干涉主义和美国的孤立派就尽了这帮凶的作用。

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况当中，我们要把握着这正确理论的武器，来改造社会，推进抗战，并跟一切反动的理论、行动作不调和的战斗，那么，首先就要确定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而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态度，大体上说来，应当注意到这几点：

第一，就要确定自己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把握理论的武装，去和反革命的民族失败主义者，一切反科学的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批判地吸收别人的优秀成果。

第二，研究社会科学，决不能只限于读书，我们应当向工作学习，应当使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只有从实践中去研究学习，这样的研究才会彻底。对工作上也才有益处。

第三，要有极艰苦的精神去学习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对于古典的精读的书，也应毫不怕艰难的去研究。

第四，革命理论是发展的，它不象佛经死板不变的。这正是说，我们不该死读书，读死书，不能死死地在任何环境，对任何问题运用一般的理论。我们要在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中来发展理论。

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学习社会科学？

二、社会科学所负的任务是什么？你打算怎样去完成它？

三、社会科学对于抗战建国有什么帮助？

四、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应当怎样？

五、你从前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跟现在有什么不同？而不同的原因是由什么造成的？

（原载1939年11月20日出版的钱俊瑞主编的《战地知识》半月刊第一卷第九、十期全刊）

※

※

※

※

读者来信一则

市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读1986年1期市中区史志第89页：“化工部梅敦礼同志捐赠多年珍藏的其叔父梅际邨撰《念石斋诏》集一部。”本人所知：梅敦礼同志的父亲名罗雁字孝威，长沙聚兴诚银行经理。其叔父名罗熊字智威，日本士官生。其祖父为梅际邨字泰雨别号念石翁，二子四女，其伯祖父梅际邨字文伯。梅敦礼幼年就读于杨砺坚先生门下，由其族人梅传三接送。当时梅敦礼同志叫他“传三伯伯”。故“叔父”二字应为“祖父”！恐系排字工之误。

又16页倒数12行末尾，脱一“敦”字，亦系排字工之误。

专此敬请赐理。

读者 陈敦川

1986.10.7

1986年第2期（总第四期）何日出版以便趁前购买。

关于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

——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租赁经过纪实

赵 嘉 玉

编者按：本刊在1986年第一期发表了刘立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记重庆市中区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一文后，承重庆教育学院陈家耀副教授和赵嘉玉同志及时来信来稿，根据他们亲身经历和邓颖超同志的亲笔信件，对曾家岩五十号房产的租赁过程作了如实的订正和补充。现将赵嘉玉同志《关于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一稿和陈家耀同志来信刊登于此，以供有关方面参考修正。对他们关心支持本刊和对史实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们谨表衷心感谢！我们热忱希望各方面同志一如既往，继续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把本刊办得更好。共襄编纂史志的盛举。

区委党史办公室

1986年9月17日

最近看到《重庆市中区史志》1986年第一期载刘立群同志所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记重庆市中区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一文。该文对曾家岩五十号的租赁经过的叙述是失实的。最足以说明事实的是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

曾家岩五十号，是我母亲赵佩珊1937年所购置并加以全面整修的一所住宅，我们全家都住在那里。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修了阳台下面那个防空洞。1938年秋，因为防备日本飞机空袭，我们全家迁往乡下，房子就租给了国民党立法委员陈长蘅先生。陈长蘅是我父亲赵少龙的朋友，随国民政府迁来重庆，是北方人，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所以，他并不是“四川地方进步人士”，更不是该住宅的所有人。

陈先生当时住二楼。经他介绍，底楼租与周恩来同志，是以周公馆的名义订的租约。陈先生后来将他所住的几间房子转租与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刘瑶章、端木愷等。1941年父亲病逝，我们迁回重庆，才到曾家岩五十号清理这些租赁关系。当时代表周公馆和我们接洽的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陈家康（解放后曾任我国驻埃及大使），和我们重新换租约，用的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名义。以后几年，和我们联系的先后有总务科长龙飞虎（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总务科长杨继干（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他们对我们很客气，经常询问我们有没有困难，国民党方面有没有找我们的麻烦等。特别是杨继干同志，逢年过节都要带礼品来看我母亲。由于这个缘故，我母亲一直坚持把房子租与办事处，从未提过二话。

由于物价飞涨，房租虽然经过调整，但仍然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家计不免困难。1944年冬天，邓颖超同志为此特别写了一封信，派杨继干同志送来，内附法币十万元。信中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原件现存红岩革命纪念馆，内容照录如下（原件无标点符号），

陈长衡先生转

赵佩珊太太：

承蒙赁租曾家岩住宅，数年于兹，甚为欣感。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复为禱，专此顺颂冬安！

邓颖超谨启

十二月廿四日

1947年二月，中共驻渝办事处（即在曾家岩五十号）被国民党武装包围，随后被迫撤离。撤离后，五十号全院即被国民党派人看管，不准发还。几经申请，最后才在1948年二月，在“不准再租与‘匪人’”的警告下，把房子发还了。我们不但损失了一年的房租，还以周公馆的抬头补交了一年的水费计伪币二百多万元。但这封信我们却冒着危险保存了下来。

重庆解放后，1950年初，杨继干同志遵照邓颖超同志的嘱咐来看我母亲，关心撤离后房子的遭遇，感谢解放前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1950年冬，这所房子卖与震旦机器厂，后来由国家收购，筹建为红岩革命纪念馆曾家岩分馆。1955年，西南博物馆派人来我母亲处取去了邓颖超同志的书信原件，并写了一张借条。以后这封信的抄件曾在曾家岩五十号分馆展出，“文化大革命”中抄件被窃，后来就未再展出了。

陈家耀同志来信

中一同志：

收到《史志》1986年第一期，想一定是给我寄来的，因为上面载有甘绩镛办川师的文章，十分感谢！该文甘懋邨同志亦曾托人送来一师，因收到过迟，已不及在校庆专刊上登载。一师校庆专刊我曾嘱寄一本给贵办公室，你看到没有？

同期上载有叙述曾家岩五十号的文章，有失实之处。该房原系我岳母的产业，有关租赁经过及邓颖超同志的信，我爱人赵嘉玉知之甚详，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资料。为了纠正和补充史实，并从一个侧面以见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优良作风，特写了这篇短文，希望能在《史志》上登载，请斟酌。寄给你的目的一是想请你先看一看，二是可以向你说明这点史料的来源。

即颂

秋祺

家耀上

86.9.14

· 区党史工作 纪 事 ·

中共市中区委党史工委 市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委 一九八五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六年工作意见

一、一九八五年工作基本总结

一九八五年初，在省、市、区委和区政府领导下，遵循全国第三次、省第四次党史工作会议制订的、征集整理史志资料必须“全面、认真”的基本指导方针，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国办发[1985]第33号文件）精神，结合区的实际特点，提出了1985年的“意见和规划”，经区委批准执行。一年来实践结果，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征集编纂《重庆市中区志》文物史料的通知（中区府发[85]第23号文件），引起了积极反响，如著名川剧演员许倩云同志将其多年珍藏的“扮演孔雀胆和郭沫若同志赠诗”的剧照大磁盘一个捐献区地方志编委会。市博物馆、图书馆均热情地提供有关市中区（重庆古城）各种文物史料复印件。云南开远县政府办公室赛双恩同志，主动抄寄有关市中区历史人物（胡平表）传记资料及北京中国化工学会梅敦礼同志捐赠其祖父梅际郇《念石斋诗》集一部，（线装本两册一函）等等。

（二）创办《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内部季刊），经市委宣传部批准，由市文化局发给“重庆市报刊登记证内字第0138号”。承任白戈、杨超、陈野苹、辛易之、郭焕中等老同志签署题辞，彭伯通、董其祥、伍子玉、庄燕和等同志积极投稿，都给《通讯》以有力支持和具体指导。现在已经编辑出版两期：一是创刊号“地方志资料”版5000册；一是第二期“党史资料”版2500册，完成了预期出版计划。为了加强对刊物的领导，区委批准成立了《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编辑部。

（三）面向全国逐步开展了史志资料信息交流。主要有三种形式：（1）利用《通讯》交换资料，截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底至，初步统计：已经收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州、区、县和单位的党史资料677件，地方志资料445件，共计1112件，同293个单位建立了信息联系。（2）接待省内外各党史、地方志兄弟单位来访，计有江西宜春地区、武汉市江汉区、湖北宜昌市、辽宁省阜新市、大连市、河北省邯郸市，以及富顺县委党史办等，计有25位同志左右。（3）由于《通讯》内部发行的影响，引来了作者自动投稿，已有多件。如重庆出版社、红岩革命纪念馆、沙坪坝区委党史办、西充《县志》主编、内江市志办、长江钢厂等单位的同志，以及一些热心重庆史志工作的同志，都陆续寄来稿件和资料。

（四）组织召开了三次关于征集党史、地方志资料的老同志座谈会。（1）四月份，结合市党史工委召开“川东暨重庆党史工作会议”之便，区委邀请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城区地下党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2）五月份，中顾委任白戈同志召集我区部分老同志座谈解放

初期见闻情况。(3)七月份,区委党史办同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联合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座谈会。我们及时将这些史志资料,纪录整理,充实了《通讯》的内容。

(五) 积极参与省、市、区有关史志工作、学术讨论活动。计有:省第四次、市第七次党史工作会议,市“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市纪念邹容烈士诞生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派张国策同志去雅安一个多月,参加市党史工委征集原川东区党委资料的查档工作,和出席市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区党史办还积极配合区文化局参与普查全区文物工作;刘灿珣同志因陪家属去北京之便,还访问了抗战时期曾在城区工作过的冯兰瑞、李冠华、王汶、温嗣一 etc 同志,作了初步记录稿。

(六) 为征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区大轰炸的文物史料,市党史工委拨给专题资料费三百元。区人防、区图书馆、区史志办的同志,从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档案馆,搜集了文物图片和复印资料多件。

(七) 指导区属各单位逐步展开史志工作。如各街道办事处没有《区情》编写任务,我们拟出了《重庆市中区街道志篇目》(已发,见《通讯》创刊号)供参考。上清寺、民生路、七星岗已经不同程度地有所起步,着手征集街道文物史料中。又如区交通局已拟出《重庆市中区交通志篇目》(已发,见《通讯》创刊号),从局到基层的史志工作会议,我们都派同志出席会议,参加活动,指导工作。其他如区教育局、区饮食服务公司,已经配备史志工作人员,在完成《区情》编写任务后,逐步开展了史志工作。为了及时交流经验,互通信息,我们今年除出版《通讯》外,还零星印发《地方志资料》3期、《党史资料》4期,史志工作《情况简报》各3期。

(八) 关于建国后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逐步在进展中。(1)“组织史料”,按照中央要求,在区委党史办已编“初稿”基础上,区档案馆补充修订,已初步完成《建区后至1985年的初稿,尚待审定完稿。(2)“大事纪”除已经完成建区前半年的初稿,刊入《通讯》第二期征求意见外,建区后的“大事纪”,正在查阅档案、搜集资料中,据初步统计:已经建立资料卡1950年73件,1951年47件,其他重庆文史资料等62件共计182件,约25万字左右。

(九) 区委党史办公室、区府地方志办公室本身部门工作机构建设上,一年多来,逐步发展,已经略具规模。主要表现在:(1)人员:在编2人(实到专职1人),兼职5人,聘任7人,打字员1人。经常实有工作人员9人。(2)经费:已经列入区财政计划“科学事业”中,单独银行开户,专款专用。今年区财政局已经拨款18,000元。(实际支出18,700多元)同时,收入《通讯》广告费4,000元,共计22,000元。为顺利开展党史、地方志工作,提供了物质保证。(3)添置了办公设备(柜、桌、床、打字机等)和图书资料。并有专人负责管理。

以上工作,由于区委、政府领导重视支持,以及同志们努力工作,较之1984年“起步”时,已有显著进展。但在前进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定位”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一是需要按门定有必要的专职干部,二是内部信息,还要认真沟通。主要在于对“序外常设机构”的认识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往往不自觉地把党和政府的史志工作,同整个党和政府其他工作对立起来,尽管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支持,但还有待於我们不断用“实际工作”去努力争取进一步发挥史志工作的社会效益,继续开拓前进。

(二) 对“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基本特点,是科学研究的学术活动,是比较艰苦细致复杂的智力活动,它同一般的“行政”、“经济”等管理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年多来,我们通过实践,逐步有所理解。从起步时“陌生”,到比较有所“熟悉”,确有一个认真学习、

不断摸索的过程。目前我们还未摆脱处于“走一步，瞧一步”的被动状态对史志工作的“科学预见性”还很差。比如：究竟如何编纂社会主义大城市中心区的地方志和党史呢？全国尚在研究讨论之中，议论纷纭，迄无定论。见仁见智，都在探索。因此，一方面，要等待上级有所部署，一方面，我们在“征集整理”文物史料方面，已经起步，仍有许多工作可做，不能稍有松懈，也可以结合“市中区”的实际特点，认真探索如何“编史修志”的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三) 史志工作，是党和国家“历史反馈”的千秋大业，它的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中华民族生存的长远观点看，这个工作要继续下去，是必然的。为此，还有些必要的基本物质条件，需要进一步解决，逐步完善、充实。为后来接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创造一些更好的工作条件，也是责无旁贷的。

二、一九八六年工作意见

在1985年工作基础上，从市中区的实际特点出发，继续有所前进，拟集中精力，认真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 遵循“全面认真”征集整理各种地方史志资料的基本指导方针，坚持认真办好《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内部季刊)。预计全年编辑出版四期。每期约需经费3000元，共计12,000元。每期组织“赞助广告”收入2000元，预计能收入8000元。按照两万元指标，为《通讯》筹集出版基金。每期按“地方志”版印3000册、“党史”版印2000册，继续同全国有关单位交换资料，上报领导机关，下发基层单位，扩大史志资料信息网，广征博采，推动工作，为“立准立好”进一步编纂市中区的党史、区志创造条件。

(二) 现有工作人员，在力求稳定情况下，请区委组织部、区府人事局，区编制委员会，按照编制，积极物色配备专职干部2—4名，进一步健全经常工作机构。

同时，在离休、退休干部中，物色聘请特约撰稿人若干名。实行专题计件承包责任制，按稿件、资料质量，付给报酬。经常同区史志办公室保持一定的学术联系。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专长，为地方史志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 争取向区人大常委会认真汇报区志工作，亟希讨论研究，作出决议，给我们以有力支持。同时争取区政协的关心配合，进一步引起全区各方面，对地方志史工作，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重视，予以实际援助。为促进市中区两个文明建设，增添一分力量。

(四) 在市委党史工委、市政府地方志编委会部署工作任务后，今年召开一次全区性的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配合展览全国史志资料(具体内容、时间，待定后，报区委、区府、批示)。

(五) 今年上半年召开两个座谈会：(1)结合1985年《通讯》两期出版，组织编辑部和有关作者、读者座谈会，会期一天。听取反映，征求意见，改进工作。(2)结合区档案局在区党史办“组织史料”基础上的修订稿，请区委组织部、档案局、办公室和部分知情的老同志座谈“审定”此稿，会期1天。以便进一步修改定稿，报区委审查后，上报市委党史工委。

(六) 解放后，建区以来“大事记”，继续查阅档案，争取上半年能完成“民主改革”时期(1950—1952年)的“大事纪”初稿，下半年能继续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大事记”初稿。按照中央、省、市要求，还需要增加编写力量。拟召开一次“大事记”编写工作的专题会议。

(七) 按继续征集史志资料,抢救“口碑”资料的需要,除由史志办公室组织专题外访调查外,争取结合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出省参观访问,每次能给区史志办分配一至二名(旅差费在史志办预算中开支)随同出访。以便解决许多实际生活问题,有利于史志工作更好地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八) 一九八六年经费预算。(略)

以上意见当否,请区委、区府批示。

编 后 记

今年二月,市委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认真贯彻中央40号文件精神,制订了明确的党史工作方针,提出了“全面征集、系统整理、科学编纂”全党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资料的光荣任务。党史工作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将中央有关指导文件,择要发表,请区属各部门党组织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提出建议,以便区委在酝酿讨论,制订今后全区党史工作规划时,能够做到切实可行,卓见成效。

建国后,市中区委的《大事记》(二)请有关同志进一步认真审阅,核实,及时提出意见,寄给我们,以便最后定稿,上报市党史工委。

市中区(重庆古城)是革命的历史名城。无论从党史,还是从地方志来说,它所储存的历史的与现实的信息量,都是极其丰富的,正有待于我们努力去发掘、整理、研究、编纂它,使之系统化、科学化,为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它的积极教育作用。如张仲明、胡其谦等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曾维钦《游曦》传记资料编纂组所提供的珍贵史料,以及其他,就是一例。

最后,我们殷切地希望各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继续惠赐有关市中区(重庆古城)的各种党史文献资料,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把我党六十多年来,引导中国人民觉醒的各种光辉业绩都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从一滴水珠见太阳的全貌,这样,既是教育来者的需要,使他们知道新中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能数典忘祖;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缅怀先烈,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风亮节的需要,激励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认真增强党性,端正党风,保持革命气节,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

编 者

1986年6月30日



一、《重庆市中区史志》的“党史资料通讯版”系内部刊物，是为全区党史工作者和各地热心党史事业的同志，提供地方党史资料征集整理、考证核实、理论研究、问题探讨、经验交流、工作指导、传递信息的园地。以推动市中区党史工作的开展，为进一步编写地方党史，奠定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重庆市中区史志》“党史资料通讯版”需要下列稿件：

1. 中央和省、市、区委对党史工作的指示、报告和文件；
2. 党史研究论文；
3. 有关市中区的重要党史文物资料，革命遗迹，和革命回忆录等；
4. 有关市中区的党史人物传记和重大党史事件的专题文献资料等；
5. 中共市中区委各部门、区府各单位党组织的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及其工作动态；
6. 地方党史资料，特别是各城市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交流；
7. 党史资料问题的考证、核实、研究、探讨。

三、热烈欢迎广大党史工作者和有关同志踊跃投稿，诚恳希望建国前后曾经在市中区工作过的各级党、政领导和工作同志，特别是已经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能多多惠寄地方党史资料，关心、指导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四、为了全面认真地把党史资料立准立好，来稿务请做到：材料翔实可靠，引文注明具体出处，字迹清楚工整，文字简洁精炼。字数不限。一定请用稿纸、兰墨水或毛笔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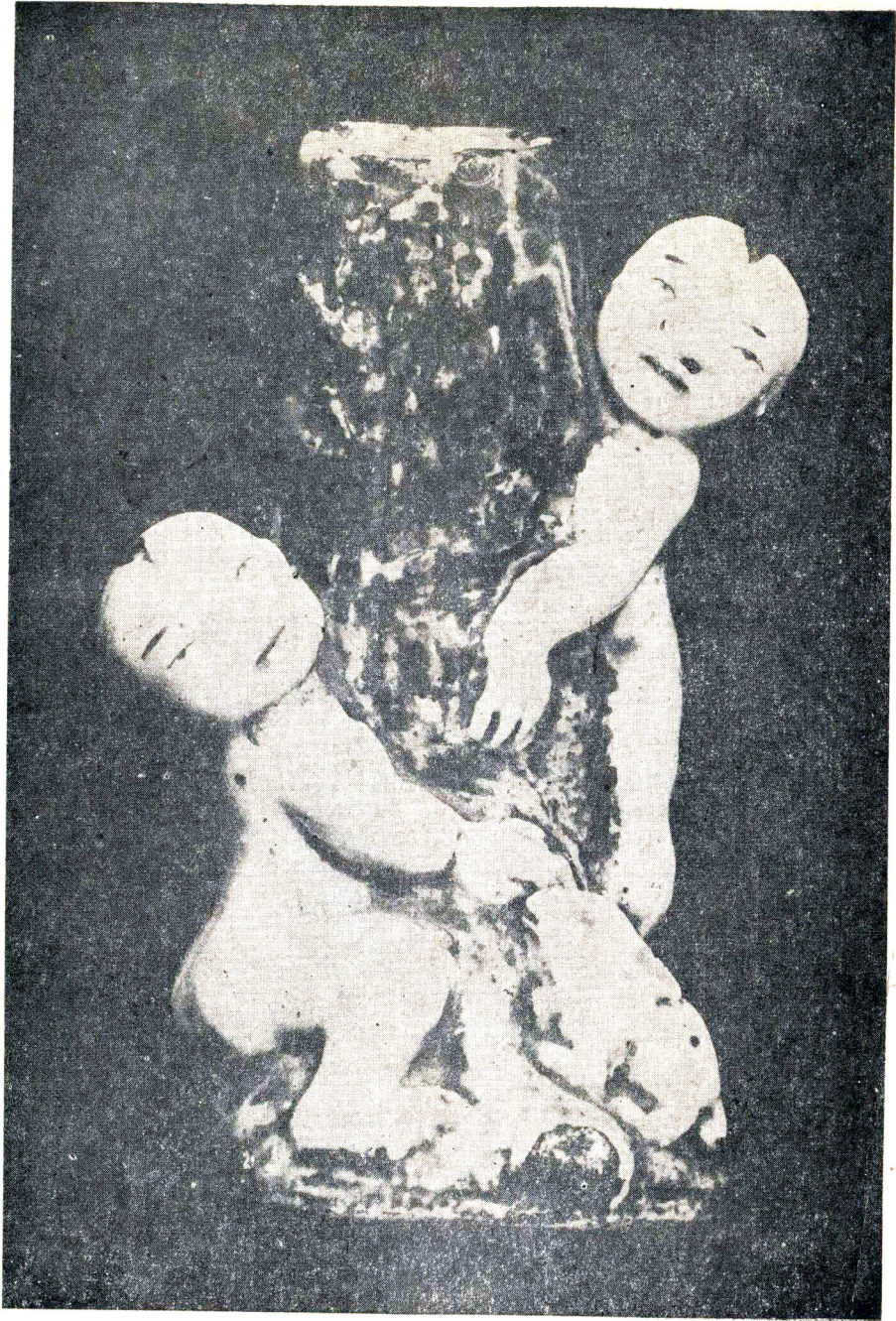
五、来稿务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职务、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来稿一经刊用，即致薄酬；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但不适于公开发表的稿件，也酌给润笔费，或赠阅本刊。因限于人力，一般不退稿，请自留底。

六、来稿请寄重庆市中区和平路211号，区委党史办公室。电话：41365

《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编辑部

1985年7月

贈閱
請交換資料
中國近代史資料室



▲游曦烈士遺物笔筒

(广东省博物馆供稿)